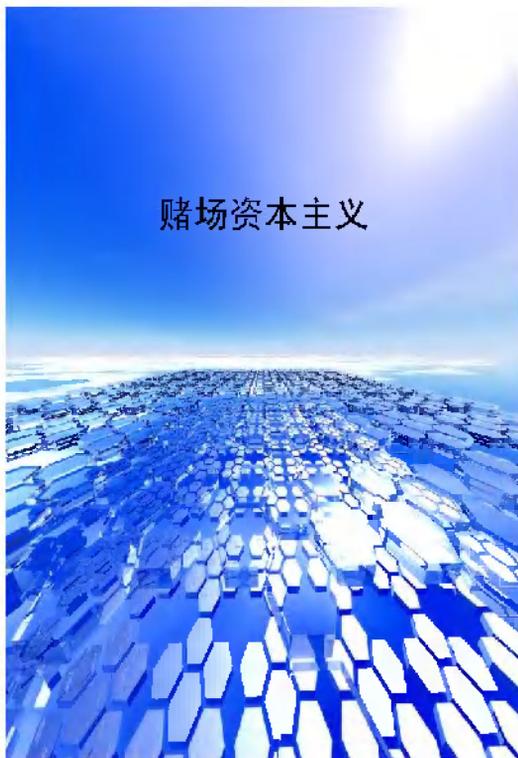


赌场资本主义





ISBN 7-309-07114-9

资本主义研究译丛

Casino Capitalism

赌场资本主义

〔英〕苏珊·斯特兰奇 著
李红梅 译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赌场资本主义 / (英) 苏珊·斯特兰奇著, 李红梅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6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49-283-8

I. 赌… II. ①苏… ②李… III. 国际金融 - 研究
IV. 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491 号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赌场资本主义



著者: [英] 苏珊·斯特兰奇
译者: 李红梅
责任编辑: 程晓燕
责任校对: 徐登里 张景秋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283-8/D·042 定价: 16.8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0719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Susan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全权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翻译、出版《赌场资本主义》中文版。本书根据1997年版译出。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生育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为期约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期约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性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期约50年，即从世纪之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界定说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

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十分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2）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3）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企

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

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

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序

英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于1923年出生，曾在英国皇家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毕业后在《经济学家》、《观察家》等杂志任编辑和记者，后来她先后在University College（伦敦）、伦敦经济学院、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以及瓦威克大学任教，并曾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70年她在《国际事务》上发表《共同忽略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学》一文，最早提出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来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文章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奠定了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现在，全世界有好几代博士因为有幸得到她的教导而心存感激。作为一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导师，她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伦敦经济学院时，她已经成为国际学者圈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尤其是在美国，她因鞭笞在国际关系中建立自命不凡的理论实践而闻名。尽管她并不反对构建理论，但她认为不能为理论而创建理论。由于她的突出成就，1995年她成为“美国国际研究学会”的会长，是自该协会创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二位享此殊荣的外国人。1998年10月25日，苏珊·斯特兰奇与世长辞。其主要著作有：《英镑与英国政策》（1971），《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1988年版，1994年第二版）、《竞

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1991)、《国家的退却：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消解》(1996)、《疯狂的金钱》(1998)等。

在《赌场资本主义》一书中，苏珊·斯特兰奇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即西方金融体系）的运行和发展，她指出“世界经济混乱的根源在于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为了形象地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她将国际金融体系比作一个大型赌场。她写道，“西方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想像。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继续进行。在俯临世界所有大城市的高耸的办公大厦里，房间里满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玩这些游戏。他们双眼紧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的价格不断闪烁变化。他们通过洲际电话或电子设备来玩这种游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

本书中谈到了以下几个与现实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一系列政府决策导致了国际金融和货币中的不稳定，尤其是美国政府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使其国内决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疆域之外。作者不惜用整整一章来讨论关键决策及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影响。确实，政府的关键决策经常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历史表明，政府的关键决策甚至创造由不确定主导的新市场，如欧洲货币市场和许多期货市场。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出现了许多政府无法知晓和管理的盲区以至整个体系处于一种无政

府状态。而且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经济上的联系空前紧密。以往以地域划分的银行，现在变得更加难以区分，使得政府对银行和金融的管理更加困难。苏珊·斯特兰奇在1986年便大胆预言，“今后所有金融交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心，而是建立金融期货、政府证券和股票的普遍的全球统一市场。”当时，金融期货市场已经相互联接，通过卫星和电脑就可以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交易。阿姆斯特丹期权交易所和蒙特利尔、温哥华和悉尼的交易所连在一起。芝加哥和新加坡、纽约和悉尼连系起来组成金融期货的统一市场。它们将规章制度远远甩在后面，几乎不受任何经营措施的限制。现在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和运行，斯特兰奇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第二个问题，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过去的历史表明，美国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发展。即使美国没有显赫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仍意味着美国是唯一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大国。由于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商人和银行对以美元而不是以其他货币进行交易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偏好，因此美元比日元、德国马克、甚至瑞士法郎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尽管所有这三种货币以实际购买力计算比美元稳定得多。美元不仅是体系中无可争辩的国际货币，而且也只有在美国才可以找到最大、最积极的金融市场。正是在那里所有主要革新被发明出来，然后传播到伦敦或东京。美国的国内决策对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别的国家如果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只有在美国制

定的体系框架中去规范自己的经济。有人认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国的国力已经衰落，但作者提出：美国一手炮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衰落也是根据美国的意愿。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迫使德国马克和日元重新定价，从而达到美元贬值的目地，并成功地使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由此导致国际金融体系更加动荡不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在一片萧条的海洋中长期繁荣下去，尽管当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克林顿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使美国得以暂时保持繁荣，成为整个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第三个问题，对货币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优越地位使它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支付手段、国际流通手段和购买手段，并成为许多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不信任迅速向其他领域蔓延，这种蔓延远远超越金融中心的界限，影响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关系，形成不确定造成的恶性循环。这样，国家、企业和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短期投资，而不是考虑长期投资所带来的长期利益。斯特兰奇一反传统自由经济学家中流行的，认为经济的最大威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观点，她批判性地指出，对货币和信用的管理不当比贸易保护主义更危险，因为“货币的行善力量是与其可怕的破坏力量相抗衡的”。

最后，斯特兰奇在书中为解决当时的金融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法。斯特兰奇认为，“管理一个根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失去控制的金融体系并使其恢复稳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只能依靠国家。绝对不可能指望国际

组织挥舞一个神奇的魔杖，恢复金融秩序并随之恢复世界繁荣。”“改革必须从华盛顿转变观念开始。”所谓转变观念指的是，美国在关注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承担的霸权地位时，不要只考虑为此所承担的负担，而是眼光放长远一些，看到它所带来的长期利益。由于美国国内政策和经济的不稳定直接波及到国际社会，希望美国承担责任并不是要求美国为了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使自己的经济保持稳定。但是，问题在于作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某些关键决策时，历届美国政府更多地考虑短期国内利益，而不是关注建立一个可以维持一种健康、稳定、繁荣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长期国家利益。要改变这种状况，斯特兰奇认为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应对美国进行推动并施加压力。

现在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讨论非常热烈。在现实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中国加入 WTO 似乎近在咫尺。中国一旦加入 WTO，便意味着中国向国际社会又迈进了一步。那么中国的银行业在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以及我们在向外资银行敞开大门的时候，会不会也发生如战后伦敦金融市场重新开放时的情形，对银行业缺乏有效的监控呢？尽管这已经不再是个别国家而是世界范围内共同的现象。由于中国本身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刚刚起步，银行业更有漏洞可钻，今后当金融交易以秒结算时，如何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会不会做得更好呢？阅读此书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本书于 1986 年首次出版，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

响，并引发了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广泛讨论。中译本是根据1997年的英文原版翻译的。由于本书的翻译涉及到许多专业背景知识，在翻译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大量有关国际金融史、国际货币史，以及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图书。首先，应该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翻译得到了中央编译局顾良老师、冯文光老师以及众多朋友、师长的鼓励和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曹旭先生，他在百忙之中，为我审校了部分章节，并给予我充分理解和支持。华夏证券公司的吴芹女士作为我的第一读者，帮我阅读了部分章节，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薛晓源先生不断地督促之下，本书得以早日完成。中央编译局的李惠斌、薛晓源先生审校了大部分章节，因而避免了一些殆笑大方的错误，在此一并致谢！虽然几经审校，但时间紧迫，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红梅

2000年2月于中央编译局

前 言

《赌场资本主义》确切的副标题完全可以是“一个业余历史学家的反思”。因为它与其说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动荡时期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的短暂历史，不如说是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体系变化所作的评论。我早些时候写的一本书已论述了本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那时我在当研究员，花了5年时间，以与美国的重要领导人的许多访谈以及媒体报道和书面证据为基础而写成。而《赌场资本主义》于1983年开始写，1985年完成。当时，我在伦敦大学经济学系任全职教师，教课包括两个全新的研究生项目。再写一本关于下一阶段的历史书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一本评论，或什么都不是。

需要评论的东西很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界最动荡的时期导致了许多变化。现在和当时一样，这些变化关系并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但是，现在和当时差不多，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和引起的后果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初读此书的读者将发现这些评论中有三四个评论在90年代仍有现实意义。第一个是对货币的社会意义明显的、必要的提示——不论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或两种经济的混合体中。货币有效可行的行善能力与其可怕的分裂、破

坏的作恶能力相抗衡。因此，如何管理货币是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问题。它确实太重要了，以致于不能留给银行家或经济学家以自认为最佳的方式去进行管理。提示是适时的，因为在 20 世纪 40、50、60 年代这 3 个 10 年里，政府如此牢牢地控制和管理着货币与信用以至于其分裂和破坏力量被遗忘了。只有到了 70 年代，以 1971 年的美元贬值引起的剧烈变化和后来 1973 年的石油价格猛涨为开端，人们才开始醒悟过来，记起古训：货币及对货币的管理可以和人们的生活和财产玩“蛇梯棋”游戏 (snakes and ladders)^①。

第二个评论是对自由经济学家传统智慧的批判否定。他们已说服所有人——学生、政客和记者——相信世界的最大危险是保护主义，“吃光邻居” (beggar - thy - neighbour)^②的贸易壁垒是导致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原因。我在《赌场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对货币和信用管理不当在贸易政策中比保护主义更危险。我指出，本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保护性政策是经济增长缓慢和贸易停滞的结果，而非其原因。信用匮乏而不是进口关税造就了欧洲及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偿债、缺乏购买力。因此，是纠正过去并得出正确的关于在当前制定政策时金钱比贸易优先这一结论的时候了。

① 一种英国小孩玩的棋类游戏，棋盘上标有蛇和梯的图案，棋子走到蛇头一格时退至蛇尾一格，走到梯脚时可进至梯顶一格，以先抵终格者胜。——译者注

② 以全部吃光对手的牌为胜的一种儿童游戏。——译者注

第三个评论是关于国际金融市场巨大变化的政治内涵。1970~1985年间，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拓展已打开了政府“十分无知的巨大盲区”。所谓“十分无知的巨大盲区”，我指的是决策者需要知道却不知道的发生在市场上的事情更多了。如果我不知道闪烁的星星的相对亮度，这对我而言无关紧要，我的无知没有多大影响。但如果我不知道吸烟可以致癌——也许是烟草制造商没有告诉我——那么可能关系重大，在决定是否戒烟时这是一个重大的无知。

最后一个重要的评论是关于美国的国力。在此书探讨的时间范围内，美国国内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20年内那样，是一个能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霸权。然而，我辩驳道，随后的历史表明，作出影响国际经济体系发展和运行关键决策的仍然是美国政府。美国即使没有显赫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赌场资本主义是依据美国的政策和偏好创立的。如果改革——不论需要什么结果——是必要的话，它只可能由美国人发起。就这点而言，历史的记录是明白无误的。

这一点在近10年里并没有什么改变。就此而言，有充分的理由重印1986年出版的这本书，并且，接下来我还正在写一本续集。续集也将是一本评论而不是对事件的记述。一些变化可以被说成为同一模子的翻版；另一些变化则显示了90年代晚期的体系和80年代中期的体系有很大不同。第一个不同是赌场的规模更大和玩家更多种多样；另一个不同是技术更复杂。有利于有组织的犯罪是又一个不同。

因此，续集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有什么新气象？相同点是什么？由于现在明显地比过去对这些新发展的后果更加关注；第二个问题是：哪里是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即可能导致不仅金融体系而且依赖它的整个世界市场经济解体的缺陷——需要我们特别警惕？既然我们中几乎没有人的生活和工作，不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非常容易受赌场危机的影响，那么它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不能仅仅留给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去考虑。

致 谢

对那些我在写此书的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我深表感谢。前言里的鸣谢并没有偿还我的人情债，只不过是认识到这些债务的苍白的方式。我欠有两种人的债，一种是对那些为我提供基金和/或学术旅客之家的人，在旅客之家我可以几乎不受干扰地写作；另一种是对那些好心地阅读并对书中的某些方面提出有益的意见的朋友和同事。

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ner）给我提供了布鲁金斯学会极好的便利条件，供我夏季在华盛顿使用，基金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提供。沃纳·迈霍弗（Werner Maihofer）和马尔切洛·德·切科（Marcello de Cecco）一道为我争取了两个月时间在设在 San Domenico di Fiesole 的欧洲大学学会进行学习 and 研究。哈兰·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和鲍勃·库德莱（Bob Kudrle）对使我得以 1983 年 4~5 月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的胡伯特—汉姆弗莱研究生院（Hubert Humphrey Institute）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那里我授过一些课，有时间和便利条件为写本书取得了一些进展。最后在 1984 年，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为我安排了从设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行政职责中解脱出来，以至于不因日常工作而分心。

至于意见，我尤其在本书的第 3 章中所叙述的从

1974~1984年这10年间的其他阐释方面得到了别人的帮助，从来没有遭到拒绝。以前出版过一个更长一些的文本，作为我对LSE/Chatham House合作项目，即“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货币关系”的主要贡献。这一项目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这个项目得到了Chatham House的楚卡利斯（Tsoukalis）教授的积极领导，他编了一本论文集《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面向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Sage, 1985）。劳卡斯·楚卡利斯（Loukas Tsoukalis）、戴维·卡利欧（David Calleo）、杰瑞·戴维斯（Jerry Davis）、拉德·霍利斯特（Ladd Hollist）、鲍勃·考克斯（Bob Cox）、鲍伯·基奥恩（Bob Keohane）、高塔姆·森（Gautam Sen）、杰夫·弗里登（Jeff Frieden）、约翰·巴雷特（John Barrett）和沃尔夫冈·德克斯（Wolfgang Deckers）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对书中的其他部分，我对两位严厉的编辑批评家：即我的丈夫克利福德·塞利（Clifford Selly）和我的朋友弗朗西丝·潘泰（Frances Pinter）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如还有错误全都是我自己的。最后，对提供研究协助和秘书帮助的尼勒什·达塔尼（Nilesh Dattani）、阿特·基尔格（Art Kilgore）、西拉里·帕克（Hilary Parker）、帕姆·霍奇（Pam Hodges）、安娜·摩根（Anna Morgan）以及利兹·莱斯莉（Liz Leslie）表示例行鸣谢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目 录

前 言	1
致 谢	1
第 1 章 赌场资本主义	1
远景中的混乱	4
混乱是如何开始的?	6
浮动汇率的影响	9
利率的波动性	16
石油价格	20
更强的市场或更弱的政府?	24
第 2 章 关键决策及其后果	28
五种以往的非决策 (non - decisions)	34
自由放任的市场, 1972 年	43
无规章的体制 (The no - rules regime), 1972 年	46
1973 年, 拒绝与欧佩克谈判	48
缺乏最终的贷款人	51
国内决策	53

第3章 一些其他阐释	68
技术决定论	70
政治决定论	75
其他形式的决定论	81
其他解释	83
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	98
结 论	114
第4章 在黑暗中打赌	119
投 机	127
结 论	139
第5章 竞猜游戏	140
欧洲市场是否具有通货膨胀性?	141
资金周转率	144
无知的领域	148
英国体系	149
美国体系	151
哈耶克、凯恩斯和西梅尔	153
我们知道什么?	158
结 论	165
第6章 一些医治处方	168
不可能的疗法	170

协调国民政策	171
勃兰特解决方案 (Brandt Solution)	176
改革建议	179
国际援助体系	184
债务的危险	188
方案选择	189
第7章 冷却赌场	196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201
银行问题	202
债务问题	208
防务问题	213
来自欧洲的推动	214
没有选择方案了吗?	217
译名索引	223
参考书目	239

第1章 赌场资本主义

西方的金融体系很快变得与一个巨型赌场没有什么两样。每天，这个赌场中进行的游戏卷入资金之大简直无法想像。夜间，游戏在世界的另一边继续进行。在俯临世界所有大城市的高耸的办公大厦里，房间里满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烟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玩这些游戏。他们双眼紧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的价格不断闪烁变化。他们通过洲际电话或电子设备来玩这种游戏。他们就像赌场里的赌徒，紧盯着轮盘上咔哒旋转的象牙球，决定把筹码放在红盘或黑盘、奇数或偶数盘里。

正如在赌场里一样，现在的巨额融资世界(the world of high finance)给玩家提供了许多可供选择的的游戏。除了轮盘赌、21点或纸牌以外，还可以在外汇市场及类似场所，以债券、政府有价证券或股票进行交易。在所有这些市场里，你可以通过期货交易(dealing forward)，或买卖期权(option)和所有其他深奥的金融发明，对未来下赌注。一些玩家，尤其是银行，投入的赌注很大。也有很多非常小的经营者；有兜售建议提供内幕消息的人；还有向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散播体系流言的小贩。在这个金融赌场里，总管理员是大银行家和经纪人。他们现在跟过去一样为“证券交易所”工作。从长远来看，正是他们过着最富足的生活。

这些银行家和交易商与年长的人们记忆中的典型银行家完全不一样，他们工作的世界与以往人们记得的金融界也非常不同。银行家过去常被认为是沉着、冷静的人，不苟言笑，穿着保守的黑条纹套服，注重维护自己谨慎细心看管顾客金钱的名声。现在，国际金融体系里已经发生了十分激进、严重的变化，使整个体系极像一个赌博大厅。为何发生这种变化以及如何发生的这种变化仍然不清楚。

确信无疑的是，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我们平常可以进去或远离的普通赌场和全球巨额融资赌场最大的不同是，后者使我们所有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了每日的游戏中。一种货币的变化可能使农民在收割庄稼前就收入减半，或使出口商停业。利率上升可以导致店主库存费用致命上涨。基于财政考虑的接管命令可能使工厂工人失业。从刚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到已退休的老人，在大型金融中心的办公区的赌场里发生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突然的、无法预测的、不可避免的影响。金融赌场使所有人都热衷于玩蛇梯棋游戏。不论掷出的骰子使你置身于梯子底部，然后慢慢爬上幸运顶峰；还是落在蛇头上，使你陷入不幸的深渊，靠的全都是运气。

这不可避免会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当发生到人们身上的事情越来越多地完全被运气控制和决定时，技巧、努力、进取心、毅力和勤奋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忠诚和信心迅速消退。对自由民主社会最终的根基——伦理价值的尊重会遭到贬低，这很危险。厄运可以使人们的心理状态产生变化，因为厄运不仅包括人们都知道的，通常会对人产生影响的健

康问题：爱情挫折、自然灾害和先天不足，而且还包括新的、难以预料的打击。现在，不仅懒惰，能力不够或厄运都可能使你失业。因一些难以预料的变化，如利率、商品价格改变或另一些过去被认为非常稳定可靠的因素发生变化，可能使人一生的积蓄付诸东流、使在国外的度假费用加倍或减半、使企业遭到破产的厄运。当难以知道机会之轮如何转动并于何处停下来时，作出正确决策的努力看起来越来越没有意义了。在红盘和黑盘里下赌注机率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确定性增加已经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积习难改、多半不自觉的赌徒的原因。

而且，在一个本身已经不太公正的体系里，易遭受厄运的程度远远谈不上公平。一些人可以找到缓解或保护自己的方式，而另一些人却不能。最初源于多种因素的不公正突然比以往更敏锐地被感受到，也遭到人们更悲愤地怨恨。当运气王国覆盖面变得太大，并且当体系随意运行显得如此不公平时，沮丧和愤怒会变得更强烈，也更易于激烈地爆发出来。

这一点如果对个人来说是实情，那么对大企业和国家政府部门也不会例外。政治领导人及其对手往往喜欢假装自己仍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实行的政策仍然能够减少失业、复苏经济、恢复繁荣并鼓励未来投资。但近年的情形已无数次表明，政客的计划如何被他们不能预见的、发生在国外的世界变化所打乱。如：美元疲软或太坚挺；利率上升使支付外债利息变成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以至无法承受；银行突然决定不再提供贷款；石油价格突然上升或下降；由于主要消费国的主要经济正在经历衰退，出口创汇

可能依赖的另一些商品的价格下降。统治金融世界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不仅波及到每个人的生活, 而且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命运, 并迟早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50 多年前发生的 1929 年的大萧条, 便发生了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形。这次, 不论将发生戏剧性危机还是——看来更有可能——发生全球市场经济难以应付的长期萎缩局面, 都必须引起普遍的关注, 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

远景中的混乱

如果我们暂时远离当今的头版新闻和关注点,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两件事情。第一件: 导致当前的混乱局面的变化发生得非常快, 约短短 15 年时间; 另一件: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这些变化已经同时影响到一些控制世界经济运行的关键价格 (key prices)。所有这些价格在同一时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如: 将所有的国民经济体系相互联系的外汇市场的货币价格; 通常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日益上升的商品价格, 也称作通货膨胀率; 生产所有商品和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考虑因素, 信用价格, 也叫作利率; 作为另一种主要投入的所有机械生产和商品运输所依赖的石油的价格。每一种价格的不确定性培植了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无常性。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共同因子是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序状态是滋生困扰各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源, 正如植物害虫、疾病和霉菌会侵袭植物的不同枝干一样。

所有人对这些问题都不陌生, 这应归功于报纸、电视

和大批书刊和宣传小册子。最广为人知、为人理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事实上太多的国家以可能置本国于危险境地的条件借了太多的债务，如果贷款一旦停止，这些国家和债权国之间将会产生麻烦。这与第二个问题相关，即，整个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经济衰退时发展缓慢。银行体系不稳定是第三个问题。但是这不仅限于债务国；公司欠银行的债务规模与债务国相比同样大，如果缓慢增长持续下去，加上缺乏可靠的最终贷款人，同样也可能很危险。第四个可列入的问题是影响生产商和消费者的石油价格不稳定，它因此成为许多国家国际支付平衡的决定因素，尤其是中东——一个在有些情况下不仅遭到国内还遭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不稳定双重困扰的地区——的主要石油生产国。可以明显看出，所有这些问题主要以经济方面为特征。与前面的问题相比，同样重大的第五个问题是：国际政治形式不稳定，特别是不稳定的美苏平衡关系和不牢固的美欧联盟。甚至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根源于金融的混乱和不稳定。两者都因全球银行外汇交易厅中那些闪烁的屏幕上显示的美元坚挺或疲软而受影响——它们反过来又影响到美元。

正如我所论述的，如果所有这些问题都相互联系，同时所有问题里都含有金融不稳定这个共同因子并由此容易遭受大型金融赌场里赌桌上所玩的游戏的影响，那么对公分母的关注当然会使任何一个问题解决起来容易得多。它也许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但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必要条件。恢复金融确定性和稳定性将给任何一个问题的帮助，也将使解决其他问题变得容易一些。

然而，在我们考虑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必须找出旧制度于何时并如何遭到腐蚀的。这个具有很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迅速改变是何时真正开始的？如何开始的？只有通过回顾和审视若干混乱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才能真正找出解决方案。

混乱是如何开始的？

1973年通常被作为以后各种变化的基点，这一年是自缓和的60年代转向紧张、变化多端的70、80年代，变化的雪球开始积累冲量的转折点。它是几种巨大变化同时发生的一年——成功地使美元贬值以及伴随而来的由市场自行决定美元的兑换率。大家知道这是迈向浮动汇率（floating rates）的步骤——floating rates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描述，因为一些汇率升高而另一些下降了。^①它也是石油价格首次大幅度上升的一年，后来变得越来越依赖银行体系来为当时贫穷一些的国家（及部分发达国家）的石油消费和经济发展提供经费。每一种变化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

稍微回忆一下国际金融关系史可能对找出发生这种巨变的进程有所帮助。这种回忆也将解释为什么说选择1973年或其他任何日期具有某种随意性。所有这一切可以表明的是：它似乎标明了某种进程的改变，系统从此由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了动荡得多的阶段。

^① floating rates 字面意思可以是上浮的汇率，作者在这里就是根据字面意思作出诠释。——译者注

系统的裂痕和弱点早在15年以前就被发现了，那时人们已经发现美国和其他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的金融制度和安排并没有像计划那样行之有效的运行。该体系不是一个将同样的规则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公平体系，而是发展成一个十分不平衡的系统。在这个体系里，一方面，美国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持续出现赤字，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美元持有量。这些美元储备减少了其他国家担心可能出现如英国1945年短缺美元用于进口的忧虑。贸易得到复苏，积累的美元尽管也有助于（尤其在欧洲）为投资提供资金，但是它迟早会超过甚至像美国那样庞大的黄金储备。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点是美元被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作为借款货币，部分原因是美国承诺以战前的固定价格以美元兑换黄金。早在1958年美国的罗伯特·特里芬教授（Robert Triffin）（特里芬，1958）和法国的雅克·吕夫教授（Jacques Rueff）（吕夫，1971）已指出这种“美元泛滥”（dollar overhang）的内在危险性。法国和欧洲的其他政府采纳了这种分析，它们（有一点矛盾地）希望一方面而享受日益增长的繁荣，另一方面又有权抱怨体系的不公正，因为体系给予美国人（某种程度上包括英国人在内）享有来自其他国家将其货币作为借款储备的特权。这就是戴高乐将军所说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意思是美国人可以用借款而非出口商品和服务来支付防务和其他方面的账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日益增长，致使越来越多的金钱通过兑换进行流通，不同政府对

于体系何处出了毛病存在政治分歧，在这种联合压力下，裂痕不断扩大，体系开始失灵。修补裂痕的减缓措施如黄金总库（Gold Pool）和借款总安排（General Arrangements to Borrow）扩大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Bretton Woods）决定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紧急情况下借给成员国外币的总资源。为了防止因外国借款人来纽约举债造成赤字增加，美国对借债进行征税。但这样做给在国外的美国银行造成了压力，鼓励了刚成雏形的伦敦市场支持欧洲货币的信用。争执没有停止但也达成了部分妥协，如1968年在斯德哥尔摩达成协议，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将补充而不是代替美元作为政府的储备资产。

甚至在60年代晚期，体系的特点看来主要在于打击欧洲的硬货币，如德国马克（1969年被重新定价）和软货币，如英镑（1967年贬值）和法国法郎（1969年贬值）。然而，最终美国经济也遭到了影响。美国一方面维持美元的固定汇率，另一方面在越南战争上大幅度消耗，使得约翰逊总统求助于国内的紧缩通货政策和高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益恶化的贸易不平衡。

约翰逊总统把外汇市场当做将美元置于投机压力下的敌人，而更精明的尼克松、基辛格和康纳利则看到市场也可以被用作盟友，以帮助美国策划其他国家既不能反对也无法抗争的美元贬值。尼克松于1971年8月单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即他拒绝进一步将美元债务兑换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允许美元和其他国家的

货币不以固定的汇率兑换。

这就是走向 1973 年永远放弃固定汇率决策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于 1971 年 12 月谈判签署了史密森协定 (Smithsonian Agreement)，重新调整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的汇率。但部分由于对美元未来的不确定引发的持续通货膨胀和商品繁荣，首先使英镑不再坚持固定汇率安排，接着撕碎了欧洲的“地洞中的蛇” (snake in the tunnel) ——即他们使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稳定的初步努力。货币市场的极度混乱最终致使美国冒险，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应用多少英镑、日元或马克兑换一美元。

浮动汇率的影响

由于浮动汇率的承诺和结果的巨大差异，致使浮动汇率的历史记录，不管如何简化，都十分重要。以美国人为首的大部分经济学家过去承诺，这种变化将使前 5 年令人惊慌失措、极度担心的货币危机结束。这些经济学家安慰我们说：“压力可以由汇率而不是由储备来承担，因此政府将不必担心。市场将只逐步反映每一个国家的花销、价格（及膨胀率）与其贸易伙伴的花销、价格（及膨胀率）的正确关系。将没有任何必要大幅度改变汇率。”

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和承诺，实行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浮动汇率——换一种说法，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不但没有减轻市场不稳定，看来反而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

仅仅经过 5 年的试行期，就已明确看到：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的顺差和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自由货

币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从某种程度上说失灵了。1978年，在固定汇率下盈余最大的国家，如日本、西德、瑞士、荷兰和比利时，当时赢余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从1972~1973年的总和90亿美元达到1977年的180亿美元。而赤字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1978年的赤字是过去的3倍，尽管市场已经使他们的货币贬值（特里芬，1979）。因此，在浮动汇率下需要的储备不是减少了，而是需要更大的储备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更大的赤字。

当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美国。由于现在实际上实行的是纸币—美元体系而不是60年代运行的黄金—美元体系，美国作为主要货币储备国，拥有无限的美元储备。美国的经济远不像欧洲的经济那样易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与美国相比，欧洲人不仅进行贸易更多，而且他们的贸易也大多在欧洲人之间进行。欧洲人发现浮动汇率容易把他们的货币推向极端，使货币极化为要么疲软要么坚挺。尤其是美元1976年以后变疲软后，自由资本流向德国马克或瑞士法郎，使这些货币与赤字国的货币如英国英镑、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法布拉，1978）。从货币的年度汇率变化来看，70年代几乎是60年代的两倍（沃贝尔，1980）。

而且，由于今后汇率的不确定性增加使持有储备的必要性增大，问题在于以什么作为储备货币，美元、黄金、德国马克或其他资产？为保护美元，美国在70年代中期实行了反金本位运动（anti-gold campaign），美国中央银行开始以最初的35美元每盎司官方出售或购买黄金，后来调整为42美元每盎司，但由于美元疲软导致私有黄金的价格

猛涨，一些政府决定重新为自己的黄金储量定价，^①因此美国的反金本位运动只持续到了1979年。这一运动意味着购买更多的黄金储备的机会有限。因此增加的储备大部分在外汇上——截止到1978年增加的储备超过了2500亿美元，其中只有290亿美元增加到20年前的黄金储备上。并且政府和私人经营者改变他们的偏好的可能性增加了外汇市场的不稳定。

必须指出的是，公共和私有部门的财务经理出入外汇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并不是一种标明浮动汇率变化的一次性现象。它是一种累积的现象。加入游戏的玩家越多，市场越变化无常；市场越变化无常，被吸引进来的玩家越多，受汇率变化影响的人置之度外就越难。截止到1977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估计，纽约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量在100亿美元和120亿美元之间。3年后，他们的估计达到250亿美元，90%的交易由银行完成。在同一个时期，1977~1980年，纽约的期货日交易额从35亿美元上升到108亿美元（布林，1981）。三十人集团的估计提出1980年伦敦的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量可能是它的两倍，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450亿美元。三十人集团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量1985年为1500亿美元。（参见图1-1和图1-2）

在外汇市场的日常交易中，这种真正突破性的膨胀——一种大得难以以国际贸易的膨胀来解释的膨胀——已经够清楚了。它们可以解释城市中心塔楼区里，吞云吐

^① 市场价格和以往一样一路猛升，达到800美元每盎司，最终下跌至每盎司400美元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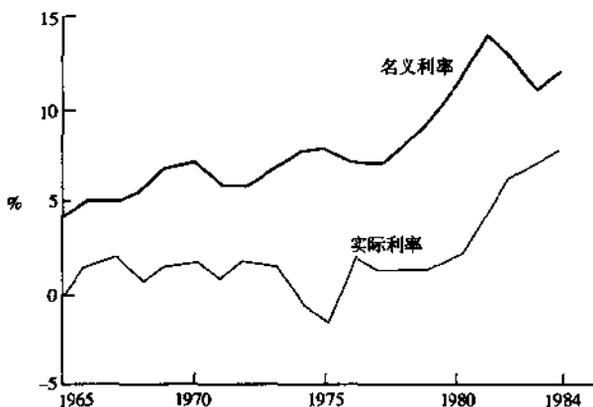


图 1-1 在美国美元的长期利率，1965~1984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5，第 5 页。所有数据均为季度数据的平均数。

雾的年轻人高度活跃的原因。

在固定汇率体系下，企业的财务经理可以运用外汇交易中的期货市场来保护自己，以免遭受因金融资产之间的利率差额可能发生的变化或不同货币作出的承诺改变的影响。有时候，当预测任何一种特定的汇率会有所变化，就会激起公司加入投机者的行业，根据预测的变化方向买入或抛出该货币（或者更通俗地说，在兑换付款时，“超前或滞后”支付）。但多数情况下，中央银行应承担的保持汇率固定公认的责任使公司财务经理不必担心每日的变化。

然而，在浮动或弹性汇率体系下，公司不得不应付美元和其他货币的日复一日的汇率变化。中央银行以其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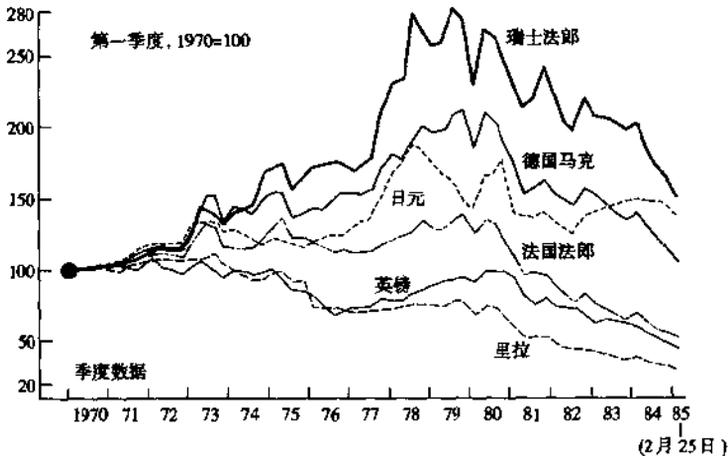


图 1-2 1970~1985 年对美元的兑换价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1985年3月16日；来自 IMF/OECD 的数据。

进行干预以抑制汇率变化的总费用比现在私有部门的企业承担套购保护自己的总费用少得多，这很值得探讨。这增加了银行的利润，使对企业的财务方面的关注与对直接的生产方面的关注相比，财务方面的重要性增加了。

可以确定的是费用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有部门并随后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为在弹性汇率下，由于进出公司的银行账户并以不同货币表示的金钱难以避免有时搭配不当，财务经理为了提前作好预算，不得不弥补或保护自己的账户，防止账户的收入比以当天汇率的预期收入要少，或同样地支出比以当天的汇率预计的多。要作到这一点，他可以通过购买货币期货，把等价证券投资到短期货币市

场，或投资到欧洲货币市场。向公司银行发出的每一个这样的命令将由另外一笔相反的交易来抵消，因为银行通常不愿意货币夜间处于“敞口头寸”状态，即不平衡的状态。以不同的货币转换存款以匹配公司的保护性交易及平衡账簿的这种必要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上述的同业拆借市场规模的扩大。远期补进（即对货币的即期价值升水或贴水）随后的价格趋向于由这些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根据不同货币提供给欧洲货币储蓄的不同利率来确定。这是连接外汇市场和短期信用市场、兑换率和利率的纽带。因为兑换率越来越不稳定，通过欧洲货币市场这种渠道，影响汇率的任何事件，无论是贸易账户发生变化还是某种在市场上被视为使某种特定的货币增值或贬值的政治事件，将被迅速传播到信用市场。这种传播的必要条件是：根据自身和其他同行过去的经验，银行不愿意在外汇市场冒险，并且国际商务人员和进出口商有必要保护自己免受这种风险（比较，莫菲特，1982；门德尔松，1980；利弗和胡纳，1985；桑普森，1981；韦斯鲁森，1980及其他许多人）。

这种必要性源自国际贸易增长以及所谓的“多国企业”（更确切地说是跨国企业）生产的国际化。但这儿也有一个连环套。因为，正如公司已经发现的一样，期货市场给予它们只是有限的保护。企业遭到现金流量头寸、盈亏、投资和销售，在不同国家里、不同货币中的变化造成的损失。但是，公司的证券交易等级及其公司综合资产负债表在财务年度末必须以一种货币计算。如果资产负债表表明的“亏损”并不是“实际”亏损，而是完全归结于对以另一种货币进行的某种业务的评估，那么财务经理就有一种长期

动机找到另外的方法应付这种风险，以保护自己免遭批评。因此经理们首先倾向于尽可能使公司的资产和债务多样化——在本地融资或从本地银行贷款，或采取更上策，比如以可转换的欧洲债券融资；并且财务经理往往找寻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本地股东。实际上，公司业务的地域多样化是一种长期的理性保护战略。简言之，浮动、不稳定的汇率，通过增加多国企业的风险，使多国企业作出反应时更显出“多国性”。但是，因此产生的长期战略反过来将增加它们抵御汇率风险的短期需要，因而进一步增加了在金融赌场中的交易额。

几乎不言自明的是：汇率的不稳定，尤其是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化无常，对发展中国家增加的风险甚至比移动的跨国企业更大。后者至少有许多种产品，在多个国家经营并且以优厚薪金，聘请了训练有素的税务顾问和财务经理队伍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却没有这样乐观。除了其他所有问题以外，自1971年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为自己的货币在一系列汇率战略中进行选择。它们可以决定像墨西哥那样钉住美元；或如塞内加尔那样钉住法郎；或钉住特别提款权或其他货币；或让市场来作出决定。^①欧洲货币单位

① 1971年有几个国家选择钉住英镑，后来放弃了这种做法。有3个国家钉住南非的兰特，一个国家钉住西班牙的比塞塔（参看斯特兰奇，1972，1976，第11章）。42个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和中东）钉住美元。如果钉住根据加权决定的货币集合或一篮子主要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因钉住一种特定的货币而产生的风险。特别提款权就是这样的一篮子货币（参看本书的第8页）。

(ECU)也是另外一种货币篮子，它不包括美元。但是随着被钉住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变化，一些作出钉住决定的国家的选择明显错了。而且，美元或有时甚至英镑发生变化容易对它们的主要产品的出口收入产生重大影响（斯图瓦特，1981）。例如，在美元增值而德国马克贬值的年度，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钉住美元，其主要出口产品以美元报价，并且主要从德国进口，主要欠德国银行的债务，或以德国马克举债，那么该国的金融财产将神奇地增加。反之，如果发生相反的汇率变化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

利率的波动性

自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借款利率不稳定明显增加，使得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趋于复杂化。

自3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因当时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战争，并很快代之以较长时期的冷战这两个因素，工业化国家的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防务预算很沉重，甚至对瑞典这样的中立国也不例外，被迫实施的社会福利计划（如欧洲），使政府在这方面的开销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上升。人们通常将首次决堤怪罪于约翰逊总统和越南战争。约翰逊内阁不情愿以征税来为战争和社会改革筹措资金，而是依靠政府增加贷款来支付不断增加的联邦经费。但是正如卡里奥（Calleo）指出的一样，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卡里奥，1982）。美国国防开支增加不足以解释发生在1971~1984年间的世界范围内如此明显的现象：1963年纽约的商业债券支付的利率仍旧不到4%，美国的

财政金融券刚过3%。到1966年，商业债券率达到6%以上，欧洲货币市场的利率，及所谓的伦敦银行同业拆放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 Rate, LIBOR）高达7%以上。截止到1969年，相应利率分别增至8%和11%。自此以后，两者变化无常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纽约的利率变化总是缓和一些。

欧洲货币市场无疑很大程度上首先促进了利率升高，然后导致利率的变化不稳定。主要设在伦敦的市场，其增长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英国权威部门的纵容，而且在于它们积极地参与其中。纵观整个60年代，英国不仅国债规模相对而言比较大，而且遭受了市场对英镑信心不断降低的打击。而其他战败国家，非常幸运被允许延迟偿还国内外债权人的债务。英国历届政府实际上采取贿赂英镑储备持有人，使他们不至于溜之大吉。英国政府的国库券和金边证券（金边政府债券）向他们提供高额利率，截止到60年代晚期，不仅提供高利率而且提供美元担保。随着业务的增长，欧洲货币市场首先允许人们在不同货币间套汇，资金可以在抛补的基础上通过较高利率被吸引到疲软货币中，同时强劲的货币仍可以保持低利率来吸引资金。第二，它允许资金在国内市场和欧洲货币市场之间自由流动，人们可以在其间进行套汇。^①

但是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决定的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一，以一种“外国”货币进行交易卷人的额外

^① “套汇”：指的是将金钱（资产或债务）从一种市场转到另一种市场以获取利益或者避免损失的行为。

风险；第二，与在欧洲市场进行的相同业务享有的不受控制的自由相比，几乎所有在国内运营的国民银行业务都受到管制。这里的要点是：欧洲货币市场允许主导市场的美国银行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因为欧洲货币市场不受联邦储备体系下对银行储备要求的限制。因此，当欧洲市场增长超过国内信用市场，它们之间的竞争导致利率抬升，但是从来不是以一种稳定、有序的方式使利率上升。这样，已经被复杂化的不稳定中又加入了另一种不可预料的因素。

自60年代晚期以来，由于市场不仅越来越意识到通货膨胀加速（在美国尤其如此），而且也意识到预期通货膨胀存在差异，即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不断自然扩大的差距。换句话说，银行借款利率的预期通货膨胀因素与“货币价格”因素相比变得更加重要。尽管这一点无法证明，但是看来很有可能：那些规模最大、银行和信贷体系最发达、最广泛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其名义利率对欧洲市场的利率有更大的影响。通过同样的双向传送体系，它们与其他小国的信用体系里的政策决策相比，也将对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有更强大的影响。确实，大市场总是控制着小市场，一旦一个如欧洲市场一样简便、廉价、高效的传送系统被放置于其中，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控制不会发生在信用市场。无论如何，可以观察到并已经被观察到的事实是：在70年代，利率通常跟随美国市场的脚步而变化（考虑到通货膨胀率不同，程度也不一样）（参见表1-1）。

表 1-1 银行同业拆放率和欠发达国家债务
浮动利率比例：1973~1983*

单位：%

	1973	1975	1977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浮动利率的比例	6.4	9.4	11.8	15.5	17.3	19.0	20.2	21.6
伦敦同业拆放行利率**	9.2	11.0	5.6	8.7	14.4	16.5	13.1	9.6

* 全部数据掩盖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1983年，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以浮动利率的借债高达75%以上；与之相比，土耳其和肯尼亚的比例分别为25%和9%。

** 伦敦同业拆放率，银行贷款利率的基数。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第79页，1985。

甚至在1979年美国国内货币管理战略发生重大转折之前这种现象已经很明显。1978年10月卡特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美元贬值后，里根政府采纳了所谓的货币主义理论走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当然变得更加明显。

“所谓的”这个形容词是必要的，因为里根政府（和他的历届前任政府一样）无法控制政府的预算赤字。这种无能为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军费开支猛增。因此，有人提出在这种情形下隐含着对货币供应实施真正控制的货币理论不可能起作用，这种建议是合理的。实践中也从未正确地试验过这种理论。因为即使货币权威限制、严密监控信用的货币基数，但同时自己抢先霸占那种信用的很大一部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信用供应受到限制，导致价格即利率上升（参见表1-2）。

表 1-2 实际长期利率 (9)*

单位: %

国别 年度	美国	日本	英国	西德	瑞士
1965~1969	1.8	2.1	3.1	4.7	1.0
1970~1974	0.7	-3.4	1.0	3.2	-1.3
1975~1979	0.3	0.5	-2.2	3.0	1.6
1980~1984	4.9	4.1	2.9	4.2	0.3
1983	8.1	5.6	6.2	4.6	1.2
1984	8.2	4.5	5.8	5.4	1.6

* 实际利率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后,向借款人收取的利率。因此,负号表示借款人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的价格借款。

资料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

因此,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美元外汇市场的一些如此明显的不稳定性转移到美元放款市场,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尤其是苏联入侵阿富汗^①——至少暂时稳定了美元的汇率。先前解释的机制使欧洲货币体系,比近来的历史经验可能使人预测的,出台和发展得更轻松一些。但是轻松出台的代价是体系中容易受任何改变美元利率的事件或决策影响的新的脆弱性。

石油价格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实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使货币和利率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复杂化。1973年当加速变化的时代

^① 苏联入侵使人们日益担心苏美冷战升级。许多人当时以为如果冷战升级,他们的钱存在美国比在欧洲或中东安全。

开始时，普遍的期待是一旦石油价格由于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致行动而上升，由于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的10月战争导致的需求激增和疯狂购买，会使石油价格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但是几乎没有料到的是石油价格会再次上涨，1979年上涨达50%以上；也没有料到实际石油价格在70年代会两次下跌，紧接1976年上升20%后，1977年下跌约9%，又于1983~1984年平均下跌30%以上。

首次石油价格上升不仅创造了800亿石油美元的赢余用于银行流通，因而增加了金融市场及在金融市场运转的机构的重要性，而且它也引入了一种新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通常十分难以预测的因素，不仅影响消费者而且最终影响石油生产国的收支平衡头寸。

以德国为例，由于高度依赖石油进口，首次石油价格上升导致德国马克根据贸易加权货币篮子基数，从1973年中期的121点下降到1975年末的116点。但是德国采取了十分强硬的金融政策足以使利率再次回升，但是在1981年第二次石油价格上升后马克又遭到一次打击。日本通过扩大出口来支付更昂贵的石油费用，其易受影响性和反应尤其显著。1972~1981年，日元上下波动幅度巨大，从1973年7月、1978年10月和1981年9月的三个“最高点”下跌（紧接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到1974年和1980年的两个“最底点”。在这些点上，美元和英镑从外汇市场得到的反应截然与日元不同。

石油价格变化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影响，这一点对世界经济的全面稳定非常

重要，主要是因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互之间的相互贸易最多。它们之间的贸易组成了世界贸易的绝大部分。正是它们在彼此经济中的投资最多，并且构成了大部分国际资本流量。因此也是这些国家向国际外汇和信用市场提供了大部分业务。面对历史记录很难不同意以下的结论：（1）石油价格促成了汇率不稳定；（2）除非石油价格变得更稳定一些或石油在世界贸易和国际支付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否则这些汇率难以得到稳定。国家可以通过在石油方面更自给自足或开发对自己的支付平衡和货币的外在价值影响更小的能源，来达到这一点。

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不同汇率之间的不一致可能是引起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绝大多数破坏的原因，但是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看来对石油价格的这种不平衡的模式造成的后果感受最强烈。根据 1972 年的基数，尽管欠发达国家的其他商品的价格在 1973 年超过了石油价格，但是这些商品中，没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后来赶上了石油价格；到了 1981 年，以实际价格来看，食品价格、农业原料价格和矿物价格几乎都低于石油价格的六分之一。总之，石油价格指数超过其他所有物品如食品、农业原料和矿物的价格指数 5 倍或更多。尽管 70 年代中期欧佩克的赢余允许发展中的非产油国（NOPECs）可以借足够的钱以支付更加昂贵的石油，但是它们的发展战略马上变得更容易遭受石油价格上升、或利率上涨、或美元升值、或这些因素联合起来的影响。例如，对一个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可能因石油价格下降 1%，本国的支付平衡获得上百万美元的赢余；但它同样可能因银行贷款利率上涨 1%，遭到 10 亿美元的

亏损。而对于另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债务国和石油出口国墨西哥来说，两种变化都将是灾难性的。

和许多其他国家和企业一样，发展中的非产油国突然发现自己正在玩蛇梯棋游戏。对它们而言，一方面一些梯子变长了，但同时蛇也變得更多、一些蛇也变得更长了。长期选择的决策，尤其是在能源或食品生产方面的决策，变成了一种复杂的赌博。典型的例子是巴西在巴拉那河流上建立的伊泰普大型水电项目，巴拉圭是这一项目的较小的合作伙伴。从长远来看，这个大坝上水轮机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26亿千瓦，比世界上任何水电项目的发电量都要大。但是对此建设项目的经济估算是70年代早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

从长远的角度，独立供给廉价的电力从费用和国家安全两方面来说对巴西都是正确的政策。但是为此建设项目和其他一些花费很大的项目筹措资金的信用价格致使巴西不愿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银行寻求援助——因为对于一个仅在几个月以前，还为自己没有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来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银行寻求援助是一件令国人感到屈辱的事情。

至于利率，问题不仅在于石油的价格很贵，而且更在于它们十分难以预测、非常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又导致在巨型金融赌场中出现一种新游戏——石油期货。它是以下列方式发展起来的。本世纪80年代随着欧佩克对石油市场的控制减弱，一些石油生产商急需外汇，情愿以低于一致的价格进行秘密的背后交易，因此越来越多的石油在所谓的鹿特丹的现货市场进行交易。称作“现货市场”十分具

有误导性，因为它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其中的买卖双方均可以被确定的、价格对所有人都公开的市场，而仅仅是大约由 100 名石油交易商和经纪人组成的、通过长途洲际电话和电传相互联系在一起网络。和经营粮食、猪肉、或冻橙汁的其他经纪人一样，他们往往故意使市场价格上下浮动从中牟取更大的利益。1978 年，现货市场的交易仅占石油总交易的 5%，而现在占到了 40% 或更大。不可避免地，由于通常以美元标价的石油价格和外汇市场的美元价格之间联系十分紧密，在伦敦和纽约渐渐发展成了一个“纸桶”期货市场，与以美元和美元资产的远期和期货市场相适应。这些“纸桶”合同可以转手多达 50 次，而不必基于实际石油的桶数。估计英国北海油田的布伦特油田的原油和天然气等混合物的期货合同量高达布伦特油田年总产量的 8 倍（胡普尔，1985）。

总之，毋庸置疑，汇率的不稳定促使石油市场更趋于不稳定，现在石油市场将自身的赌博游戏扩大到所有其他赌博游戏中。

更强的市场或更弱的政府？

到此为止，展现了一幅国际金融体系的图画，其中赌场中的赌客有时看来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许多人已经在思考是否政府在过去的 15 年变得软弱了，还是各种经济力量同时出现这种巧合使市场变得更加强大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将指明采取何种行动以控制、缓和或关闭巨型金融赌场中的赌博游戏。

上面的问题与第二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是所有国家与

市场相比都变软弱了还是只有一个国家或仅有几个更重要的国家变软弱了？那些认为所有国家变软弱了的人倾向于对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作出很宽泛的解释。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往往最模糊最概括。与之相对应，那些认为仅仅几个国家变软弱或甚至只有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大国美国变软弱——所有的数据都表明这一点——的人，倾向于提出更详细的解释和更具体的解决办法。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解释既有来自政治左翼的也有来自政治右翼的，双方都抓住了部分答案。左翼方面欣赏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中所起的作用。开放，指的是不仅对国际贸易开放，还有对投资和跨国生产的开放（布洛克，1977；华勒斯坦，1979；麦格多夫和斯威奇，1969；帕尔博尼，1980）。他们说工业发达国家现在不是争夺对地域、人及对资源的控制，而是代表自己的生产商争夺世界市场的份额。

这种看法和美国右翼的学院派学者对国家政策的一些分析相同（吉尔平、克拉斯纳、卡岑施泰因及其他人）。处于一个开放、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中的国家，如果要在经济增长和市场份额里占有一席之地，不仅需要军事战略，而且需要科学和工业战略。日本在这种新游戏中看来比美国更成功；这种论点辩驳道，美国以英国为榜样，让自己的金融机构，尤其通过投资，积累别国金融机构的财富和力量，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力量和财富。

整个70年代，世界经济中的霸权行为将导致霸权自我毁灭，这种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美国所有的刊物和研究项目都致力于当时所谓的“霸权稳定理论”研究。这个

观点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不得不由一个主要国家或霸权来维持。但是这里有一个“霸权的两难局面”，即在维持世界经济时，霸权（即美国）毁灭了自身。因此，如果世界经济没有以前那么稳定，这一定是因为美国丧失了国力，而美国丧失了国力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承担了充当霸权的负担（克拉斯纳，1983；基奥恩，1984）。

对大多数置身于美国国境之外的人来说，这种论点无异于一种复杂但却并不令人信服的借口。很难将这种悲戚的抱怨和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就金融体系而言，美国银行的规模和影响调和起来（桑普森，1981）。美国银行使全球普遍使用、接受美元，这样致使美国不像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那样容易受汇率和其他价格变化的影响，我在前面解释过这一点。许多美国人并不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美国的国内货币政策改变方向时，当美国的利率对政策改变作出反应时，其他国家毫无选择，只好调整自己的利率和自己的国内政策以适应这些变化。然而，相反的情况却从未发生过。

更有说服力的论点有时也由同一批学者提出来，这个论点是：美国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是——并且过去一直是——一个“弱国”，即美国政府遭到压力集团的渗透，受到每一个拥有否决积极政策的“黑球”的特别利益集团的摆布，因此没有一种对普遍国民利益强烈的或一致的追求。这种情形与革命后的看来像“强国”的中国或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国家虚弱的原因部分可以归结于其宪法，以及宪法规定的分权原则，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部分可归因于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意识形态，即市场经济中，

经济企业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被奉为是神圣的政治信条。

但是美国银行从这种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十分巨大的利益，并且使自己免受美国政府金融力量风险巨大的运营后果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美国提得比较少，可能因为这一点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的人民而言不太明显；或者因为它暗示了承认美国对市场或资本主义制度所依赖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负有责任，这种承认在美国不受欢迎。在美国社会里，银行和大企业作为一方，可以在多数情况下，在这种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利、生存下来；而作为另一方的农民、工人和小企业发现，获利或生存困难得多。因此，这两方之间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利益冲突。只要通过各种短期措施可以使美国人的生活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的生活看来更好一些，就没有多少政客——不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的政客——发现值得关注体系的不平衡。

众所周知，美国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政治眼界往往十分有限。美国政客有限的视野和短视的政治眼界比其他国家的政客对体系的影响要大得多。过去15年的记录表明：在作出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某些关键决策时，历届美国政府更多地考虑短期国内利益，而不是关注建立一个健康、秩序良好、稳定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长期国家利益，这种金融体系可以维持一种健康、稳定、繁荣的世界经济。

第2章 关键决策及其后果

我们正在寻找改变了近代世界经济史进程的关键决策，是它们塑造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在民族、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中成本和利益、盈利和亏损、风险和机遇等方面的变化。但是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清楚地知道我们所说的关键决策指的是什么，我们将准备寻找什么，将包括什么。

首先，我们来分析货币体系。比方说，这里的决策和国际外交关系研究中的决策不是一回事。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国家决定发动战争、缔造和平、缔结同盟或者干涉别国事务。行动发生在外交部长和外交官之间，关键决策由他们作出。货币体系则完全不同。在现实的世界里——尽管和经济理论的理想境界不总是完全相同——货币体系必须要同时具有政治权威和市场两个方面。只要买卖双方的经济交易不是完全依照第三方的命令进行，那么市场就不可或缺。如果买卖双方有一定的自由决定权，不论权利多么有限，并且如果他们的交易不是通过物物交换，那么货币就成为一种必需品。但是一种货币体系不可能有效运转，除非有政治权威告知必须使用或者可以使用某种货币来执行已达成的货币交易以及对体系中的主要经营者发放许可，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

这表明：在货币体系里，关键决策的缘由可以追溯到市场和政治权威两方面。当市场规模和特征发生变化时——甚至可能是其中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权威可以决定作出或不作出反应。控制市场的权威的位置发生变化，或可能该权威关注的目标或优先事物发生变化也可能导致关键决策。但是不管缘由如何，不论是源于市场还是权威，决策都是由政治权威作出的。它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决策，例如，以规则或资源进行干预以影响或限制市场；也可能是一个消极的决策（即非决策），让市场放任自流，给予市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由。因此，在这种货币环境下，关键决策同市场与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的均势之间的联系比同国与国之间的均势联系更多。

总体上说，非决策很可能比积极决策更常见。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市场的全球化；另一个是技术变化加速。对于第一个原因而言，只要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主体上是属于各个国家的，那么国家权威便可以控制他们，并决定给予多大程度的管制。但是一旦市场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简言之，成为全球性的，这时通常是由所有有关国家签署集体协定，或有时由一个主要国家来实施权威。尽管其他国家表示同意，但如果主要国家不希望采取行动，或如果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家拒绝合作，这时将会出现非决策。这样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决定不继续谈判、签署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经过多年磋商谈判后反复耐心修改的文本。另一个例子是对特别提款权的谈判，开始时被美国拖延，后来因欧洲国家的分歧被搁置。至于技术原因，创造者和倡导者的聪明才智往往把政府甩在后面。这种现象已经发

生在一些杀虫剂、短波广播和许多合成材料的项目上。它也可以发生在金融创新上。

甚至简单常见的电传技术，当用于传输政治上敏感的新闻或思想以及日常商业信息时，也比监控、检查跨越国界的信息流通的政府的管制技高一筹。金融领域中，不断进步的技术非常明显地将管制当局远远甩在后面，不仅利用通讯、数据收集及检索方法的机械技术如此，甚至管制当局从未梦想过的全新信贷工具或金融交易形式的金融技术也不例外。

本书在前面谈到，以非决策形式存在的被动决策可以和积极决策一样重要，并影响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结构权力变化，这一点可以随便找一些非货币形式的例子来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改变了拥有大量粮食储备的政策。当时的农业部长，厄尔·巴茨（Earl Butz）作出这个决策是基于国内的政策考虑：人们普遍认为，拥有这些储备的费用太高。因此，美国农业部开始在市场上出售这些储备，截止到1970年储备几乎所剩无几。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世界粮食价格非常稳定，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稳定更多的归因于北美的储备，而不是十分不稳定的国际小麦协定（摩根，1979；霍普金斯与普哈拉，1979；戴维斯，1984）。只要有储备，不论全球各地的收成多么糟糕，想靠突然提高粮食价格进行投机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可以随时以储备来减缓粮食不足。然而，一旦储备枯竭，没有这种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投机者的头上，就完全有可能造成粮食价格飞涨，或在适当的时候，使价格下跌，苏联1972年大量购买粮食的事件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

例子。不论上涨还是下跌时，买方与卖方——及买卖双方和谷物经纪人——之间的议价力量平衡将发生变化，进、出口国的收支平衡遭到重大影响。又使一个重要的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将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里。然而，这种关键决策不是通过国际谈判，而是针对美国农民作出的国内决策。

在同一政策领域，另一个例子是里根政府 1983 年采取的以实物支付（PIK）以减轻这些农民压力的政策。由于粮食的价格太低，农民甚至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他们通常不能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从银行借款的利息。政府又一次用储备——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得到重建——进行干预：农民因同意休耕而受到的损失由政府发放给农民相应的粮食，农民可以进行出售。后来的结果是农民主要因粮食价格提高而获益，但是化肥、杀虫剂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商因销售额猛跌而叫苦连天。因此，干预某一个市场往往对相关市场的议价力量平衡产生影响。

我刚刚提及的关于海洋法的纷争具有同样的反响。由于联邦政府和德克萨斯州政府对发放在墨西哥湾的石油开采许可证各自拥有的权利意见不一致，因此有必要重新谈判以达成一套关于州政府在海岸线之外的管辖权的某种规定。自 18 世纪以来，国际惯例已接受将格劳秀斯的三海里作为国家在沿海水域的主权范围。杜鲁门总统于 1948 年宣布了关于国家对大陆架的管辖权扩展到距海岸线 200 海里，重申了联邦政府的权威高于州政府。其他国家紧接着纷纷效仿，它们甚至超过了美国所声称的 200 海里的范围。这对渔民（更不用提鱼了）、对石油公司、对像英国或挪威那

样的新兴石油生产国、对像设得兰岛那样的偏远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当英国和芬兰第一次在“鳕鱼战争”中为未决的离岸捕鱼权进行争夺时，甚至国际关系也受到了影响。后来英国和丹麦——两者均为欧共体成员国——也在“英国”水域就丹麦的捕鱼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具体事例及其他很多例子里，多数人不会反对下面这个观点，即在这些人不安的对先例或传统的背离中，任何一种背离都确实是我早已定义的关键决策。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将其更广的内涵普遍用于讨论国际经济中权力的本质以及权力的集中。如，首先致力于这个问题并作出了不小贡献的两名美国教授鲍勃·基奥恩（Bob Keohane）和乔·奈（Joe Nye）几年前对国家遭受“相互依赖”——即在贸易、投资、生产原料、保险及其他在全球出售的服务等方面相互依赖——的后果的“脆弱性”和“灵敏性”作了有用的区分。这里，相互依赖指的是在贸易、投资、生产原料、保险及其他在全球出售的服务方面的依赖（基奥恩与奈，1977）。对源于这种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变化，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灵敏程度不一样。但是一些更灵敏的国家与别的国家相比有更强的能力避免或补偿这种相互依赖产生的不利后果。因此，与灵敏性相比，脆弱性显得更加不均衡。但是在进一步讨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力量分配及所谓的“政权变更”的原因时，他们似乎假定脆弱性的不均衡是因为政治结构中的权力不平等造成的结果——弱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自卫的能力比强国小一些——或者是因为盲目的经济力量的结果。他们提出，政权变更可以被归结为政治力量或经济过程的相对变化（或

者他们进一步提出，掌管“政权”的国际组织内部的变化)。因此，提出“谁有权影响变化”这一问题的思路，走得并不太远。它并没有承认作为政治结构的补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它也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在作出调节、改变和塑造经济结构的国内决策时权力不平等。但是国家在作出关键决策时不可避免地、很自然地予以关注的恰好是这种“结构”力量。因此问题是：“什么是关键决策？”

当谈到世界的货币和金融结构时，人们通常会写下关于经济趋势（如商品市场的起伏）、金融图表以及指数的变化，似乎它们确实是盲目的经济力量。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市场仅仅存在于国家的许可和权威之下，而且它们以国家命令的或允许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只有少数“黑市”，如多数国家的毒品市场，部分国家的武器、堕胎、赃物、走私品、现款劳动等市场，存在于国家的法律之外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尽管政府努力想关闭这些黑市，想对它们征税或控制它们，但是考虑到公开合法市场十分巨大，黑市相比而言微不足道。因此，更重要的是回顾某种当局—市场之间的关系的细节，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以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人于何时为何原因作出关键决策来规定那种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认识到与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密切相关的这些关系的根源，大多数通常很久远。我们有时必须回到古老的历史中去找寻第一次就某种问题作出决策的那些时刻，尽管今天这些“决策”已成为“事实”。同样，如果有人今天递给我一支香烟，我可能会回答“谢谢，我不抽烟”。这看来像陈述事实。但是我不抽烟这一事实的缘

起是多年以前我决定戒烟。这和国家的决策如出一辙：他们的决策很快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如此，以至于这些决策变成了无需质疑的“生活中的事实”。

其次，我认为在当今的国际货币结构中，集体管理（collective management）中的任何变化——不论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变化——均由美国发起（斯特兰奇，1976）。当然有时美国不得不因为来自富有的盟国的提示和外交压力作出其他国家认为必要的或合乎它们心意的决策（如，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压力迫使美国在1960~1961年建立了黄金总库）。但是提示者和施压者不能自行作出决定；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享有这种压倒一切的力量来阻挠变化发生或发起变化。再者，由于上面列举的关键决策的非货币本质，因此寻找关键决策不能仅仅停留在多边协议和国际组织达成的协议上，而是必须包括在许多重要的金融市场里针对私营者作出的国内政策。

五种以往的非决策（non-decisions）

我首先简要依次回顾支持这些论点中的每一个论点的一些证据。对于导致目前的困境的决策深深根源于过去这个观点，至少有五种决策——或主要是非决策——出现在我脑海中，列一个更长的名单也并不难。

50年代早期便有这样一个非决策，当时美国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成员国承担一部分欧洲防务费用以分担美国的财务负担，欧洲成员国未作出反应。当时，欧洲人认为他们仅需支付很少一部分费用，因为美国人有原子弹，并且原子弹的开发费用已经支付过了。但是俄国人没有原

子弹。美国需要欧洲的军事基地，美国在欧洲驻军一方面使俄国人确信并使欧洲人坚信，美国会说话算话，对铁幕（iron curtain）分界线寸步不让；另一方面一旦俄国人发动一场常规战争，不论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美国将参战。在核保护伞的安全保护下，欧洲人——甚至那些参与欧洲运动的人——认为完全可以忘记建立欧洲自己的军队的梦想；自法国国民议会于1954年拒绝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提议后，再也无人提及此事。这种非决策养成了欧洲人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习愤。甚至当情况发生变化，苏联不仅成功研制原子弹而且找到发射办法时；当核弹军备竞赛升级，双方的费用急剧上升，到了美国发现自身陷人长期预算赤字和同时伴有的收支平衡逆差的两难境地时，欧洲人的这个习惯仍未得到改变。这个故事我们太熟悉了。关于欧洲在50年代早期的非决策的关键点是：如果他们没采取那种态度（当他们发现时机发生变化时，也很难逆转），至少一些困扰世界货币体系的困境可以得到避免。

50年代的一些其他重要非决策与未能就提供信贷条款和管理债务的体系或程序达成一致协议。这里有3个单独的问题，对任何一个问题，战后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国都未能达成可能避免今后许多问题发生的决定，也许最根本的一点是1957年反对建立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Special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UNFED）。我认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拒绝理由完全没有根据。后来出现的信用，起初是公共双边信用，后来是私有部门以直接投资和欧洲货币银行贷款的方式提供信用，就它们而言，下述的论点是不正确的，即富国无法提供联

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如果他们采取这一冒险行动设立此项基金会使自己的经济赤贫；或大规模援助会导致危险的通货膨胀（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实际上，他们以少得可怜的特别基金及一系列更少、更迟的减轻措施来敷衍，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的增加、联合国十年发展计划等等）。当然，这种发展基金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会导致新问题产生。接下来会导致更难的决定，面临更艰难的选择，会产生新的风险，例如，设立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后来的批评者们所讽刺的“贫困工业”，向浪费、腐败及各种各样的无意义之事敞开大门所面临的风险。但是联合国发展基金至少开了一条重要先河，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多边资源（multilateral resource）。较之后来发生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记录的更不稳定的资金流量，这些资源被用来作为稳定剂可能使体系更能趋于稳定，减少政治动荡，并可以引导投资更有目的地投入长期建设项目。

第二个有长远影响的失策是许多国家集体拒绝建立任何处理国际坏账的标准程序。坏账问题毕竟不是50年代出现的新问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此前一百年以来一直未能支付向外国债权人所借款项的利息并返还本金。别的国家及其国民很有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如果不是就每个案件采取专门措施，而是预先同意建立与国家体系中破产处理相对应的一些标准程序和基本规定，因赖账可能不还而引发的震惊、动荡、武力威胁不会如此轻易地导致对体系丧失信心。截止到50年代末，部分债务问题开始出现，后来问

题越来越多，很明显主要债权国更加珍视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一个更有序的程序可能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的任何利益（斯特兰奇，1976）。每次都专门为处理每一个案件成立一个债权人协会。每一次，债权人之间就谁将被支付旧债的比例，谁将提供必要的新贷款的数额从零开始进行谈判。每次，债务国，不论是在旧的或新的（好一点）政府领导下，不得和债权国就恢复正常信誉的条件进行讨价还价。这不难看出原因，因为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是债权国手中的讨价还价的一个有用的武器，可以根据国家的战略重点和政府的国内特点及前景决定有节制地还是无情地运用这个武器。但是没有制定任何明确规则，也就意味着金融体系在70、80年代变得更脆弱，更不稳定。比如，墨西哥重新安排债务支付计划的不确定性肯定会波及巴西，导致其债务滚积；正如波兰重新安排债务支付计划的不确定性会波及到匈牙利一样。

与债权人协会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管理工业出口国在捆绑援助及信贷补贴和出口合同保险上的竞争。这两种政策可以相互紧密替代。如果政府提供捆绑援助，它提出的凭单只能由自己的出口来偿付。如果政府补贴某代理机构，该机构以优厚条件向国内出口商提供出口信贷保险，政府向进口自己国内商品的进口商提供贴现，与进口他国商品的进口商进行竞争。考虑到有许多可选择的方式，美国、欧洲和后来的日本采纳了某些不同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开始由“信用保险者巴塞尔联盟”这个无名机构发起，后来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君子协定”不时被打破的原因。在这些协定里，主要工业国承诺

不通过恶性竞争向债务国提供出口信贷。但是由于他们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白热化,承诺总是被打破,以至于很难确定在任何时刻游戏中的所有竞争国究竟向某些具体的国家提供了多少短期出口信贷。因为,任何时候当一个负债国看来要陷入困境时,它只能以更短的借款来偿还到期的旧债。在所有可以得到的短期信贷中,出口信贷是最容易获得的。但是收集有关信贷的数额和条件的信息通常很缓慢而且不完整^①(参见图 2-1 和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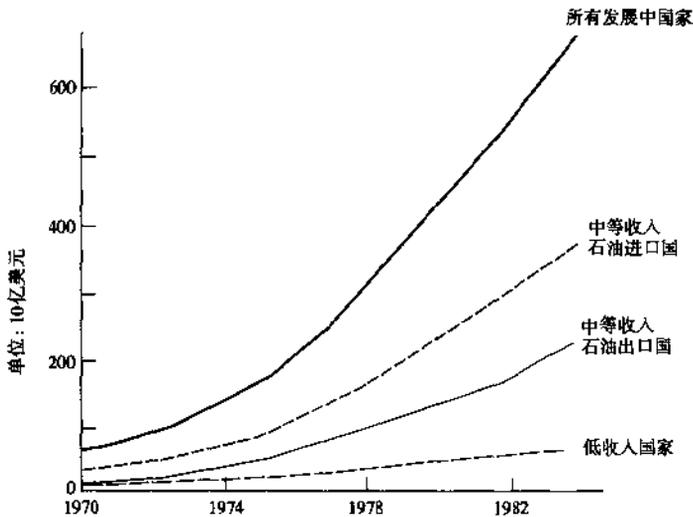


图 2-1 欠发达国家未偿付的债务

资料来源: OECD 发展合作。

^① 参看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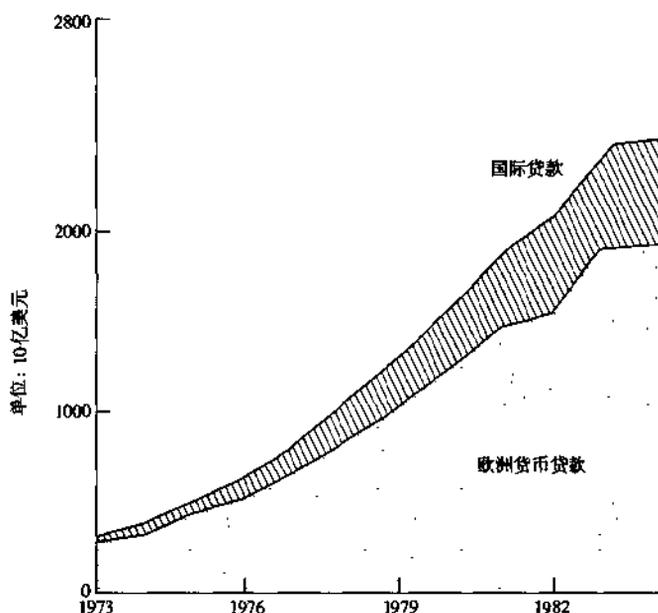


图 2-2 国际贷款和欧洲贷款的数额, 1973~1984

资料来源:《BIS 季度报告 1974~1985》,除了 1984 年的数据是第 3 季度的数据以外所有数据表明每年第 4 季度的数额。

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阶段,即 50 年代中期当问题首先成为一个议题时,达成协议并采取行动,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我想说,有关的债权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的决策,但是别人会说这是国际体系不可避免的后果。依据这种观点,不断变化的世界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使国际关系的政治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国家之间不再为土地和人口进行激烈竞争,而是受经济和技术变化的驱

动争夺技术领先地位和占有世界市场更大的份额。他们需要这些以获取更多的权利、更大的财富，因此批评他们的自然行为未免太天真了。我的观点是尽管现代世界里确实存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但不是整个事实。如果它是真的话，为什么它们会努力调节彼此之间的竞争？试图达成关于出口信贷游戏的规则的君子协定——最近一次是在1982年——的努力恰好确切表明每一个国家都共同关心，希望保持一个开放、自由、竞争的世界经济。任何时候，所有国际事务，在两种必要性——竞争的必要性和缓和竞争以保持秩序的必要性——之间总有一个难以确定的交易。因此，在选择采取何种出口信贷游戏的一致规则时，有某种程度的选择自由。毕竟，当政府试图决定什么规则适用于陆上和海上的战争行为，或和平时外交人员享有何种程度的豁免权时，政府面临同样的平衡选择。人们普遍容易犯的不幸错误是：设想在有关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或市场经济中的公司及国家行为中存在着根本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消费斗士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曾经回忆，关于美国在上个世纪末背离联邦政府授予公司特许权的原则，没有无法避免的事情（纳德，1976）。这种背离致使股东权利削弱，导致拥有多数股权的股东和后来的经理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扩大、合并或以其他方式经营大公司的业务。基于这些政治决策，所有工业国，尤其是美国，有经济集中的强烈趋势，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在其经典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描述。此书写于1932年，为后来的更有名的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作品奠定了大部分基础。《现代公

司和私有财产》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实验证据，证明现代经济被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市场力量仍然起作用决定价格，另一方面经济权利的集中允许强大的公司来“管理”价格。它也对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ger）和其他人的早期作品中谈到的关于所谓的跨国公司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预测。伯利和米恩斯所著该书的最后一段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现代公司的兴起导致了经济力量的集中，这种集中致使它们能够与现代国家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经济力量对抗政治力量，这两种力量均在各自的领域非常强大。国家在某些方面试图管制公司，而逐渐变得日益强大的公司努力避免这种管制。当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公司甚至试图主导国家。将来人们也许将看到经济有机体——现在以公司为代表——不仅和国家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而且甚至可能取代国家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相应地，公司法可能被视为新经济国家的潜在宪法，同时商业实践日益具有经济治国的特征。

在我们放下为形成我们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助有一臂之力的远期决策（或非决策）的名单时，需特别提及的是英国在战后的一个决策可以被视为后来的困难和困境的远期根源之一。1951年当时的英国商务大臣威尔逊允许伦敦商品市场重新开放以从事国际贸易。这样，他同意工党政府重新复兴伦敦商业城，作为向全世界的银行家和所有的

金融经营者开放的金融市场，使之比任何其他市场更开放。当时，使英格兰银行比国家化更向前迈了一步，这种思想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十分相近，甚至和凯恩斯对资本家的讥讽观点也差不多。这种有一点象征性的步骤，后来本来可以采取政策阻止伦敦商业城这样一个机构的复苏。而且，这一个机构被工党中威尔逊的许多老同事认为是一个特权堡垒、统治阶级的权利基础并且是一个致命的磁石，它将人才和资源从英国工业现代化中吸引出来，因而不能提高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我在别处谈到：重新开放伦敦金融市场，英国政府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不愿放弃英镑在国际货币的地位，致使英镑与其他欧洲货币相比更容易受国际收支逆差的投机造成的损害（斯特兰奇，1971）。整个50、60年代，正是这种脆弱性致使英国对信用和工业采取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政府财政政策。这对英国的工业管理、工业关系和工会的谈判策略及银行和其他重要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产生了最坏的影响（胡，1984）。

如战时一样，长期关闭伦敦商业城，使之不再成为对世界开放的市场，也许并不能避免所有这些困境。诚然，这样的决策有利也有弊，机会和风险同在。但是与威尔逊首先未仔细考虑的（典型短视的）促使它新生的步骤所造成的影响相比，我仍然相信，关闭的最终结果对英国社会和英国经济要好一些。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如果没有伦敦市场随时准备在写有“欢迎”的垫子上迎接美国银行，谁能说美国银行的国际化会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剧烈呢？威尔逊1964年当选为首相重新掌权时大门依然敞开着，欢迎的垫子仍然还在。到那时，美国大银行已经到达伦敦以欧

洲美元从事赚钱的生意。一个以熟知经济学自诩的社会主义政客居然允许一个完全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在自己家门口生长，并对所引起的长期后果如此漠不关心，太令人惊讶了。

80年代的货币问题及经济困难的长期根源就谈到这里。我将提出的另外一个看法是发生在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集体管理中的所有变化——不论是改革还是倒退——没有一种变化不是由美国发起或得到美国支持的。尽管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将只选择集体管理中自1971年以来5个我认为支持这个论点的重大非决策的例子。

自由放任的市场，1972年

第一个采用不干预外汇市场的非决策是在1971年史密森协定后作出的。这个允许美元贬值（如尼克松和康纳利所愿）的协定被认为将恢复以固定汇率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美国拒绝干预外汇市场来支持宣称的目标。这是华盛顿（更确切地说是美国财政部）在决定抑制和拉平美元在外汇市场的汇率短期浮动时，推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更好的判断的直接结果。1961~1975年负责美国财政部及其联邦储备业务的查尔斯·库姆斯（Charles Coombs）写道：

就其本质而言，外汇市场是一个紧张、高风险、超敏感的机制，主要适用于短期发展。在每天通过市场清算的上百亿美元的交易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像

对外贸易和长期投资这样的基本方面。实际上，从每天的交易来看，市场主要被寻找快回报或避免汇率风险的套汇保值措施的短期资本移动所主导（库姆斯，1976，我加的黑体）。

长期的工作经验使库姆斯和欧洲央行的银行家持有同样的观点：在这个不稳定的市场里，汇率投机压力累积通常可以因强硬的和适时的政府干预——为抑制投机而购买或出售某种货币——而得到抑制（以适度的费用）。库姆斯认为1971年12月签署的史密斯协定关于主要货币的新平价的“致命弱点”是“美国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帮助保卫新的平价结构”（库姆斯，1976，第225页）。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不断作出（多数情况下不成功）努力想说服财政部让他在市场上显示美国支持脆弱的史密斯结构的决心。比如，1972年5月，库姆斯和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提出的建议，被一位财政部官员公开否认和推翻。但是1972年的英镑危机为他们带来了一点希望，库姆斯被允许重新开始在市场上进行操作并激活互换网络。伯恩斯宣布美国将在恢复外汇市场的秩序时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库姆斯时，美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同时美国将在交易认为可行的任何范围内和任何时期继续这样做。但是华盛顿几乎立刻以一个不容辩驳的电话责令取消这一宣布。尽管结果证明这么有限的短期干预也是成功的，但是华盛顿仍然顽固不化。甚至在1973年5月又一次严重得多的美元汇率下跌横扫整个市场，导致当年7月德国马克比2月份的汇率上涨30%，贸易几乎出现停滞

时，财政部再一次介入，限制对“保护性操作”进行干预。根据库姆斯的观点，上述方式的费用比采取强硬措施费用更大，因为它给市场造成一种致命的软弱印象并且使市场对美元的未来缺乏信心。而且，美国的这种非决策完全与中央银行前一个周末在巴塞尔签署的共同采取行动保持利率的联合申明背道而驰。此后两年，纽约市场缺乏政府有力的干预导致库姆斯所谓美元与欧洲大陆货币相比时“荒谬、有害的摇摆”，这些摇摆通常是对一些相对细微、短期的干扰或短时间的担心和忧虑的反应。仅仅用了6个月时间，即从4个主要央行的行长——伯恩斯（Burns），洛伊特维勒（Leutwiler），克拉森（Klasen）和埃明格尔（Emminger）——在1975年2月的希思罗机场会议到第二年的夏天，总算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

在这段重大的时期内，库姆斯和其他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没有宣称当通货膨胀率差别很大、货币明显严重贬值或升值时，货币管理当局干预市场可以防止周期性的汇率调整。他们的观点是外汇市场中不必要的、过大的波动可以被制止，并且不会增加货币管理当局的费用。如不进行干预，中央银行通常在一段时间里差不多能够自保其身，即使他们按规定进行操作在某一天、某一周或某一月看来支出过大。华盛顿在这些年里没有听取联邦储备银行和欧洲人的建议，重大的后果在于极大地鼓励了当时的投机狂潮，不仅外汇市场而且其他市场出现了投机热。正如库姆斯于1973年夏天石油危机前所写的：损害不仅限于外汇市场。当接二连三的美元贬值和疲软激起了世界商品市场的投机购买，尤其激化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那些货币随美

元一道贬值的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时，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聚集了冲力。

无规章的体制(The no - rules regime), 1972 年

也许第二个重要的非决策开始时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决策。这个非决策使国际货币体系的集体管理和多边谈判倒退了一步，却朝着无政府主义和单边主义迈进了一步。一旦尼克松—康纳利于 1971 年成功地实行了美元贬值，美国便决定不退回到某种变通的金本位制度——即通常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决定不建立一套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努力解决的有关调整、储备和汇率管理的规则。1972 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由成员国邮寄投票建立一个二十国集团 (Committee of Twenty) 继续讨论在基金秘书处早已成型的国际货币改革方案，这种非决策当时看来好似决策。实际上，这些讨论已经被一系列的事件——尤其是美元贬值——取代了，正如 1970 年发行的特别提款权迅速被私人机构的欧洲货币贷款扩张吞没一样。

然而许多紧密卷入这些事件的专家只看到技术之树而看不到政治之林。他们仍然可笑地认为经济理性和国际善意会战胜所有困难，并将引导走向一个更好更有序的世界 (如，肖恩菲尔德，1976；威廉森，1977)。但是，事实上美国使美元贬值后，于 1971 年 8 月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美国已不再受黄金兑换标准任何微小的限制。尽管特里芬所谓的“美元纸币本位”代替了金本位，赋予美国的决策者更大的自由，美国仍然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便作为看家狗和牧羊犬使其他成员国遵守秩序也好。在

英国的协助下，华盛顿成功地搞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总裁皮埃尔-保罗·施魏策尔（Pierre-Paul Schweitzer）。但是新获得的自由迟早需要以协定条款（Articles of Agreement）修正案的形式使之合法化，而且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事情通过基金组织以多边的外衣比美国单方面操作会更好一些。自1971年12月上旬尼克松和蓬皮杜达成亚述尔协议（Azores rapprochement）以来，也需要修复前一年8月遭到严重损坏的跨大西洋关系（以及跨太平洋关系）。但是由于美国在十国集团（Group of Ten）中完全被孤立，美国人认为最好不要在十国集团内完成这项任务（威廉森，1977，第61页）。和以前许多场合一样（旧金山是第一次），美国发现在对付欧洲盟国时，邀请其他国家参加讨论可以避免陷入令人尴尬的争吵中。在更大的会议上，总能包抄并以多数票打败欧洲人。

因此，在二十国委员会上（Committee of Twenty）上演了一出十分滑稽可笑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报告的讨论的闹剧。这个报告由基金组织的官员拟订，报告中详细列出了重建体系中的秩序的“可行”方案。所谓“可行方案”，指的是由货币改革者提出的方案。此报告于1972年基金组织年度会议召开前一个月被出版了，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都表示欢迎，认为可作为会议的讨论议程。康纳利的继任者，美国财政部的乔治·舒尔茨炮制了自己的反提案，提议以新游戏规则取代旧规则，即国家可以决定采纳调整政策或者根据储备的盈余或不足上下浮动汇率。作为回报，一旦美国资金流动头寸许可，美国将恢复黄金—美

元兑换体系。当希腊日历出现时 (Greek Kalends)^①，才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轻慢承诺明显表明华盛顿对整个事务的蔑视。

约翰·威廉森 (John Williamson) 对谈判的讲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后来努力解释为什么二十国集团如此命运多舛，如，邪恶的世界、国家利益相互冲突、谈判程序复杂、不能相互理解等。他所做的努力非常尽心尽职但一点没有必要。事实很简单：没有一致的动机或可对抗的高压力量可以使美国放弃 1971 年赢得的超级过度特权，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谈到这一点。所有有关改革的滑稽表演所取得的成就是：为修改基金组织协议条款赢得了一定的时间。这样每一个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可以合法地自由选择汇率政策而无需退出或毁坏这样一个有用的多边组织。

1973 年，拒绝与欧佩克谈判

由于大家都很熟悉第三个集体管理的非决策，所以只需简单介绍一下。它与美国对 1973 年 10 月欧佩克石油提价的反应以及后来美国在 1974 年 2 月华盛顿会议上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提议有关。英国和法国提议，考虑到发展中的石油进口国即所谓的非欧佩克成员国会发生的巨额赤字，应立即大量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力量。这个建议比后来采取的措施要温和理性得多，即制定一套和欧佩克谈判的程序来善意地接受石油价格上涨，并且以其指数作为美元贬值的依据，反过来寻找可以使未来石油

^① 表示不能兑现的承诺。——译者注

价格更稳定的措施。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有点太偏向阿拉伯人了，对无礼的新来者过于卑躬屈膝。但是如果当时（而不是后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就不至于70年代出现严重依赖银行体系来对付“石油美元的流通”的情形。只要有大量欧佩克盈余用于流通，并且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信心，这种依赖便可以容忍。但是后来于1978~1979年第二次提高石油价格，致使政府考虑如何说服银行不要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削减得太快。

在1973~1974年美国对欧佩克的情绪化反应里，有两个相关的非决策，每一个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是对石油生产国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另一个是对发展中的石油消费国，即发展中的非欧佩克成员国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回过头来看，这两种态度都是致命的短视。与欧佩克对抗并没有走得像华盛顿的鹰派希望的那样远，但是它确实导致亨利·基辛格建议以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形式成立一个消费者联盟。该机构在改善石油安全供应方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它使阿拉伯国家（不包括埃及）相信美国在阿以冲突上远非公正，相信将他们的石油收入投放在欧洲市场比存放在美国政府证券里或甚至购买美国公司的股份要安全得多。

尽管明显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欧佩克，石油价格会更加混乱，对经济的影响会更糟糕，但是双方的这种不信任仍然持续了10年，双方关系不断恶化。正如埃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当时正确评价一样：“即使欧佩克不存在，工业界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创造某种形式的欧佩克组织”（彭罗斯，1971；米克达施，1985；罗斯托和穆尼

奥, 1976; 罗斯托, 1983)。祖海尔·米克达施 (Zuhayr Mikdashi) 教授仔细审查美国后来对石油生产国的政策后, 发现一系列的美国决策, 无缘无故的令人反感 (我的描述, 不是他的), 并且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和解几乎无济于事。美国首先取消了关于欧佩克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这种做法与关贸总协定相抵触。这种做法排除欧佩克成员国享有一般特惠制 (General Specialized Preference) 授予的、支持从欠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应享有的优惠。在 1974 年《贸易法》的国会修正案里, 前提是欧佩克成员国没有资格享有东京回合谈判取得的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美国本来可以不提出这些侮辱性的小麻烦, 也许该通过谈判来促成为双方的汇兑提供担保。如果美国真这样做的话, 后来的石油恐慌 (石油价格上升和下跌) 无疑不会那样走极端, 它们对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得到缓和。

美国对发展中的石油进口国的困境漠不关心的态度明显表现在: 面临 1974 年 2 月华盛顿会议及法国的压力时, 美国很不情愿地同意参加 1976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IEC)。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 4 个委员会 (能源、金融、贸易和商品) 最后在僵持、厌倦和苦涩中寿终正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维特芬 (Witteveen) 努力从欧佩克的贷款中建立一种特别的石油信贷基金 (Oil Facility), 并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的部分收入用于设立一个信托基金 (Trust Fund), 但这些措施连问题的表面也没有触及。又一次, 由于缺乏美国总统杜鲁门在 1949 年就职

演说中谈到的美国的领导，因此未能产生任何结果。甚至对伊拉克于1979年提出的设立联合欧佩克—经合发组织长期基金——一方面用于补偿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补偿任何原油价格升高——的建议美国也充耳不闻。

缺乏最终贷款人

十年中的五个弯路中的最后一个错误决策，我认为是对1974年银行破产的反应，主要是美国的反应，但其他主要货币管理当局也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赫尔施达特银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圣迭哥第一国民银行和其他银行的相继破产引起了对体系弱点的关注，其中一个弱点是欧洲市场里的许多银行交易不受国家的管制和监控，甚至更严重的是这些欧洲市场的交易可以不以自己国家的货币来进行。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一系列会议的结果是：1975年签署的巴塞尔协定反应出这种错误态度——根据此协议，每个成员国同意增加对自己的商业银行的监管，并担负在必要时提供支援的责任，成立了一个管理国际银行业的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开始的一系列失败并没有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决策者（但有几个明显的例外）大松了一口气，将所有问题抛到脑后，直至七八年后的1984年发生大陆伊利诺斯金融恐慌事件。但有少数明显的例外，我将特别提及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埃米尔·范·伦内普（Emile van Lennep）、中央银行前行长组成三十人集团：包括杰里米·

莫尔塞 (Jeremy Morse)、奥特玛尔·埃明格尔 (Otmar Emminger) 和约翰尼斯·维特芬 (Johannes Witteveen) 等。这个集团的秘书处着手对国际银行业的安全问题进行一系列有用的研究。但是 1974 年废弃了由财政部长和副部长参加的十国集团安排 (这是美国的决定, 见上)。这意味着在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举行的国家元首的不同峰会上, 这些担忧几乎未被注意到。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如其他许多人注意到的——体系由于缺乏最终的贷款人继续遭到损害 (卡来茨基, 1985; 利弗和胡纳, 1985; 利普顿和格里菲斯-琼斯, 1984)。

在任何一个信用市场得到发展并且经济信心和增长依赖于这种信用市场的国家里, 所有政府都发现有必要提供这样一个机构。这样一个权威机构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为了整个体系的利益, 在市场要求更谨慎时, 它不仅能对放贷过度的银行实施惩罚, 而且也能够当银行因体系瘫痪遭受重创时, 有效地鼓励银行更自由地贷款。巴塞尔协定并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机构, 其后果在 1982 年的墨西哥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当时只有由美国、英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才能采取行动。波蒂略总统 (Portillo) 最终退休后, 给他的继任者德拉·马德里总统 (de la Madrid) 留下一个很棘手的工作, 他不得不宣布自己的国家 (在石油跌价银行信心迅速消退后) 无力支付过去的债务。从银行收集关于贷款证券和到期票据的数据不足以代替负责管理 (像任何一匹纯种马一般高度敏感的) 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必须实施的这种减速和加速、紧缩和膨胀 (rein and heels) 之间微妙的平衡。因为最终的贷款人不仅能够在发生灾难

时（如墨西哥和其他事件）提供补救措施，而且能够在灾难发生以前避免灾难。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提出为治疗世界货币体系中这一非常重要的缺陷可供选择的办法。

国内决策

最后，我们来谈我关于关键决策的第三个论点。它就是：由于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加速，世界体系中的关键决策必须包括美国针对自己的银行、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内经济管理作出的一些国内决策，因为这些决策在美国地域界限之外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许多年以前的20世纪60年代，奥特玛尔·埃明格尔博士（Dr. Otmar Emminger）有一次针对这一点说道：和一头大象同睡在一张床上有时很不舒服。这个比喻十分恰当，因为在这种情形中，大象自己甚至不大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关注在同一张床上的其他小一些的动物是否感到舒适了。因此，美国针对欧洲货币运营、美国银行向国外贷款、新金融市场、银行金融业的新技术发展——也许更重要的是，针对美国国内货币管理的更广泛的影响——作出的国内决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欧洲货币运营，我已经提到英国重新开放伦敦商业城作为世界金融市场，是自60年代早期以来，欧洲美元市场后来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已经在数不胜数的有关市场增长和发展的书籍中（斯特兰奇，1976；所罗门，1978；韦斯鲁森，1981；莫菲特，1984）描述过了，因此不必在这里赘述了。在这些描述中，请允许我回忆一下1958年欧洲货币可以相互兑换时，英格兰银行同意

允许英国银行以美元（但不是以英镑）吸收存款及发放贷款。美国也采取相应措施，纵容美国银行的伦敦支行，允许它们效仿英国银行的做法。实际上，美国第 Q 条规定（Regulation Q）的限制和新政关于美国银行国内总部的短期存款的控制，强烈激励银行采取这些行为。除了自 1964 年以来的利息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以外，众所周知，美国还鼓励美国银行在美国本土之外就存款和潜在的美元借款人等方面进行竞争；如果借款人试图在纽约举债，利息平衡税将惩罚这种贷款人，这种影响大家也不陌生。

对此，我还想加人的一点是：甚至在 1974 年美国货币管理当局也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银行在欧洲货币市场运营的更大后果。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对欠发达国家的债务人和整个全球短期信用体系的稳定有重大影响。这些方面的表现之一是风险从最终的贷款人转移到最终的借款人身上，因为普遍采用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作为可变基价，而欧洲货币贷款的利息是根据这种利率来计算的。这意味着如果欧洲货币利率上下浮动，是借款人在承担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增加（或减少）其支付债务利息的风险，实际上欧洲货币利率往往不仅因为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面发生变化，而且也尤其因为美国国内利率的变化而上下浮动。相反，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当时绝大多数国际借款是通过发行债券来实现的，因此那时的风险分配很不相同。那时，不论由于发生战争、革命、或出现经济不景气或由于更吸引人的债券发行导致的竞争，致使外国债券的价值下跌；还是由于新发行的债券利率普遍发生变

化，都是由债券持有人来承担风险。如果利率上升，新发行债券的利率比他/她持有的债券的可支付利率高出一二个百分点，那么旧债券的市场价值便会下跌，因此他/她只能亏本卖掉旧债券以挣得新利率。在那种体系下，尽管是债券持有人承担了向自己政府控制之外的国外借款人贷款的长期风险，但是至少在短期内，证券持有者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当时可以发现上百万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持有土耳其、中国、沙皇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外国债券，这些债券后来变得一文不值，直到其中的某一些成为具有稀缺价值的收藏品。这些债券持有人匆忙自行组成外国债券持有人委员会，但是这些委员会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欧洲货币贷款所采纳的浮动利率体系意味着如果世界资本市场信贷吃紧，借款人的责任立即被增加了，随着新借款变得越来越困难、代价越来越大，因此支付利息的负担也变得越来越繁重（在两种体系下，大一些的银行无论作为债券发行人还是作为银团贷款的牵头银行，都努力将风险转嫁给别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获得了成功；在两种体系下，任何坏账的重大累积都会导致如此的谨慎行事以至于减少了所有的三方——即最终的投资者、银行和最终的借款人——的机会）。从系统的观点来看，把风险转嫁给许多经济和政治前景有一些不太明朗的借款人，这种转嫁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体系的脆弱性——当然，除非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来进行管制，并使之趋于稳定。

欧洲贷款的另一个特征是联合趋势。在早一些时候，一些大国际银行通过与其他主要债权国的银行合伙贷款以

寻求给国外贷款卷入的内在风险最小化。它们通常与在共同拥有的子公司里的一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或荷兰的股东建立所谓的贷款银行团。但是当每一个合伙人的国家信贷政策发生的变化不一致，当母银行对风险和机遇的看法不相同，协调借款政策的困难将比预期的大得多。尽管一些贷款银团获得了成功，但是银团贷款已经失去了人们的青睐。而辛迪加却大不一样。这里，牵头银行负责给未来的借款人筹集一大笔欧洲货币贷款，并说服一些小银行参与贷款入股。由于牵头银行承保交易条款，因此它挣得管理费或得到比按入股比例分成多--些的利息。有人把这种叫做股份推销。但是不论称谓如何，其影响是大大激励更大的银行在进行外国贷款时，促使更多的小银行卷入其中。与对美国银行在国内的业务实施的更严格管制相比，欧洲市场相对缺少管制，对许多银行来说意味着这是它们在年度营业额中显示盈利，并从而说服股东（存款人）该银行是一个有效的企业的惟一可行的方式。尽管辛迪加的形式并不是多数美国银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国外运营中获得大部分利润（有时高达 60% 或更多）的首要原因，但是它们无疑确实是美国银行更广泛地卷入外国贷款的原因。

随着 1980 年的《国际银行法》（International Banking Act）的颁布，在 80 年代晚些时候美国银行业务出现了第三个管制特征。尽管《国际银行法》在美国受到广泛欢迎，它被认为是恢复美国银行与其外国竞争对手之间平衡的迟到的管制措施，但是在许多方面它却成为一个解除管制的措施，跟美国经济政策的总体趋势一致，不仅在里根总统

当政而且在他的继任者吉米·卡特当政时也一样。因为它第一次允许美国银行与其外国对手在美国设立的子公司一样自由地经营业务，并且在纽约从事经营以往只能通过它们设在伦敦、法兰克福、香港、东京或避税地如，开曼群岛或巴哈马首都拿骚的国外分支机构经营的业务。许可纽约自身成立国际银行基金（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 IBF）这种法律变化致使通过这些加勒比海诸岛国隐蔽地从事的美国银行业务量大大减少。

然而，它们开始能得到发展壮大这件事本身也反映了美国人对在其国土之外发生的任何行动持有一种普遍的冷漠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在美国从未发生过阻止美国国会宣布总部设在美国的银行必须根据一定的管制制度经营业务，不论这些业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进行。沃尔克（Volcker）在1979年10月终于强制美国银行对其欧洲美元存款有储备要求，作为新的强硬货币政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只要求美国银行根据联邦储备体系的要求，将借给美国公司的资金的8%存放作为储备——这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要求。

与此类似，对于规避税收和银行管制的地区增加，很容易在早一些时候得到控制。宗主国政府可以在任何时候宣布从中渔利的银行、企业和保险公司的行为违法，从而禁止它们在本国从事经营活动。美国国会并没有这样做，无疑部分与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观念相一致，并与美国人对美国国内的行为或直接、明显地影响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行为给予的首要的地位相一致。它也可能受到了美国货币管理机构十分分散的特性的鼓励。在多数别的国家里，货

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两大权力中心，即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进行分配，而美国却给自身创造了十足的纷繁（Cat's Cradle），权利和责任在名目繁多令人眩晕的政府机构间共享和交叉。除了美国财政部以外，还有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联邦储备委员会里还有货币监理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然而美国的对外货币关系由在联邦储备体系中居首位的纽约联邦银行实施，而管制金融股票市场的特别权力自1934年以来被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在这之上，分权原则赋予国会（通过众议院银行金融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修正这些机构中的任何机构的法定权力的权力。同时，政府的联邦本质意味着银行业实际上既由联邦管制机构也由州立机构来进行管理——纽约州银行管理当局尤其重要。

在一系列事件和为体系担忧的压力下，在赫尔施达特银行破产之后，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974年的宣言以及1975年的巴塞尔正式协定，有一个动议提议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控，并允许货币监理官办公室享有更广泛的权力，从而向银行收集有关这些银行在国内外的行动的更多信息。但是这些权力太小了，信息太过时了。例如，自1974年以来，货币监理官办公室开始逐渐抑制银行单独向许多国家贷款。但是这些抑制并没有阻止美国大银行向拉丁美洲的主要债务国，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过分放款；由于银行间拆放，光靠抑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不过要求美国银行不能向任何一个借款人出借超过它们外面未偿付贷款的10%，通过分支机构或其他银行足以实现银行自

己的承诺。自1982年末以来，所有银行必须向货币监管官办公室报告到期的、未付的贷款——但这同样也是事后诸葛亮。

也不是仅仅因为美国当局对美国银行在境外的行动不关心才导致国际金融体系从整体上远离更佳的监控和管制；如果要想将市场和管理当局之间的平衡几乎保持原样，当时的金融市场要求的实际上却是更多的管制和监控。过去的10年，在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内决策的主要趋势倾向于解除管制。尽管实施远非一致，但是解除管制被用于航空公司、电话和金融服务业中。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华丽外衣的掩盖下（政策往往如此），在后一种情况里，解除管制实际上受到一些最大、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和银行的十分强烈的物质利益驱动，受到他们在华盛顿的游说者的支持，并由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杂志和报纸来作宣传。

在过去的10年中，以往用于管制信用的创设以保证金融体系和经济安全的三种主要方式被腐蚀了。存款利率管制过去被用于减少短期资金的流动性。但是低于6个月的存款的最高利率在1970年得到提高；活期存款利率上限在1978年11月上提。1980年，解除管制的步伐因为《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而加快，从而导致了1986年解除了所有管制。如一个货币监管官办公室官员在1981年评论所说：“当通货膨胀导致的高利率致使存款流入非管制的市场利率机构，并引起对向小储户提供。实现市场利率的

机会的关注时，利率管制当然是必要的。”^①

自早些时候以来，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和《麦克法登法案》(McFadden Acts)下，美国银行法试图通过限制银行活动的地域和功能来减少因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银行倒闭的机率。但是1974年货币监理官办公室规定：允许资金的自动转账的顾客—银行交流终端并没有违反禁止州际银行业务的法律，因而使原来禁止州际银行业务的规定遭到损害。这敞开了大规模进行州际银行业务的大门。80年代初，储蓄贷款协会(S&Ls或“thrifts”)被允许在州内建立分支机构以后，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允许在州外建立分支机构以后，致使口子开得更大了。同时服务多样化的禁令得到进一步放宽。1974年，当银行拥有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陷入困境时，已经出现了麻烦。后来，美国银行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走得更远，以至于希望自由运营一个全球银行——这种银行在一个地区出现的困难可以迅速扩散到其母银行和其他银行。卡特任职期间，基于公平，这种解除管制被认为是正确的（“如果X可以这样做，为什么Y不可以呢？”）。在里根任期内，不得已而甘愿为之。货币监理官康诺弗(Conover)说：“我们必须开始工作，造就一个世界，在那里，在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方面，政府监控变得不太重要而市场约束的重要性将增大。”^② 在一些信用工具现存的限

① 坎特韦尔·穆肯富斯 (Cantwell Muckenfuss)，《银行、金融和都市事物的众议院委员会的听证证词》，第三卷、美国国会，1981年9月22日。

② 1982年10月的货币监理官办公室《季刊》里发表的康诺弗的演讲。

制被打破的同时，一个同样重要的趋势是：允许新形式的信用工具不受管制（有时是相对非管制）地增长，如以商品及商品期货方式、以新金融信用工具，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回购协议和零息债券等等新方式交易。美国政权交易所近年来目睹了新期货市场的繁荣——期货是和赌马、翻牌、掷骰子或轮盘赌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种金融交易。实际上，现在可以在金价（或其他大多商品，甚至猪胸肉和浓缩橙汁）上下赌注，赌它的价格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将上升亦或下跌的波动幅度有多大。1975年，可以以金尼·梅（Ginny May）的期货合同进行交易。^①现在在芝加哥可以赌100种大股票的股票交易指数将上升还是下降，幅度有多大，速度有多快。1983年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基于道一琼斯的30种蓝筹股票（即最有利的股票）加上另外5种，介绍了一种主要指数期权（Major Index option）。对于所有这些期权和期货市场，就它们如何进行交易，谁可以大批量进行交易（即代表零售客户）制定了一定的规则。但是在联邦一级，对于可以有多少这样的投机市场，或所有市场所允许的交易总额或单个市场的交易额，并没有进行控制。

交易商在设计新赌博游戏时，其智慧明显超过了管制当局；与此相同，银行和金融技术的发展也明显将管制当局甩在后面。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一点。从操作方面来说，技术的发展已促使金融交易程序达到很快有

^① 来自GNMA，即美国政府国民抵押协会（National Government Mortgage Agency）。

必要以秒来计算，而不是以年、月或日来计算的地步。近年来，因整个电脑和电子行业的新发展而成为可能的——事实上积极鼓励的——资金自动转账系统的出现，对于一些传统概念，如资金周转率（the velocity of money）和跨地区的货币流通监控有重大内涵。这些严重性还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人们甚至未作任何准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银行已经发现可以通过所谓的“白天透支”（daylight overdraft）来规避联邦储备要求。只要他们可以运用可行的技术在美国的金融日结算时恢复他们的储备头寸，他们可以在其余的24小时内自由规避这种要求（迈耶，1982）。

技术超前于管制的另一种方式体现在非银行机构从事银行业务的现象有所发展。西尔斯公司（Sears Roebuck）原来是美国一家从事全国性邮购业务的公司，而现在它比任何一家美国银行兑现的支票额都要多（奈斯比特，1984）。尽管以普通信用卡形式存在的“塑料货币”是银行发明的，但是非银行迅速抄袭了这种观念，以至买卖石油、服装、食品、旅行车票及各种各样的家庭用品现在越来越多地以这些方式支付。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计算过以这种方式已经和仍然在提供的个人信用幅度。银行创造信用受到货币当局制定的管理规定的限制，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体制调节非银行机构创造信用，并监控经营银行业务但却不被算作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行动。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是国际经纪业中为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国际市场上几乎完全和银行一样从事经营活动。据报道，在两年内美林公司比花旗银行多吸纳了

20多亿美元的存款，但是其业务却不受银行规定的管制（奈斯比特，1981）。

以往，美国对非银行机构、对新技术变化、对新金融市场的纵容，以及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倾向于解除管制而不是进行管制无疑树立了一个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但是仿效美国的必要性本来可以比现在小得多；其他国家的选择范围本可以比近年来的实际情形宽得多。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追踪许多国家仿效美国解除管制的趋势。与美国相比，那些国家在无形服务业出口中获利小得多。跟随美国脚步的也不仅仅只是英国（英国在1979年打破了兑换限制；接着非英镑借款人也有权发行Bulldog债券；英格兰银行对外国银行的贴现便利增加和出口信用保证范围扩大）。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其他金融中心纯粹为了自我保护，也被迫向私人银行和交易人员提供类似的便利和同样的自由。甚至最不易受外国任何形式渗透的日本也被迫仿效美国的做法，以存款证交易、银行间差放并以在一个相对无管制的体系里的银行国际化有关的其他形式的金融行动进行交易（考夫曼，1981）。

我已经提及一些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有广泛影响的美国国内政策：对欧洲美元放款、对投机金融市场激增、对自己的银行、对一些像银行一样从事业务的非银行的纵容，而最重要的国内决策是美国1979年10月采纳所谓的“货币主义”体系来管理美国的国民经济，并将此政策推行到其他国家，干预已经很高、很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利率。如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观察到的那样，激起的“通货紧缩程度与矫正行动的必要性不相适应”（吉尔伯

特, 1980)。美国货币主义产生的不利影响遭到多方批评, 不仅有来自遭受影响的外国政府首脑, 而且也受到一大批曾广泛同情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宣扬的目标的美国民众和一些原国际官员的批评。关于这个问题论著颇丰, 看来无须在这里重复决策的所有细节、对美国的影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更深远的反响。简单回顾这些批评的要点目前就足够了。

也许最根本的一点是: 美国实施的并不是真正的货币主义政策。美国政府一方面不断为日益增加的对税收的消费需求进行筹资而造成预算赤字上升, 实际上抵消了另一方面想以控制货币供应达到的目标, 因此, 只能把此政策描述成“所谓的货币主义”。与其理论基础相一致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主义政策会使政府筹资在经典的 $M/V = P/T$ 方程式中所起的作用如此小以至于它对货币价格, 即利率, 没有什么影响。美国政府 1983 年的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5.4%, 而 1973 年只占 27.4%。而且, 对货币需求如此紧迫以至于根本不考虑价格。政府消费资金必须得到筹集——甚至于不惜在运作中修改国会制定的规定。1982 年便是一个例子。因此利率不论有多高都无力影响政府消费或联邦信用机构的信用创造政策 (参见图 2-3)。

批评的第二个要点是实施的货币政策的方式变化无常、狂躁, 根本没有必要, 从而实际上增加了已经高度敏感的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紧张感。货币目标受到联邦政府每周公布的货币供应量 (M) 的影响, 而这种货币供应量是经过适当调整的, 并且联邦政府以之为目标。市场对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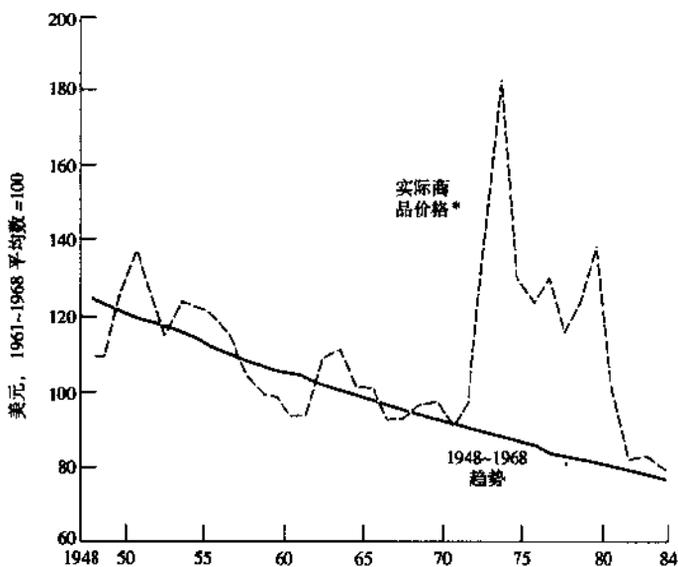


图 2-3 实际商品价格趋势

* 由美国生产价格指数调节后的世界银行商品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美国劳工部，美国劳动统计局。

假设的数据反应非常迅速，而且夸大其辞。结果往往证明，这些先前估计的数据大体上都是错误的，需要进行修改，联邦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例如，1983年月增长率的预测数据后来被平均提高了3.2个百分点，在后来的第二次修改时又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文宁格，1985；海特与卡米洛，1979）。它也总是部分在暗中进行。在有关出入美国的资金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数据中，记为“错误和省略”的数额很大，以至在总额中引入了一个新的不可计算的变

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的言论也不时左右市场。如他观察的一样，联邦政府易于改变货币的定义，因此改变计算目标。在1978年11月至1982年4月之间，联邦政府这样做不少于4次（考夫曼）。考夫曼说，当局在将计算金融创新考虑到信用创造中以及在估计货币流通基数和整个货币供应关系时总是在拼命追赶。一旦目标集中点发生变化，将使已经不稳定的利率进一步恶化。因而不进行长期投资而趋于短期（十分不稳定）货币资产的普遍趋势也进一步恶化。在此之上，当银行和其他机构从固定利率合同转向（被允许转向）基础利率变化不定的合同时，进一步增加了体系的不稳定性。银行使到期的资产和债务相平衡的“银行利差”变得很普遍，其结果是将银行自身的利率风险转移到存款人和借款人身上，而在更稳定的货币和信用系统下银行将不得不承担这种风险。

另一个结果是银行的一些公司客户，已经比以前更深地陷人依赖银行贷款而不是通过发行股票筹措资金（Equity financing），它们因这种风险转移而更加脆弱，因而更容易破产或被并购，除非国家公开或暗中干预提供支持。“货币主义”政策的最终结果可以很容易变得与意图完全背道而驰。它没有使私有部门和市场经济从国家干预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而是如墨索里尼时的意大利一样，使国家比以前更广泛、持久地卷人工商业中。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不仅跨越国界也存在于市场间——产生的一些经济后果，对这些发展的政治反响以及企图重申国家政策自治权，这三种因素联合起来产生

了这种政策倒错的特例。但是并不像政治家宣称的它是一剂使病人恢复健康神智的良药，而实际上可以说它使病人比以往更加脆弱，更没有能力抵御这种向国家屈从的疾病——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药方是专门为医治这种疾病所开的。

第3章 一些其他阐释

在上一章里，我提出：世界经济混乱的根源在于货币和金融，而且混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政府决策培育和鼓励而形成的。从发表在报刊、学术期刊和书籍上的著述来看，有一部分人和我持有同样的观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不只是看专门讨论货币和金融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对我们目前困境的原因有更宽泛的阐释。为了强调往往在我们心目中国际货币金融中的决策只占有有限的地位这一点，也许简要概述对近年发生的事件的各种不同阐释非常有用。由于许多与我们所处的困境有密切关系的人没有时间或耐心详细读完所有阐释，并且人们倾向于阅读自己的专业书籍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与自己的政治信念相吻合的著述，因此更有必要概述这些观点。尽可能提供一种多方面吸纳偏见和观点的导读也许很有用。

倾向于认为在世界经济混乱中货币和金融方面不重要的阐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强调混乱是源于贸易政策的弊端，另一种是通过提出最近经济史中的决定论的某种翻版以避免将责任归咎于任何具体方面。

忽略货币阐释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分工过于过细这一趋势。贸易和货币，就像投资和就业一样，越来越倾向于

在不同的“理论匣子”里来进行讨论。通常相互被视为对方数据的一部分。两者之间的联系总是被忽略或不作考虑。因此，当对近年发生的历史作出最新阐释时，两者之间便出现了裂痕或分裂。近年，占主导地位并在多数情况下影响博识的见解的正是关注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而非关注货币关系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至少在工业化国家里如此。例如，随便翻看西方媒体在1982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或1983年或1984年的国家元首经济首脑会议上的报道，便可以看出当时普遍认为保护主义而不是货币管理不当是对世界的未来繁荣的最大危险。^①

专业分裂可以——至少部分可以——解释出现众多有分歧的观点的原因，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与货币阐释相比贸易阐释更占主导地位。

尽管许多历史学家有论述，但是关于世界经济衰退，基于贸易的阐释比基于金融的阐释占主宰地位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戴维斯，1975；刘易斯，1939）。可能是由于专业、历史或政治方面的原因——或三者兼而有之。从专业方面来看，老师在解释、学生在理解贸易壁垒的消极作用

^① 如，参看1983年11月13日的《经济学家》，上面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出口或者死亡——保护主义肯定是激化世界滞胀的方式”。这篇文章写道，所有卷入的88个国家“看来更可能相信如果保护主义可以改善本国的贸易平衡，它将摆脱该国的部分失业。但由于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的改善是以另一个国家的贸易恶化为代价，因此这种处方看来跟一个疯狂的茶会没有两样，并且也是一个使世界过去遭受不幸的处方”。伦敦的《时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以及《华尔街周刊》都刊登了相似的文章，对未制止贸易保护主义上涨的潮流提出迫切的警告。

与解释或理解更复杂的信用萎缩和货币不稳定的过程相比，要容易得多。从历史角度看，必须记住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战后世界经济尽可能开放，形成美国商业和金融的主宰局面（布洛克，1977）。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国内充满信心地反复强调：为了普遍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必须不惜代价避免保护主义和歧视，尽管这和当时的多数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不相符合，因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保护主义是萧条的症状而不是原因。

最后，还有一种政治阐释，即主要强调保护主义有利于使所有相关国家同等、公平地承受指责。欧洲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样犯下了这种特殊的罪行——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应受更多的指责。甚至发展中国家也肆意实施保护主义，因此不仅仅富国有过错，其他国家也难辞其咎。但是，有关货币和金融上的权力在政府间的分配十分不平衡，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相比享有更大的权力。即使对该做什么有更明确一致的意见并且对政治上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有更多的信心，也很难使美国人接受这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困境应付有责任的说法。缺少这两个方面，这种尴尬处境变得更令人不舒服，因而货币阐释更不受人欢迎。

技术决定论

比强调贸易更受人欢迎的是找出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发生的事有其必然性。决定论对当前经济困境的解释在为任何政府或任何阶层开脱责任方面最彻底。这些阐释有两种：政治阐释和技术阐释。

政治决定论阐释为决策者——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

当然也还有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找到了推卸责任的借口。这种论点提出，由于决策者丧失了以往的权力，他们不可能有别的作为；而技术决定论解释则提出决策者被经济史无法探明的力量搞得一头雾水，已有的任何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成功地抵御这种力量。政治决定论设想美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丧失了国力，不仅与苏联相比如此，而且对日本、德国、其他欧共体成员国、欧佩克成员国、甚至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如此。这种观点也指出，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国家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盘根错节、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经济里，都丧失了管理国家经济的部分权力。

另一种以技术历史形式表现的决定论，假设在面对经济变化也许尤其重要的是快速技术变化时，政治组织变得相对无能。这种观点基于一些实验统计工作。首先由一位名叫范·格尔德恩（Van Gelderen）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这样的统计。后来苏联经济史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20年代接着做这项工作。在分析有关经济增长的数据和价格工资关系时，康德拉季耶夫确信存在一个可以识别的模式：即存在一个快速增长和慢速增长的长波，以及较短的、较不强劲的贸易周期。这种模式自19世纪早期以来十分规则，19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初期达到顶峰，1820年、1870和1920年跌至谷底。尽管康德拉季耶夫只是记录这样一种模式，而没有试图去作出解释，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也存在上下波动，而并不像马克思所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因其自身内在的矛盾注定会衰亡。这一观点显然在苏联是异端邪说。因此，据索尔仁尼奇所述，康德拉季耶夫死于斯大林时代的劳动营，被埋葬在数百万

无名墓中的一个墓中。

自康德拉季耶夫的时代起，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对康德拉季耶夫长波（long waves）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第一个是熊彼特（Schumpeter）在1939年将19世纪早期的首次升波和英国制造业中引进蒸汽机联系在一起，将第二次升波与铁路普及联系在一起，把第三个升波与化学、电力、内燃机中的技术革命联系起来。在每一个升波中，朝阳工业中吸纳劳动力的速度比老一些的农业和工业中裁减劳动力的速度快一些。在降波中，过程恰好相反，新工业吸纳劳动力的速度达不到老工业中削减劳动力的速度。对经济史长波解释的现代支持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由美国领导的第四次升波；到了60年代末期最后一次长波的波峰开始破裂，引起了70年代的长期衰退。30年代开发、50年代大规模销售的耐用品和办公器具促成了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但是仍不清楚可以保持本世纪末又一个升波的下一个技术进步何时出现。

这种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长波的升降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原因，经济史学家没有达成共识。对于技术创新是增长的启动器，还是成熟的增长条件促成了技术变化，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决定因素是供给还是需求？就降波如何缩短或得到缓和，升波如何延长或得到加强，结果经济学家被分成不同的派别（熊彼特，1939；麦迪逊，1982；弗里曼，1982，1984；范·杜伊金，1984）。

约20年以前，库恩（Kuhn）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在科学发现或发明与其商业化之间存在某种时间滞后；商业

转化像火箭的助推器，加快经济增长率（库恩，1962）。库恩提出，发明一般在谷底时出现，这时老技术日益变枯竭；转化出现在上升期，这时投资致使大规模生产。但是目前运用这些理论的一个麻烦是科技进步变得越来越持续不断、越来越不具有周期性。在一些领域里（如制药业），开始出现收益减少的迹象；但是同时在一些其他领域里（如电子、生物遗传），科技进步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没有停止过。而且，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大型国防工业的国家，大规模卷入科学研究，打破了库恩提出的发明应用和市场主体之间隐形的联系。

更晚一些，即7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瓦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提出了另一种非技术的解释。瓦尔特·罗斯托在《世界经济：历史和前景》（*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1978）一书及其他书中，提出长波的源泉在于：最开始时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主要产品进行过度投资，后来出现投资不足，这是由最新的工业部门领导的市场经济趋势。这致使商品价格和工业部门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立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战后。看似矛盾的是，罗斯托反而将1951~1972年战后的繁荣期视为康德拉季耶夫所谓的商品价格疲软时的降波，正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但是这次，对工业经济的影响因内部强劲的消费需求和凯恩斯的完全就业政策所抵消。70年代的衰退很不正常，它源于商品价格上升，这直接打击了主要工业部门：如汽车、耐用消费品、塑料和合成纤维。罗斯托认为，治疗的措施在于国家进行更多干预，以推动对能源、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投资。

但是罗斯托十分个人化的解释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确实,技术决定论关于衰退的解释广受欢迎,与其主张的理性说服力并没有多大关系。即使它逻辑上有缺点、或与实验证据存在很大差距,也不太重要,因为更有诱惑力的事实是这种观点使每个人都可以不对世界的危险状态负有责任。^①如果过去的失误和判断错误现在在这些历史趋势面前显得非常重要,那么回顾它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当时并不重要。欧洲人或日本人没有理由责备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也不该谴责工业国家。人们也没有理由谴责自己的政府及其官僚机构。全世界的所有统治集团可以大舒一口气放心地蒙头大睡了。公司经理可以找托辞向股东和多余的员工解释糟糕的年度资产负债表,把所有责任都推向世界经济的现状,他们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可以自满地报告:“一旦情形好转,商业得到恢复,公司便可以再次提供工作机会和红利。我们正在尽全力。请耐心等待。”

同时,技术和科研人员可以因长波理论对未来前景的预测而感到安慰。长波理论认为,那些可以发现新技术、发明具有大众市场的新产品或设计新程序的人是幸运的,一旦前景明朗,这些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程序将令人难以抵御。

甚至国际政治不断变化的特征也宠爱这种技术决定论。

① 康德拉季耶夫早期的一些著述中表现出的宿命论态度,反而可以用来适应现在的一些经济思想,它明显证明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对于萧条,政府只能采取货币限制的政策,并希望证明投资确实完全是具有利益弹性的。罗斯托(1978,第189页)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他主张:克服萧条需要更积极的公共政策,无论是发明还是创新,来鼓励和推动技术革新。

国家不再卷入激烈争夺土地的竞争中。这并不仅仅因为大多数国家的边界都已确定，并且人们已逐渐接受了这些不规则的划界。而且，国土在决定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时也不太重要了。葡萄牙和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因为不太富饶、比较闭塞的帝汶岛的边界问题，将争端提交到国际法庭，今天看来实在不可思议。尽管现在仍然存在一些领土争端，如阿根廷和智利争夺比格尔海峡，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争，但是争议的焦点威望和地位，或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想真正控制土地。国家能够而且必须竞争的是全球市场的份额，不仅是今天的市场还有明天的市场。那些可以自行设计自己的教育体系，找出并掌握自己的研究中心，运用自己的采购政策（procurement policy）的国家在科技竞争中将处于领先地位。对近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技术决定论解释，进一步激励政府和科学家一起一马当先抓住下一次升波。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不仅在经济增长而且在相对国力和影响上比其他国家占有优势。（确实，这种科学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80年代早期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数据控制公司的老总提议将日本学生从美国大学赶出去，以确保美国在通信技术的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政治决定论

对日益加剧的混乱和未来不稳定作出解释的另一种决定论在美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盛行。它认为，混乱的原因在于美国当局在管理世界货币和贸易关系中丧失了权力，这种权力丧失的原因又在于国际政治体系中权力重新分配

到更多的国家圈中。在这些国家圈子中，西德、日本所占份额特别大，但是在圈子的边缘也包括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如南韩、墨西哥、巴西、台湾地区，以及较大的产油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这种观点提出的证据包括：它们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工资和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市场份额和货币储备增大等。它也谈到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挫折，如从越南撤兵、欧佩克石油价格上升、伊朗国王失势、阿以冲突呈现僵局、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没有出现竞争；有时还提到国内的政治事件，如水门丑闻；或提到国内的政治发展，如国会进一步增加对外交决策的干预。

但是这种观点只是基于很狭隘（并且很过时）的对世界政治中权力的理解而提出的。这种理解完全无视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这一观点（即形成和塑造生产结构、知识结构、安全结构和信用结构的权力。在这些结构中，如果其他国家想参与世界市场经济，它们毫无选择只好适应这种结构），因为使“可用的有形资源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并使之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需要权力。^①在这种“基本力量模式”里，政治分析家可以发现出现的结果是否与演员（即国家）被赋予的有形和已知的相对力量相符合。根据基奥恩，权力是依赖的反面，它可以通过政府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影响其他政府的行为的能力与自己对其他政府的金融行为的依赖，进行对比而觉察出来。换句话说，它

① 这句话引自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所著的《权力中的权力》（*The power of power*），第一卷，第54页，伊斯顿，1966。罗伯特·基奥恩在《膨胀和美国的国力》中引用了这段话，隆布拉与威特主编，1982。另一个更早运用同样定义的更有名的作品是诺尔（Knorr）1975年所写的。

可以被阐释为左右结构的权力（如，提高全球利率的权力）。但是事实上，基奥恩将1971年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归因于美国的国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获取的最高点上逐渐衰落下来。

基奥恩说，“美国国力的衰落是这个体系崩溃的必要条件，因为美国如果仍然像40年代那样强大的话，美国便可以强迫自己的合作伙伴定期重新调整币值，同时保持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基奥恩，1982，第16页）。基奥恩辩论道：因此美国在1971年以后处于一个弱势议价方，不能再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这种阐释完全误解了权力的含义，严重错误地描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持续不下去的原因。美国已经丧失维持秩序的权力，这一点不假，但是对其他国家的权力丧失远不如美国在英国的帮助下有意识地决定开放市场力量所丧失的权力那么多。权力丧失是因为美国运用自身作为黄金兑换体系中心国家的过度特权、长期出现支付赤字、通过膨胀性创造信用而不是通过税收使民间的资源转移到军事上来为远离本土昂贵的越南战争筹措资金。

基奥恩写道：

其他国家持有大量美元，美国必须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价格进行兑换。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美国不得不采取相应政策，以说服美元持有人不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1968年改变规定，以后由中央银行持有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宏观经济将依赖于外国中央银行的金融决策（基奥恩，1985，第15页，作者加的黑体）。

但是黄金的“固定价格”是由美国规定的，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规定更高的兑换价格。而且，削弱体系的决定是由美国作出的，是美国选择不采纳足以说服美元持有人不将美元挤兑成黄金的政策；是美国在1971年8月决定暂时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征收进口附加税，让市场决定兑换价，从而导致了体系的崩溃。尼克松和康纳利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市场的力量迫使日元和德国马克重新定价，以达到美元贬值的目。

在基奥恩写下上述观点以前，其他一些人也试图从霸权角度对世界货币作出解释，并使这种观点得以传播，这些学者中包括著名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金德尔伯格写了一本有关两次战争期间萧条的有趣的学术专著。他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经济在30年代深陷萧条，并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得以恢复，其根本原因是它碰巧赶上了经济霸权的交替期。金德尔伯格辩论说，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不再能够担负霸权的角色，而美国则不愿意担任这一重任（金德尔伯格，1973）。这种论点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世界需要一种首要货币国（top-currency country）或霸权，这种霸权能够在体系中为其他国家提供稳定通用的货币，甚至当这些出口品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需要的时候，霸权国也永远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实行门户开放。而且，当有必要保持信心，防止金融市场发生危机时出现恐慌，通过无限制的投资资本外流以保持整个体系的增长时，霸权必须随时准备充当最终贷款人，提供信用。基奥恩默认了这个

前提，进而提出：由于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不顺从，因而充当霸权的费用太繁重和困难太大。“只有打破规定，美国才能重新获得所需的自由”（第15页）。他没有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美国不愿再承担霸权的责任，为什么需要享有打破规则的自由；或者体系确实可以以其他方式运行，而不需要霸权。

吉尔平的观点是基于同样的前提，只不过更清楚更明确一些。他将美国1945年后的地位与英国1914年以前的地位进行一番对比后，认为英国的经历表明霸权经济的费用对自身而言太繁重。资本流向国外而不是流入国内工业中。承担军事和其他义务的费用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因此，体系本身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美国完全应该像英国一样谨慎地卸下这个重负，否则将使自身经济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吉尔平对体系中其他参与国将遭受的影响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也没有作任何考虑（吉尔平，1975）。

所有这些学者在过去的10年中对美国人的思想观念有重大影响：最近，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制造了更多支持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决定论的弹药——尤其是支持声称美国国力衰落这种观点的弹药。奥尔森因为早期的著作《集体的善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Goods*）一书已经在美国政治学 and 经济学界声名远扬。在该书中他发展了一种经济理论来解释美国为了军事安全、世界经济发展并给予其他国家成为“自由骑手”（Free riders）享受好处而不分担费用的机会，自己不得不承受较大负担。1982年，他写下另一部对历史作出解释的著作《民族的兴

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奥尔森,1982),此书立即引起了美国专业杂志的关注(也许极大的关注),但是其他国家的反应却不太热烈。^①

奥尔森关于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崛起以及英国衰落作出的解释,依据的论点是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国力取决于新技术被开发和采纳的速度以及新的竞争者被允许享有向已有企业挑战的自由程度。他辩论说,战争和外敌人侵打破了维持现有利益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同盟,允许新来者的精力和冒险精神进入以加速投资、经济增长以及强化占有外国市场的优势。根据这种理论,美国未能保持50年代的那种主导地位,可以归因于美国社会和经济中存在的反对变革的力量相对较强大,而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最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里这种联盟的力量相对较弱。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和决定,作为严重促成8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混乱的因素,又一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和国会山的政客不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被美国社会发展中的关节炎——适应性和活力的丧失——所背叛。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奥尔森为政客推脱责任的说法与纳粹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解释有相同之处:纳粹宣扬,德国在凡尔赛的耻辱不是因为军事战败而是因为“内部背叛”。

然而,两个事例都表明了一个不大相同的故事。70年代中期,美国比其他国家从欧佩克以后的萧条中恢复得更快。在近年的艰难岁月中,所有国家——包括德国和日

^① 例如,1983年冬天《国际研究季刊》上登载了金德尔伯格和其他两位投稿者的篇幅很长的评论。

本——与美国一样，卡特尔和合并的事件迅速增加。^① 总而言之，就适应性而言，事实表明部门之间的差异至少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样大（迪谢纳，1984）。

其他形式的决定论

还有一些不太普及但表现更明显的决定论，它们同样可以使决策者免受谴责。一个同样的宿命论观念提出：所有困难都起因于“石油危机”，“石油危机”是一种破坏和瓦解经济体系的“外因”。这一个观点在经济学家圈子里尤其普遍。

例如，马修斯（R.C. Matthews）在介绍由英国经济学家们所写的名为《西方世界的缓慢增长》（*Slower Growth in the Western World*）的一个综合报告时，断言“多数经济学家同意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石油价格上升对实际需求不仅直接具有重要的负面影响而且使通货膨胀加剧，进而导致政府采取限制性行动。就需求对生产力下降负有责任这一点而言，可以看出石油价格上升是一个重要因素”（马修斯，1982）。马修斯多次提到欧佩克石油价格上升可以被视为外在危机，许多经济学同行也认同这种观点，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美国人对阿拉伯国家的敌对情绪普遍比欧洲人或日本人更强烈，首次石油危机引起了一种愤怒、愤懑的高度情绪化的浪潮，并且美国普遍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在这些十分情绪化的国家里，很自然要把目光投向别处以找到一只替罪羊。

^① 参看斯特兰奇和图泽1982年的著述中编者的话。

这个解释看来比较令人信服，但是它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世界经济在其他时间对“外来危机”的反应非常灵活，如40年代的战后调整以及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为什么当时的决策者对挑战的反应及时得多？为什么70年代让银行和私人部门自身去适应新的变化？但是从石油生产商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一个与这种决定论不大相同的故事。世界经济结构有两个方面对他们十分不利。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50、60年代，世界石油工业的结构允许公司拥有为新开发项目提供资金的利润，并且允许石油价格和其他费用降低以扩大销售量。但是事实上只有当全球范围的需求在70年代迅速增大，甚至使美国成为市场上的净进口国时，石油生产国政府才终于能够利用市场力量来提高石油的消费价格。尽管石油生产国通过1971年的《德黑兰协定》(Tehran Agreement)获得了这种权力，但是后来它们发现从石油公司强索的更多的美元很快因美元通货膨胀及美国操纵国际货币体系而遭到贬值。转向浮动利率使华盛顿看来获得了一个使美元贬值的无限期的许可证，同时1971年最后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实际上已经让全世界实行纸币本位制而不是(名义上的)金本位制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不是一种外来危机，而是对不稳定、不公正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性反应。多数研究石油工业的权威作者认同这一观点。^① 约翰·布莱

^① 他们中包括丹克瓦特(Dankwart)、罗斯托、特纳、祖海尔·米克达施(Zuhayr Mikdashi)、迈克尔·坦泽(Michael Tanzer)和埃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在这些学者中，布莱尔曾经是英国人，罗斯托和彭罗斯是美国人。这些专家的观点并不因国籍不同而不同。

尔 (John Blair) 的名著《控制石油》(The Control of Oil) 中, 加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 即在使体系如此不稳定这方面, 美国自己贡献最大。如果美国不是长期追求保持国内的高石油价格并且保持美国油田高产的“首先采光美国”的政策 (Drain America First), 那么, 世界市场中的议价力量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会更缓慢一些 (布莱尔, 1977)。而且, 是美国自己进一步铺设了导致自身脆弱性的台阶: 首先, 美国在对石油公司发展同中东的政治关系上主动提供帮助; 其次允许它们将向欧佩克政府上缴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视为一种在美国可以征税的费用。这两种因素致使石油公司在 1971 年受到来自产油国政府的巨大压力。1973 年压力进一步增加。还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石油公司实际上鼓励欧佩克油价上涨, 否则为什么对像荷兰这样的亲以色列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确实, 在 70 年代中期石油公司的利润比油价低廉时更可观。同时, 如米克达希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 1973 年由欧佩克施行的“危机”很快失去威力, 因为通货膨胀再一次加速, 实际上大大抵消了危机的作用。

其他解释

冒着严重简化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的风险, 以政治术语来说, 可以将 80 年代对经济动荡的评论者分为两个阵营。支持第一个阵营的人指责是政府使事情变得比可能的还要糟糕, 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太多, 市场应该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国家次之。然而, 在第二个阵营里的人却认为政府干预不够, 在市场经济中不够积极、太

被动因而使事情变得更糟糕。还有一个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分子的更彻底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是困境的最终根源，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根本原因。总体上说，由于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贴标签，而是为了指出那些忽视问题的货币方面的观点和解释，同时也指明那些正确地将货币政策及其发展公平地给予中心地位的观点，因此，也许最好依次看一看这3种不同的观点。

顺便提一句，这3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大多数评论家在事后都变得明智起来。兴盛的60年代和喧嚣的20年代一样，当时发出的警世的声音——即认为时代太好以至于难以持续下去这种声音——被掩盖了，更多的却是那些事后诸葛亮，他们后来才发现如果当时听从了那些警告以后避免萧条或度过萧条会容易得多。

当然，罗伯特·特里芬是一个主要、明显的例外。他对国际货币体系自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重复、一贯地关注于信用创造，并将此作为中心议题。自1958年以来，特里芬首先坚定地、耐心地解释金本位制的弱点和脆弱性，接着解释纸币本位制以及需要不断调整的浮动汇率的弱点和脆弱性（特里芬，1964；1966）。特里芬不同意其他同行的意见，他辩论说，浮动利率不是百灵丹，甚至也不应是关注的中心议题；而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首先允许过度创造信用，然后导致了巨大的矛盾冲突——是其他麻烦的根源。特里芬后来决定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比利时国籍，反映了他对欧洲依赖美国的状况因而对欧洲易受美国决策的影响的关注。特里芬一直是经济学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半拉措施不足

以解决问题。他确信惟一的解决方式是设立一个世界央行和一种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①的解决战争问题的方式如出一辙,这种对膨胀和萧条的分析太具有预言性,太理想化,因而难以得到政界的支持,并且对财务经理的日复一日的讨论没有多大实际影响。

尽管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均有相信天平向市场过度倾斜的人和认为天平向国家过度倾斜的人,但是也许可以说支持市场的观点在美国更盛行一些,而支持国家的观点在欧洲更强一些。日本的情形更复杂,因为日本人的观点起源于国家卷入经济活动中以及工业和金融忠于国家这样一种设想,这一种设想超过欧洲的任何观念;但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政府应该允许市场力量比现在更自由地运行,日本人的这种信念比欧洲人或美国人更强烈。

支持市场的观点批评国家干预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干预影响体系中的价格标准和收入分配的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工资和货币供应。个体经济学家对何种形式的干预最有害看法不一。那些关注国际贸易,尤其是直接或间接与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有关联的人倾向于严厉批评阻碍或扭曲贸易的国民政策,如配额限制、资助、采购政策,以及国家对私有和公有的民族工业的支持。他们甚至攻击地方政策只会使经济

^①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美国神学家,曾任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鼓吹“基督教现实主义”,参与创建美国民主协会(1947),著有《道德的个人,不道德的社会》等。——译者注

调整更加困难，因为地方政策在相对价格中引入了僵化。这种观点辩驳道，国家干预的时间越长，工人、农民、经理和整个工业部门越难以接受变化，民族经济自身越难以参与世界市场竞争。^① 含义很清楚，如果所有这些放纵的实践在这 10 年刚开始时被完全放弃，那么世界范围的萧条可能没有这么严重，而且恢复得也没有这么慢。

当然，这种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性措施确实变得越来越强。但是并不见得保护性措施维持的时间越长，强加于整个经济上的低效率就越大因而需求恢复的时间便越长。例如，在那些严重遭受需求周期性变化影响的工业部门，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与让劳动力一直待在工作岗位上直到周期轮回将遭受的损失相比，可能因为使所有劳动力失业从而使其他部门的需求下降遭受的损失更大。它将取决于变化的力量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简单的一点是：放任自流的市场可能在重新配置构成经济体系的一组能创造经济价值的办法的资源时，变化很快，造成浪费而且不稳定。在为这一机制提供的保护性措施里，可能存在某种关键的门槛，国民经济一旦跨越这一道门槛便十分危险。

然而，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门槛在哪里。而且，这种论点不断地强调相互竞争的必要，忽略了已经提及的事实，即国际体系中的需求水平不仅受到市场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全球信用的增长率水平并进而受到对未来的信心大小的

① 例如，参看图姆里尔 (J. Tumir) 和柯曾 (V. Curzon) 在斯特兰奇和图泽 1982 年的著述中的文章。

影响。

国家过度干预市场和贸易的错误被视为过度干预货币政策错误的补充。宽泛地说，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将萧条视为以前的膨胀的自然的、应有的、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后果。正如愚蠢的酒会狂欢后会剩下宿醉物一样，萧条只不过是受害人罪有应得。因此，他们建构理论时更多地关注最先的通货膨胀是如何开始的，而不是关注一旦实施“矫正措施”，必然出现的增长、就业和贸易的痛苦后果（弗里德曼，1977；迈耶，1980）。

货币主义的观点谴责国家的无能和虚弱（或有时有组织的劳动力拥有的“不自然”的力量），而不是经济体制本身。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使新古典理论回溯到瓦尔拉斯（Walras），甚至回溯到萨伊（Say）所做的基本设想，即体系具有趋于均衡的自然趋向。^①因此，也许倾向于用代数来表示理论命题和模式，因为代数是按照方程左右两边平衡的观念进行交流的方式。

而且，当这种传统的“自由”理论不是完全抽象和数学化，而是试图将方程式和模式用于真实的世界中时，这种理论通常将国民经济体系视为：（1）完全与其他世界隔绝；（2）对其他世界的开放程度相同。由于根本不是体系的过错，因此可以就过度膨胀或萧条谴责每一个国家的政府。由于市场经营者以同样的条件和同样的权力从事经济活动，或潜意识中进行这样的假设，那么市场的决策一定

^① 但是如明斯基所说，“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关均衡的定义恰好与标准的瓦尔拉斯理论中的定义不同。”（明斯基，1981，1982，第3页）

是公平合理的，不应进行干预。其中涉及到的意识形态因素，尤其是在美国，当然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是，它很有力而且潜伏着危险，正如其他国家里的一些练习者和皈依者显示的福音主义所展示的一样。

不仅国民经济而且市场也被视为仿佛在一个密封的盒子中运行，除了“外来危机”以外不受任何影响。现实是，每一个市场都受其他市场的支配，反过来自己的需求、供应和价格也影响其他市场（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明显，尽管它确实使描述的任务复杂化了，更不用说解释了。我已经在石油经济的例子中谈到了这一点，铜和铝、水运和保险、住房供给和木材、玉米和牛肉的例子中也是一样——某种经济不是必然受国家的影响，假如国家不故意干预的话。

在建构货币理论时，另一个主要缺点往往是不考虑金融机构和市场作为货币的启动器的本质。许多货币理论因此不能解释资本主义体系中反复出现的金融不稳定现象。实际上，它们甚至没有尝试作出解释。货币只是简单地被视为另一种商品，根据需求决定供应，与一般商品没有两样。但是这种观点很具有误导性，因为创造货币（尤其是信用形式的货币）不仅赋予创造者财富也赋予他们权力。因此，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银行（现在确实还有一些非银行）和国家之间老是存在一种紧张关系。

经济史学家和极少数一生从事有关金融和银行体系运行的教学工作的老师真正理解这一点。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值得在此引用，因为它

简洁而且切中要害。

具有复杂金融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制定许多行为模式，实际上在任何时候起作用的模式取决于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金融联接（financial linkage）的结构和经济史（明斯基，1982）。

他所说的“金融联接”指的是两套价格之间的关系，即当前的产品价格和资本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志是：这两套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允许“今日的货币”和“明日的货币”、消费与投资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其他自称为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一道，明斯基强调在分析人们决定（以何种形式）放款和借款时，考虑到当时的时机和不确定因素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关注这两套价格。^①

资本资产的价格取决于当前对未来利润流量的看法以及现在对就防止货币或流动现金中所体现的不确定所进行的保险的客观看法；这些现有看法取决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明斯基，1982，

^① 批评货币主义者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辩论道：由于货币主义者不考虑这种关系，导致他们设想一种稳定的货币需求（再一次，仿佛货币是一种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此，货币供应的变化将决定总产出的货币价值（即总价格和通货膨胀率）。但是，后凯恩斯主义认为，有钱人以及可以选择如何消费金钱的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影响需求，正是这种不稳定的需求也影响目前产品的价格水平。

第 8 页)。

使凯恩斯理论再前进一步，公共和私有金融机构过去的筹资决策导致的资金流量将影响两套价格之间的联接关系，因而影响通货膨胀和萧条之间的联接关系。明斯基的主张可以被粗略地概括为：通过关注这种联接关系、市场的中介机构以及历史预期对人们的偏好和判断的影响，人们可以溯本求源找到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央银行的行为、政府赤字、总利润流量和支付平衡可以致使危机的程度和本质得到缓解（或遭到恶化）。他得出的结论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使政策由原来通过以投资刺激增长转向通过消费品生产以获得全面就业”。

然而，除了提到支付平衡以外，明斯基和其他凯恩斯主义者一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从单一经济的角度提出主张，非内行的读者不知道这些看似可信的主张在国际经济中是否仍然适用。在国际经济中，资金因受更多变量的影响而流动，尤其是石油价格、美国的赤字规模、目前选择的筹资方式、利率、各种投资风险包括汇兑和国家贷款利润。

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公平地说：多数其他后凯恩斯主义者并不像明斯基那样愿意在体系内找原因，而是更愿意谴责政府采取了错误的通货膨胀政策，不论是出于想控制有组织劳动力的力量（Power of organized Labour）的政治原因，还是想通过抑制膨胀、避免现有的收支平衡账户上出现赤字以复苏经济的经济原因。例如：迈克尔·布鲁诺（Michael Bruno）特别谴责美国、英国、日本阻碍对“供应

危机”作必要的调整。因此，生产力的明显下降直接与短期和中期宏观经济反应战略联系在一起（菲图西，1982）。许多专业经济学家，被冠冕堂皇的理论所欺骗，也对创造信用的体系框架或过去的经济历程的影响或不同国家的政府的不同偏好关注太少。

其他人越来越远离凯恩斯主义，进入了某种社会政治分析的后加尔布雷思王国，他们过多关注加尔布雷思提出的大公司垄断价格的力量（因此取代或扭曲市场的力量），并关注劳动市场使实际工资上升、拖延失业的相应力量。^①然而，尽管货币主义论解释有许多缺点，但是它显然在经济学论著中，至少是英语期刊中获得了最大关注。7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件及公众所持的观点明显对凯恩斯的反面观点不利，此观点认为国家经济一团糟是因为政府缺乏果断干预的勇气和信心。主要描写英国情况的德塞（Meghnad Desai）说道，1974和1976年之间的政策和理论解释的潮流转向，是因为1974年下议院公共支出委员会仅听取了一名货币主义倡导者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的建议；而1976年，工党首相卡拉汉（Callaghan）在工党会议上演说时指出高工资是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并允许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否决英国内阁提出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要求的货币条件的意见。在这两年里，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据德塞所言“大部分年轻

^① 尤其是一些斯堪地纳维亚的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也请参看休托维斯基（Scitovsky）1978年8月在《经济学》上发表的“市场力量和通货膨胀”；以及休托维斯基，1980。

的经济学家现在愿意承认货币主义框架在解释 1974、1975 年的极度通货膨胀时具有实用性，如果不是更具优越性的话”（德塞，1982，第 9 页）。只有更年长的凯恩斯主义者（如：琼·罗宾逊，洛德·卡恩、尼古拉·卡尔多和美国的加尔布雷思）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德塞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相信：（1）复杂的数量经济预测法可以用来检测货币政策和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相对有效性；（2）决策者会受到这种检测的公正发现的影响，但是任何一种主张要么政治经济学家难以接受，要么是货币历史学家难以接受。不管数量经济预测法有多复杂，但是在实际经济中有太多的变量（一些变量具有非量化的性质），以致于不能确切知道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理论像超市货架上的洗涤剂。政客基于别的理由决定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然后选择适当的合法经济政策，就像购物者从货架上拿下与他/她想洗的东西相适应的洗涤剂一样。

70 年代中期，部分因为石油价格不稳定，但部分也因为采用浮动利率，英国重新发现了货币疲软引起的恶性循环，即：货币疲软——进口费用增加——膨胀压力加大——要求增加工资——更大的通货膨胀——货币疲软，等等。政治观点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观点，从解决工资和收入的方法转向货币紧缩和削减开支，吉姆·卡拉汉很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在稍后的 1979 年经历了同样的时期和同样的政治反应，它和德塞所谓的“将客观科学标准用于对同样可观测的观象作出不同选择”没有关系。甚至部分工党和民主党成员都确信增加本已很高的政

府开支不仅不能控制失业率而且会使通货膨胀恶化。预示政府自由决定工资变化率和可供工作变化率之间平衡的菲利普斯曲线失去了其魔力，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攻击。

但是大部分货币主义论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在一个太狭隘的国家框架中去寻求解释。因此，他们不能解释70年代中期货币疲软国如英国和意大利，和货币坚挺国如德国和瑞士的不同经历，他们也不能解释成功地快速调整其石油赤字的日本等国家和感觉困难重重的美国等国家的不同经历。在这两个政营里那些持有全球观的人提出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

凯恩斯主义者中，有一批发展经济学家。粗略地说，他们对70、80年代持有的观点与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对30年代持有的观点相同。他们认为，发展中的主要生产国，尤其是当时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因缺乏购买力使世界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首次石油价格上升后，由于银行体系提供信用，购买力匮乏并没有突显出来，但是在80年代早期主要市场经济增长缓慢、信用紧缩、购买力匮乏变得尖锐起来。这些“全球凯恩斯主义论者”绝大多数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里以及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的专业领域内任职。他们的观点和勃兰特委员会的成员一样（许多人会同意，至少部分同意勃兰特委员会的发现）认为也许首先有政策——如向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地转移资源，更适宜从国际协议同意设立的世界发展基金中转移资金，然后才出现解释的理论。

我认为，它最大的特征是：隐含着对反周期的再分配的公共政策的批评，批评当这种公共政策限于小型或甚至

中型国民经济时，它与问题的规模不相适应。30年代政府花销至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约15~20%之间。政府可以进行赤字筹资而对利率结构没有明显影响（实际上，当时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忙于强行以3%的政府债券代替5%的战争债务）。可以采取具有对需求和消费有明显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收入重新分配措施（如美国的食物印花税、国民复兴计划和其他新政措施）。现在，因为众多原因（如防务、社会福利、医疗、教育、支持困难工业等），增加政府开销必然有反作用：提高利率、激活通货膨胀力。所有这些不利影响会使信心受损，并且不能恢复投资。而且，因为为失业和社会安全支付的费用很高（更不用提兴盛的黑市经济），收入再分配政策与降低利率相比对需求和商业信心的影响要小一些。

可以对民族主义者或新重商主义者关于世界萧条的反应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他们的观点都太狭隘并且忽视了问题的全球本质。这种新民族主义在新闻、媒体和政治讨论中比在专业论著上表现得更充分。^①基本上，这些论点有一点宿命论的味道，和长波决定论者的主张差不多：即在这个阶段采取措施太晚了，因此只能四散逃生并且人人為自己。在英国，所谓的剑桥学派提倡控制进口，并在工业界和工党中得到了某些支持。我认为，在克里斯蒂安·斯托菲（Christian Stoffaes）所著的关于法国政策的畅销书（斯托菲，1979）中也隐含了这种观点——至少它认为，生

①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沃尔夫冈·哈格尔（Wolfgang Hager）1982年夏天在《国际事务》上发表的文章“欧洲及其保护”。

产商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一国的公司想要生存下去仅仅基于国民经济进行竞争是不行的。因此它们需要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从而占有国外的市场份额；它们也需要国家进行管理，以防止它们将太大规模的生产太快、太迅速地转移到海外。然而，法国在80年代的经历明显表明，光有国家的补救措施是不够的。

与此相似，在货币主义论者中间，只有相对少数人由于采纳了一种更宽泛的货币定义，看到了70年代世界经济信用的扩大，而不是国民经济的货币流通基数，因此作出了对过去通货膨胀和紧缩看似更合理的解释，并提出了更光明的拯救萧条的措施。他们可以被正确描述为“全球货币论者”。

这种论点最有名、最有效的支持者之一是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教授。然而，他的大部分主张是依据一种构成世界货币供应的受限制的观点，他提出世界货币供给是基于黄金、美元和其他外汇的国民官方储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对明斯基强调的资金流量给予的关注不够。在国际资本市场，这些流量比官方储备的变量大得多，并且与欧洲市场放款规模扩大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就我理解的来看，一种依据以下假设的主张不一定合乎事实，即当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出售美元防止自己的货币贬值，这时他们会减少自己的国民货币供应基础，因为他们将从私人部门购买法郎、里拉或英镑。

然而，麦金农正确地观察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仅存在商业周期还存在一种货币周期，两种领域中的紧张关系

相互产生倍增效应；美国的利率决定欧洲市场的利率，这些利率统治着绝大部分国际资本流动。所有这些都最近的经历所证实，正如观察到的“浮动汇率将给予国家在货币发展上的自治权被证明是一种幻觉的观点”一样（麦金农，1982，第23页）。

不久前，麦金农强烈呼吁协调美国、西德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以降低汇率中的不稳定性和具有破坏力的不确定性，以稳定三国之间的全球货币供应和价格（麦金农，1974）。他多次重申这种建议，他的主张在经济学家中较盛行。不幸的是，政治现实是日本和德国的金融市场受美国政策的影响程度和美国受德国或日本政策影响的程度存在着不均衡。日本和德国的金融市场容易受美国政策的影响，相反美国却不易受德国或日本政策的影响。这意味着德国和日本两国不得不准备接受永久丧失货币自治权这一事实。今天，它们可能没有多少自治权，但是仍然可以希望今后重新获得这种权力。

因此，从政治上说，这种主张太天真，不仅对真正的国家利益的差异考虑太少，而且对每个国家认为什么是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普遍利益的深层次差异未作考虑。

已故的米尔顿·吉尔伯特提出了一个更悲观，但也更实际的主张。吉尔伯特是一名美国经济学家，50年代为旧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1年以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工作了整整10年，然后作为经济顾问为国际清算银行工作了15年。他生前编辑但死后出版的一本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70年代中期的图书，在结尾处写道：

80年代及以后的货币管理当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根本上不稳定的环境中保持汇率稳定；事件的进展往往被描述成非人为的、神秘的力量结果。但就我看来，政治领袖的力量和决心，或缺乏这种力量和决心是货币事务这一化学复合品中的关键因素（吉尔伯特，1980，第236页）。

吉尔伯特认为，通货膨胀及（吉尔伯特所暗示的）后来的萧条的责任主要在美国。这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允许发展如此大的“大大超出体系流动的合理必要”的赤字；然后（当美国确实在1978年下半年实施干预时），美国运用临时直接控制措施作为恢复秩序和信心、应付危机的武器而难以放开手脚。根据吉尔伯特的观点，美国让十国集团咨询机制闲置起来也是错误的；他认为应该重新启动这一机制。

另一位从业人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总裁维特芬最近提出的观点也谴责美国从根本上忽视自己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下货币政策的国际特性及其影响。^①将货币目标保持在一定限度内需要在利率上支付如此巨大的费用，以至于它实际上增加了不确定性，并且培植而不是限制了向短期资产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以增强的流动偏好为目的的理性预防和投机的动机。他指出美

^① 1982年11月《银行家》上登载的对约翰内斯·维特芬（Johannes Witteveen）的采访。

国在 1978 年末至 1982 年 5 月之间可兑现存款（即支票可以被提取的账户）占总存款额的比例从 2% 增加到 20%，这是体系脆弱性增加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

直接讨论 80 年代世界经济中的萧条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述，除了在左翼书店和期刊上能够找到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传播也不广泛。但是对于认真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或历史的学生来说，不应低估也不应忽略这种现有的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观点十分迎合那次萧条中的众多受害者的口味。尽管华尔街和格林尼治村（或伦敦商业城和 Hampstead，证券交易所和左岸地区）很少对话，即使对话，理解相互的语言也有困难，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分歧的鸿沟既不像双方的意识形态使他们自认为的那样大，也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不可缩小。在分析时我们发现：一些爱思考更爱观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和一些爱思考更爱观察的金融保守主义者的评论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遥远。

如果这次萧条和以前发生的都不相同，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 15~20 年间，世界信用体系和银行业以及生产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迅速的变化。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过去的专业训练或自身的兴趣不愿意深入研究欧洲货币市场的复杂性及外汇市场的细节。银行业被视作一种肮脏、卑劣且反社会的活动；国际货币谈判的政治特征或银行业创新和管制的技术特性看来与工人阶级的福祉相去甚远，他们因此不感兴趣。因此肯定只有一小部分左翼人

士考虑世界萧条的货币方面——而我认为货币方面是事件的中心。因而，只有少数人察觉到现代全球资本体系主要的缺点不在于剥削劳动力或压迫工人阶级，而在于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无力使货币体系保持稳定和切实可行地运行，能够足以维持全球的生产体系。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更彻底的观点，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令人佩服地进行了解释和记录。安德森在他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一书中，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即“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分裂”，马克思一直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很重要——追溯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引起的失望情绪以及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在政治荒原中逗留的事实。苏联因帝国主义封锁而出现的鸿沟，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官僚体制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在共产国际的主导地位所确定。他说，其结果是：

大学的理论家与各国无产阶级生活隔绝开来，经济学和政治学从理论浓缩成一种哲学。伴随这种专门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语言困难，而语言的技术障碍承担了使它与大众隔离开来的功能（安德森，1976，第92~93页）。

40年代晚期，美国与苏联交恶引起的痛苦的理想破灭以及麦卡锡时代以来对美国左派的残暴隔绝，使隔离情形进一步加强。可以说这种长期分离既可用来解释1968年庆

祝巴黎和其他地方工人和知识分子短暂结合时的狂喜；也可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发生在工业、贸易，及更重要的金融领域中的深刻、重要变化长久以来一直不感兴趣的原因。确实，在拉丁美洲“分离”现象没有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那么明显，但结果却是那里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却更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以及对政治经济领域进行了严肃得多的实验研究。但是焦点一般集中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对地方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影响上，而不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例如可参看，卡尔多索与奥唐奈，1979；卡尔多索与法莱托，1979；以及奥唐奈，1973）。在欧洲，多数主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更高尚的哲学主题上，对当今经济发展关注很少（如阿尔都塞，1971；普朗萨斯，1973，1978）。

这样，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解释论的几乎所有缺点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左派的论点也很混乱、自相矛盾、不明确。它也很难逃脱过去的经历形成的思维的束缚。那些确实论述有关世界萧条的大部分人——如他们中的保守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同仁——只限于描述一种日益恶化的现象，而不是尝试提出一种逻辑上满意的解释。

就我所知，苏联的著述甚至更少。尽管可以想像这些著述会批评美国利用美元的地位进行剥削，但是很奇怪，这些著述对这种关键问题，如为什么70年的衰退如此短暂，而80年代的衰退如此持久，很不感兴趣。不仅对特别提款权的运用，银行业解除管制或限制欧洲货币体系这样重要的争论，缺乏技术上的理解，甚至总体分析也非常概

括和肤浅，也许是无知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妨碍了他们的解释。因为如果所有资本主义体制具有内在自我毁灭性，就不可能接受资本主义的好政府可以克服对坏政府而言很难克服的困难。

只有少数分布在不同年龄层、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例外。在这些人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的两个很大的强项：对世界经济的变化提出了一种更长远、更冷静的观点的历史视野；一种超越不同国民经济和国民经历差异的系统观点。当然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两种角度看问题，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赫希曼、阿瑟·刘易斯、保罗·斯特里顿、迈克尔·利普顿、布罗代尔和佩鲁）也持有的一种更长远的观点，广泛地看待体系而不是运用狭隘的国家和国际术语来对它作出解释。

甚至被其他人驳斥为异端、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也一样。伊曼纽尔的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也许不少于任何一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被翻译的文种数目。他关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均、北南双方不平等、贫富贸易的解释确实很成体系（伊曼纽尔，1971、1976）。他的分析依据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信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移民法限制对不同国民经济中的工资差异作出反应。因此贸易和收入出现不平等，高工资维持在工业国，而在发展中国家完全一样的工作工资却很低。当进行商品交换时，高工资国家以高价交换。反之，自由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移民限制理所当然，好像限制是内在的，而非政治上强加于体制的一个政治特征；他们也不仔细探究对工资差异作出的

解释。

近年对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作品欢呼是因为他具有对世界体系进行整体描述的相似的能力，而别人却只看到单个的繁复多变的国家。在他所著的研究16世纪欧洲农业的书《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以及后来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中，华勒斯坦使新一代美国学生把注意力从1945年后的经济问题——讲述当前事务的教科书已经使他们对此很熟悉——转向关注社会经济长期变化这些更深刻问题（也请参看霍普金斯与华勒斯坦，1982；及华勒斯坦，1974、1979）。约翰·加尔通（Johann Galtung）的作品也同样适用。约翰·加尔通在追随佩里（Perroux）以中心和边缘这些术语讨论世界体系时，他也许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结构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加尔通，1975；贡德·弗兰克，1966）。但是，加尔通和华勒斯坦都不太关注80年代的萧条或70年代的货币发展的起源和分析。

与这些问题更直接相关的是一名埃及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作品。阿明在其著作《历史上和当前危机中的阶级与民族》（Class and Nation,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Current Crisis）一书中，关注这次萧条和以前历次萧条的主要差别，即这次萧条与通过跨国公司享有的获得资金和技术的优越地位而发生的生产迅速国际化同时发生。国际劳动分工变化加速，很大程度可归因于欧洲市场的扩展和银行业的国际化。通过国际劳动分工，昨天的食品和原料生产商成为今天的鞋类、衬衫、船舶、汽车

和电视生产商。世界经济某些方面的结果——结构性失业、工业下滑、不确定以及信心下降——直接与另一些方面的结果——政府中的专制主义、公共部门的扩展、外国企业的国有化、都市贫民窟以及低工资——联系在一起。

阿明主张把国际资本（以银行和跨国企业形式存在）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国内政府的关系与它们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关系联系起来。通过资本和技术更大的流动性，它们可以将经营活动转到其他国家，通过廉价劳动力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来补偿国内下降的利润率。方便的信用和快速的增长率允许边缘国既可以支付借款利息和引进技术的价格，也可以支付他们发现越来越有必要进口的粮食的价格。

阿明认为从事跨国生产、加工或服务的资本家不仅面临国内好斗的工人阶级的挑战，而且也面临边缘国的充满敌意的民族资本家的挑战。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这两种力量对抗。因此，他们通过在新社团主义收入政策中与政府合作避免和前者发生公开冲突；通过与后者分享剥削收入避免与之交恶。只要政体很稳定，足以保持国际金融和商业信心，这些资本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当权者坚持民主还是实行专政，是军国主义政府还是平民政府，实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毫不关心。^①

阿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存在这些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

^① 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谁是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争论也没有结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只能自我定义的“地位”——正如“解放的妇女”一样。在这两种情形中，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解放的妇女”，你便是。

潜在条件，便没有可能进行一场严肃的北—南谈判。他没有看到被预示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崩溃，而是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在他认为的今后长时期的缓慢增长和变化过程中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通过打破国家之间的联合以及国家内部以及跨国界的阶级利益之间的联合而实现。像许多拉美的左翼作家一样（包括卡尔多索与奥唐奈），阿明非常熟悉第三世界的政治现实足以使他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归罪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如此多的政府无力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是一个确保它们以某种形式持续依赖金融、管理和信息权力中心的主要因素。

但是，更普遍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两个方面应该使更保守的人士感兴趣：他们对美国或其他国家自60年代中期以来追求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凯恩斯提出的解释和解决方法的批判分析。

对第一点，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同货币主义论者（以及像金德尔伯格一样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即一旦美国行使雅克·吕夫和戴高乐一直称作的在金本位下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s*），滥用作为世界银行家的权利并允许金融市场击败金融体系，那么体系的稳定性将遭到致命的破坏。求助于浮动利率是另一个敦刻尔克式的撤退——几乎不是胜利而是避免彻底灾难的应急措施。后来采纳的特里芬所谓的“纸币本位制”进一步向美国提供了更多特权，这些特权也遭到滥用，因为美国通过使美元贬值来补偿美国收支平衡上的石油进口账单，并夺取了石油生产商第一次石油价格上涨获得的大部分实际价值。外汇和其他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通过商品市场的不稳定反映出

来，而商品市场不稳定使石油价格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遭到进一步恶化。第三世界的人们和美国国内的工人是受害者，他们均可看出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弱点。

哈里·麦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斯威奇（Paul Sweezy）在美国左翼人士主办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文章，详尽阐述这一点，并伴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式的夸张，以用于扩大其销量。他们的文章在《美国资本主义不断深入的危机》（*The Deepening Crisis of US Capitalism*，1969）一书中结集出版，他们的文章表明了对经济趋势的一种警醒，也表明他们拒绝被官方辩解所蒙骗或被大卫·卡里奥在他的《帝国主义经济》（*The Imperious Economy*）（1982）一书中辛辣讽刺的学术恩赐所欺骗，实在令人钦佩。但是麦格多夫的悲观主义思想甚至不允许他承认萧条具有周期性并且迟早会结束这一点。他认为，萧条是结构性的、永久性的，源于想生产出比可以找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途径更大的剩余价值这一内在、强烈、持久和日益增加的趋势（麦格多夫，1969，第179页）。由于他认为在美国有任何影响力的人对于如何处理这种萧条都没有哪怕最模糊的想法，惟一的可能性是社会主义者继续依靠革命推翻整个体制。

和许多货币主义论者如出一辙，马克思主义者把1965~1970的通货膨胀视为以后通货紧缩必要的前兆。但是他们扭曲了这种传统说法。除了和货币论者一样强调消费政府在防务、教育、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及有组织的劳动力的谈判力不断增加而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提出，政府不论其政治标语如何，实际上越来越倾向于通

过安排一系列对公司的暗中施舍伎俩掩盖利润率下降的事实。政府不仅为英国人所谓的“跛脚鸭”提供支持，而且也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税收减免、税收延期等。有一些措施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后来成为税务咨询人员的前税收督察员能够完全理解它们的重大意义。

其他人则批评新古典主义著述过于低估资本积累的作用。早先提及的关于缓慢增长的论文集也包括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格林提出：

尽管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增长速度不同，但面临不同国家长期以来资本输出比例相对稳定这一事实，他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得不假定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不一样，因而具有更快或更慢的积累速度。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其反面：不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同国家的生产增长率不同（格林，1982，第149页）。

格林因此在探讨资本积累问题时提出（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同之处）萧条的种子是由上一个十年的通货膨胀政策播下的。这种提法的缺点在于一种过时的设想，即设想投资是由过去的利润产生的资本积累来控制的。事实上，银行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将资本创造（即信用）与资本积累的获得途径有效地分离开来。格林更擅长其偏爱的领域，即工厂管理层对生产力下降作出的反应对工人产生的影响。继30年代引入了“福特主义”（对无情的装配线生产的称谓）后，现代管理引入了机器人和“协作生产”

制度，从而具有更好地胁迫工人和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的另外一种贡献可能符合保守主义者的口味，即对凯恩斯主义关于目前危机的解释尤其是对凯恩斯主义者所开的治疗方法的批评。苏珊·德·布吕诺夫 (Suzanne de Brunhoff) 是一个受欢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她避免谈及受到更普遍关注的深奥哲学问题。在她所著的《国家、资本和经济政策》(State, Capital and Economic Policy) 一书中，她同意赫希曼的看法，即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环境中运行，而是在由以前的模式和观念，包括商业主义而形成的环境中运行的 (赫希曼 1983)。她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她发现这些观点不时重现，有效地划分了资产阶级。她对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正确地 (我认为) 判断出其主要目的是心理上的而非纯粹经济或金融上的，因为其目标是通过运用国家政策来驱散不稳定性以补偿资本家反常的流动偏好。^①主要由信用构成的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得到了国家担保，因此，改变了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关系 (德·布吕诺夫，1976，第 121 页)。

但是，她的结论并没有超越 30 年代已得出的结论：惟一的补救措施是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消灭其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基础。尽管她确实将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的危机归结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信用管理不当，但是最后

① 凯恩斯用语，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的心理动机。——译者注

她只能重复莫里斯·多布 (Maurice Dobb) 和卡莱茨基 (Michael Kalecki) 40 多年以前已得出的结论, 即资本主义体系使资产阶级可以在再次通货膨胀、实行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以及失业之间进行选择。^① 她说, 最近所有 3 种方式都被采纳, 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的资本主义舆论遭到损害。不难预测,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这种观点, 只是偶尔出现下面一种说法: 一体化现在正走得如此远以至于不再可能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我认为, 在遭到美国禁止入境惩罚的比利时托洛茨基分子欧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的作品中, 可以发现对新凯恩斯理论及其解决方案更深刻的批评, 如曼德尔所写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 和《第二次萧条》(The Second Slump) (曼德尔, 1977, 1978)。^③ 曼德尔对自由货币主义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府持有同等怀疑态度。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他相信增加生产中的资本投入, 通过吸收失业储备大军中的劳动力 (妇女和客籍工人)^④ 使失业大军人数长期得以减少, 同时盈利性的生产性投资新机会越来越少, 将导致政府选择推迟或掩盖随之而来的利

① 多布是一名剑桥经济学家; 作品早于凯恩斯的《通论》的卡莱茨基则是一名波兰人, 他曾移民美国后来于 1955 年回到波兰。N. 普朗萨斯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他英年自杀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少了一名潜在的领袖。

② 也许现在的东欧这种暗示更普遍。也请参看这些学者, 如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所写的“经济世界化的准则不可逆转”, 《话语与工具》, 巴黎, 1977。

③ 《第二次萧条》首先在德国出版, 书名为《危机的终结和没有终结的危机》(Ende der Krise oder Krise ohne Ende)。

④ 尤指西德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西班牙和巴基斯坦等国招聘的工人。——译者注

润率下降的政策。传统生产过剩的危机因为赤字消费和信用的大规模扩展其深度和持续时间受到限制，但是这些避免了两次大战期间的萧条再次发生而采取的抵御危机的技术的效果已经明显下降。

然而，曼德尔和许多欧洲左翼学者不同。他不认为凯恩斯提出的为刺激经济政府进行投资的方式有效：“只有当家庭收入的增加伴随着利润率上升以及市场普遍扩大的前景时，它才能真正刺激这个周期”（曼德尔，1977，第177页，我加的黑体）。但是由于这种市场现在具有全球性，随着银行放款额下降，这里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必然会阻碍这种政策的实施。自由解决方式也不起作用，因为在萧条中，（工人、企业和国家的）自身利益导致相互冲突而不是共同合作。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在这种时候可以通过增加出口得到复苏是一种普遍的幻想。同样，由法国的密特朗和墨西哥的马德里提议，由意大利已故的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提倡的“通过紧缩开支使行市坚稳”的政策并不会比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在战后提出的那些政策更有效。曼德尔说，加尔布雷思关于收入政策的新社团主义谈判和“共同削减开支”只会在实践中致使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认为如果这些政策抑制消费投资将自然上升，这一观点也不正确。因为除了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以外，还有第三只手贪婪地伸进国民生产总值的罐子里——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的非生产性消费，它们的强制力量比其他两种力量中的任何一种都要强大得多。因此，混合经济是一种“危险的使人迷失方向的神话”，是“工人阶级的陷阱”。尽管曼德尔的分析很犀利，然而

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死守这样一个幻觉，即南北的工人享有共同利益，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仍然必须是追求的目标。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鲍勃·罗桑（Bob Rowthorn）的作品和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的作品一样，在商学院广为被阅读。鲍勃·罗桑在许多方面同意曼德尔的观点，尤其是对其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中期国家政策的趋势这一点他十分认同（罗桑，1980）。并且他说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对近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两个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另一个是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1972）。罗桑是马克思主义者中为数不多的理解银行信用的重要性的学者之一。他认为，

关键点是它可以提高经济中的总体购买力。银行不仅仅是人们的积蓄流通的渠道。通过透支体系它们实际上创造了新的购买力，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供超过资本家或其他任何人的积蓄的投资资金……和国家一样，它们可以创造新购买力（第122页）。

这种看法和曼德尔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观点有一个根本差异。“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指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人投入的资本额。曼德尔相信资本有机构成是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关键变量，因而得出利润没有被榨取的结论。罗桑辩论说：因为信用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一直保持稳定，因此近期的利润在产出中所占的比例较

少，原因是每个工人创造的利润下降，国家强行占取部分收入，工人通过组织所占份额日益增加。

他也根本不同意曼德尔提出的80年代萧条产生的原因。^①曼德尔认为萧条是体系必然的后果，如他所说，生产过剩的结构性危机和其他周期性危机结合在一起了，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长波转向，工人越来越好斗，购买力重新分配到石油生产者手中。根据他的观点，全球生产结构要求资本自由流动，并以普遍规则对其进行管制，这种普遍规则允许以资本主义逻辑的“价值法”裁决国家之间的冲突，并用以解决危机（参看上面的吉尔伯特和维特芬）。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作恶工具，而应视为这种客观逻辑的体现。

罗桑更多强调政治而不是经济。他的解释是政府已穷竭通货膨胀力以抑制利润率下滑的势头；“需要更大的剂量”，最终国家恰恰面临它们通过膨胀试图避免的那些艰难选择。强加信用限制，采纳货币目标使利润率下降，这反过来导致世界经济的普遍衰退。体系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膨胀通过损害弱者的利益回报强者，而投机者得到回报而使信誉受损。

罗桑和萨米尔·阿明一样看到了萧条以外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活力将从现在的发

^① 两种观点都可以追溯到同一部由格林与萨克利夫（Sutcliffe）所著的著作（1972）。由W. 诺德豪斯（W. Nordhaus）在奥库（A. Okun）与佩里（Perry）所著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论文《利润比例下降》中也记录了利润率下降的事实（《布鲁金斯第一号论文》，华盛顿，1974）。

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欠发达国家，活力将代表资本主义模式已进一步拓展到尚未被征服的领域。^①

与曼德尔或罗桑相比，意大利经济学家里卡尔多·帕尔博尼（Riccardo Parboni）更敏锐地察觉到国际货币史的历史背景、货币角色所处地位以及汇率操纵以影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经历世界萧条的方式。（帕尔博尼，1980）他对美元在体系中的地位的分析使他得出这种结论，美国能够将那种经历推迟至于1979年，并且比欧洲的伙伴国更快地从70年代中期的衰退中恢复元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与早先讨论的美国政治决定论者的看法截然对立。政治论者认为美国像阿特拉斯^②一样支撑着一个无法承受的重负，而帕尔博尼则将美国看做处于一种能够利用自身特点相对不受经济衰退影响和国内市场左右的优势地位，使自己比其他国家受害时间迟一些，受害程度轻一些，并能更迅速、更快地得到恢复。（美国）70年代运用剩余工业能力的一些对比数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斯特兰奇和图泽，1982），许多欧洲人也赞同这种观点。帕尔博尼的结论大体和曼德尔的差不多：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丧失了其“人性的面孔”回到“野猫资本主义”和早期的不加束缚的“卡特化”的时代。社会民主没有将它驯服，世界工人应该重新获得阶级觉醒，和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新兴

① 罗桑，1980。引文回忆了马克思的有预见的观点：“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论》，第一卷）

② 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译者注

大众联合起来。

在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找寻灵感的许多欧洲作家中，帕尔博尼是一个典型代表。他感觉目前的危机复苏了马克思、列宁和熊彼特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过去被过早地宣布过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重新定义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列宁认为它们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熊彼特认为它们牺牲了小企业的利益，使寡头垄断进一步加强。帕尔博尼预料到可能发生灾难，吸取了3人的思想，反对凯恩斯提出的观点——即危机只是一种由资本家反常的流动偏好导致的非理性偏离，可以通过明智地管理克服这些危机。

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危机的解释最大的弱点和《资本论》的弱点一样：预料工人会做出革命的反应。马克思预料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引发革命，导致体系的崩溃，在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货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再具有主导地位。实践证明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错了。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普遍的弱点仍然是预料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将使新旧工业国的工人走到一起共同进行革命事业。阿明和罗桑这两个学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抱着这种可笑的希望，而是视金融和银行业的国际化为体系的阿喀琉斯的脚踵^①，它会破坏政府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合作，甚至引发经济混乱。

^① 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出生后被其母亲握脚踵倒提着在黑河水中浸过，因此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阿喀琉斯的脚踵”比喻致命弱点。——译者注

结 论

因此，同意这种关键弱点的主要有那些处于政治派别两个极端的人：即那些如此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以至于希望完全摒弃这种制度的人，以及那些如此珍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享有不受政治独裁和压迫的自由以至于寻求限制国家卷人并进而限制国家运用权力来进行剥削的人。只有那些最希望保留或想废除资本主义体制的人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发现其弱点是货币管理不当。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发现一些实用主义者：他们大多数是像吉尔伯特或维特芬和施魏策尔一样的高级官员，对体系中的秩序恶化有长期的实践经历。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是学者。

因此，通过前面的章节对这些观点粗略地审视，我们发现了一张点缀着不同学者个体的全景图，而不是一张由一些成形的学派的组成的区域构成的层次分明的图案。回顾过去，我被这些学者的非常个性化的理解深深打动了。他们所有人从根本上说是独行者。没有一个人属于大型的学术队伍。因此，远观近年这些观点的面貌，它们看来不像由大平原和巨大山脉组成的整块大陆，而是像火山峰群岛一样被零星散布在一个风暴交加、不平静的思想海洋中。

总之，过去十几年的标志不是有内在逻辑性的相关经济理论的胜利，而是普遍出现的无序状态。考虑到本世纪西方世界对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投入的巨大资源，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富足的收成，即出现有说服力的、证据充足的解释，而是发现对当前经济事件的理论解释如此匮乏。

这确实是与本世纪中期即 30、40、50 年代截然不同的一个巨大变化，那时大部分专家观点挤在中间立场，他们为混合经济鼓掌，承认国家干预的益处。当时甚至连美国总统也认为，“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没有人认为那是一句妙语。尽管需求管理的方式方法和国家支持和干预的程度有所不同，大多数观点仍然是这种传统的集合。它为战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轴心国的建立形成了学术基础。这也是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以取得一致，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中巴特勒（Butler）和盖茨凯尔（Gaitskell）的追随者可以很自在地分享“巴茨凯尔主义者”^①的混血标签的原因。

根据这种对经济趋势不同解释的粗略审视来判断，在 70 年代这种中间道路出现了难以预料的贫乏。并不是说坚持中间道路的确切人数变少了，因为许多活跃在政界或经济学研究中的人还在那里怀旧地徘徊。像农民一样，感情上仍牵挂边际肥力（marginal fertility）下降的地区，因此，他们不愿意离开，不知该向何处去，像米考伯（Micawber）^②一样，寄希望于意外情况发生。然而中间道路不再能够对政府干预失败和体系运转不良作出满意的解释。它很少有希望提出解决急迫的政治问题长远有效的办法。

造成这种贫乏有两个原因，两个原因均不难被发现。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市场加速国际化，直接或间接地将国民经济的更大一部分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由

① 指对立的政治家支持同一政策的情况。——译者注

② 狄更斯小说《大卫·科珀菲尔》中的人物。——译者注

于资本和技术很容易跨越国界流动，因此凯恩斯的中间道路假设，即一国政府具有管理国内事务的权力，已不再成立。第二，碰巧，同样的假设遭到另一种重要变化的损害。这就是在大多数发达的经济中，官僚机构和国家预算负担过重。对社会服务和福利体系日益增加的要求——有时还有对防务的要求——通常被置于国家用货币支持陷入困境中的老工业和在先进新工业中投资这种需要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的消费占据了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这时要求政府充当抵御的力量来纠正市场经营者的难以驾驭的低迷或反常的悲观主义，这和公共花销只占国民经济的20%以下时提出要求效果截然不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经常申明这一点，新凯恩斯主义者从来没在这一点上作出合适的回答。至于其他因素和情形，有一点是现在利润率开始不断下降，原先的逻辑已不再有效。

我怀疑正是中间道路的学术贫乏最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当代学者在解释70年代发生的事件时——尤其是货币体系的发展时——求助于不同形式的决定论。因为不论是经济、技术还是政治上的决定论对个人来说都相当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主义。50、60年代的存在主义作家追随萨特的脚步，坚持认为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是由社会外力强加的经验形成的。如果他/她的行为越轨或具有破坏性(Destructive)，个人被免除罪过不必感到有愧。同样，认为政府作出选择受到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技术变化或一些政治优势的丧失的限制和压力的决定论看似有理，同样只触及皮毛，会导致同样方便的结论，即我们不必深层次地探究目前面临的困境的源泉。

相反，那些确实看得远一些、并且更熟悉决策者在过去的20年（有人会说40年）内作出选择的人发现，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目前状态有关的任何事物都很难说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不论对货币史或其背后的政治争论的关注来自在政府或银行业中的直接经历或来自学术研究，根据我的经验，它总是致使人们不仅反对决定论的谬误，而且反对将贸易政策夸大为经济萧条的原因。

正因为这种社会决定论总是视经济尤其是货币问题的原因存在于经济学王国之外，它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一种无效的影响，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理论家力所能及的。要不是技术就是阿拉伯人或者是工会或媒体导致了对消费无止尽增加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论谁或什么事负有责任，经济理论找不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性质的答案，因为根本问题不是经济方面的。这确实非常正确，但是令人震撼的是，甚至没有人接下来试图认真地寻找对决定性因素作出解释。为何美国不能也不愿意通过非膨胀性方式来对付更高的石油价格？为什么为越南战争筹资不能以财政方式进行？毕竟，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带头实行配额消费（rationing consumption）成功地控制了过高的商品价格。尽管这种例子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国家在进行战争时并没有允许通货膨胀开足马力前进。

这种社会决定论也与两个条件相一致（实际上，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可能）。一个条件是否认或不重视管理货币和金融中的选择因素（尤其是管制信用创造程度和监控获得信用的途径的选择因素）。不论是什么因素必须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第二个条件是对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分析必须

与货币管理分离隔绝开来对待。可能因为不同的国际组织被卷入，并且国际组织相互之间不太容易交流，这种学术分离主义也许在国际上比在国家范围内更容易实行。然后，分离主义允许那些寻找解释的人不必看到比公司或国家的最直接的金融环境更远的地方。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认为货币管理相当公正的货币主义者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货币一点都不公正的马克思主义比大多数人更容易避免这两种陷阱。这两种人都从相反的假设——即信用管理必然带有高度的政治性——开始，我认为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两种人都认为正是世界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管理得当或不得当形成或破坏了世界经济。两种人都认为正是政府近年来作出的世界货币体系史上的关于货币和金融的政治决定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决定了跨越国界、跨越阶层的盈亏风险和机会的分配。

第4章 在黑暗中打赌

金钱没有提供防御生活中不确定的保护措施，金钱本身反面成了导致新的不确定的原因。我们不仅不能确定世界萧条的持续时间，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通货膨胀何时或是否会再次回来。我们只能猜测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的差异如何。1990年的石油价格任何人都可以赌一把。处于这样一种当最保险的工作可能忽然消失并且更多的人将成为冗员的时候，货币体系提供安全储存手段（store of value）的能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小，而货币体系应该向人们提供这种安全储存手段，用来保护人们免遭这些不幸或疾病或用来防老。

为什么这事关重大——我相信确实事关重大——不仅对那些有钱人或那些通过处理或与货币打交道而谋生的人而言，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找到快速或简单答案的问题。它需要进一步思考货币对人类关系或社会中人的行为所起的影响。货币的这种更具有哲学性的方面是近年来没有被看见并遭到忽视的地方。现在，大多对货币和货币问题的讨论非常机械化，集中在技术细节和十分细小的方面。这个机制背后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很少被提及，然而这正是几位早期社会学家努力思索的问题，精典政治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从

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其中，对这一问题考虑最多的论述之一是19世纪末一位德籍犹太人所写的学术著作。这位犹太人名叫西梅尔（Georg Simmel），他一点也不相信货币的普遍使用有百利无一害。^①因为第一、货币取代了对物品、商品、服务的主观评价，而代之以用货币价值来对它们进行客观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贬低它们的价值。如他所说，货币使质得以量化。它使根本上不相等，无法比较的事物处于同等位置上。同时，使用货币而不是物物交换或自然经济生产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关系网，但是同时，它也使这些关系冰冷化，使它们更机械，如我们所说的，使人们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西梅尔并没有否认货币使用给社会带来的优势。它只是并不像所有介绍经济学的课本随之解释的那样，通过劳动分工，货币使用而不是物物交换或自然经济生产极大地增加了财富的生产。货币使用也增加了一种政治价值，在于它给予人们更多自由，选择消费什么，用谁的服务，也许最重要的是可以选择今天享用商品或服务，还是省下来用于将来消费。如果没有货币，当然只能储藏谷物和其他

① 这本书篇幅很长而且不着边际。1900年以《金钱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Geldes*）为书名发表，最近才被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和大卫·弗里斯比（David Frisby）翻译成英文出版（1978）。弗里斯比提出，西梅尔从未获得适当的德国大学的教授席位可能是因为德国社会占优势的排犹主义。由于没有专业地位，西梅尔因此对其他学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西梅尔作品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因S.赫伯特·弗兰克尔（S. Herbert Frankel）教授近来发表的鼓舞人心的小册子《金钱的两种哲学》（*Two Philosophies of Money*, 1979）得到补偿。

一些不易腐烂的商品，如羊毛或木材，某些金属甚至酒类。但是许多其他东西如肉类、鱼、水果和所有服务都不可能储藏起来用于今后消费。因此，没有货币限制了我们的选择今天消费或明天消费的自由。

对西梅尔来说，以财富和选择自由表现出的优势与人类关系质量丧失之间的平衡关系一点也不清楚。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使用货币和货币使用使之成为一个阶级的积累资本恰好是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使人剥削人成为可能的基础。马克思洞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使用货币指导人们的劳动，致使生产关系日益贬低。马克思无疑对欧洲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普遍的生产关系抱有一点浪漫幻想，在那些社会中主要是他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模式。这也许是因为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的下述观点总是十分模糊和不真实，即曾经享有货币使用所赋予的自由的的社会很容易放弃这种自由，并且对依附别人做出决定感到满意，社会主义国家就隐含着这种依附。

西梅尔的伟大研究中对货币的根本属性中性（neutrality）谈得很多。你不必信任别人而可以信任这种中立、稳定的交换媒介和储存手段。他认为，货币的稳定性允许人们信任以货币表现出的价值。我们看来，那是一种十分天真的想法。但是他的作品写于1900年，因此，他将货币视作信任和信心的源泉就不足为奇了。至少在欧洲，很难想像现在有比当时的货币更稳定的时期。

但是，西梅尔强烈地意识到货币价值变化的社会后果以及个人的不同反应。他辩论说，如果每个人口袋中的钱

数突然神奇地增加一倍，同时商品和服务供应量不变，人们对这种神奇变化的不同反应将导致实际价格重组（如我们称谓的那样）。他说，假设这发生在3个人身上，一个人有1千马克，另一人有1万马克，第三人有10万马克。如果使以货币表示的名义收入或财富突然增加一倍，所有人都不会完全重复原来的消费方式。因为穷人将大胆地购买更多食品；富人将储存更多积蓄用于购置土地或财产；中间的那个人将自在地将更多钱花在小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上。因今天所谓的货币幻觉导致的这些选择，放大到整个社会，在货币幻觉持续的短期内，将实际上改变许多商品的相对价格。甚至这种关于货币价值非常微小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将损害以货币为基础的社会的稳定。因为，尽管财富的相对份额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货币数额变化将导致实际价格——参照其他商品得出的一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因此，将信任置于不变的价值和货币本身的供应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点发生变化，其他的实际价值将会间接得到改变。

因此，对西梅尔而言，货币代表着信任；但是信任只能以忠诚和经历来建立。不能通过签署命令来创造信任。像爱情一样，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得到信任反而更容易毁坏它而不是保证得到它。货币的自相矛盾在于尽管它具有机械、冰冷化和中立的特征，但是只有当它依赖非理性，甚至像忠诚这种情感性的东西时，它才能更好地运行，才能给出最大的利益。

在金融市场工作的人比理论经济学家更能理解西梅尔的观点的适宜性。他们知道伦敦证券市场的格言“我的话

即我的契约”就是宣布同样的信仰；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信任这种重要的因素，欧洲货币市场的日常交易不可能进行。他们也意识到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而毁灭它却很快。一旦信任遭到破坏，要重建信任要花更长的时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不仅对其他事情而且对货币也适用。欧洲人，可能尤其是法国人，对黄金的依恋证明了因政府背叛信任而造成的长期的宗族意识，正如德国人惧怕通货膨胀反映了由于1923年物价飞涨造成的集体创伤一样。

而且，看来在社会关系领域中信任遭到背叛或被怀疑，有向其他领域蔓延的趋势，不论是对财产安全，或对政客良知、官员的谨慎还是对警察的公正无私的信任都有这种趋势。

本章中经常重复的论点是：全球货币体系正是不信任蔓延的重要源泉，这种蔓延远远超越金融中心的界限，影响到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关系；不确定造成的恶性循环，既由第2章提及的政府关键决策引发，也因市场中增加的不确定引起。确实，政府的关键决策经常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过去的经历表明，政府的关键决策甚至创造由不确定主导的新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欧洲货币市场和为数众多的各种期货市场。

但是在仔细解释这种不确定的恶性循环是如何形成的之前，需要提及有关不确定本身的其他一些政治和社会侧面，它们也属于无人照看的土地的另一被忽略的方面，这片区域仍处于政治和经济之间，划分很不恰当。

过去的四五十年中，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的趋势

是构建越来越复杂的有关市场行为的理论，尤其是基于理论预期的行为的理论。这种理论部分宣称与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开创性作品从知识上一脉相承，这部作品起先是他 1916 年为康奈尔大学写的毕业论文，1921 年以《风险、确定性和利润》（*Risk, Certainty and Profit*）的书名出版（奈特，1933）。奈特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什么一直依靠每个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某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如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的一样），但是它实际上在社会中很有效率。奈特辩论说资本主义制度很有效率，主要因为作为人难免会犯错误，企业家因而不是裁决自己判断力的好法官。他说，男人——为避免造成性别歧视，也可以加上女人——“对自己的好运有一种非理性的强烈自信”；在此之上，他们会过高估计他们自己从事的任何商业的成功机率。要提出那种见解，有必要像奈特一样区分风险和统计概率。风险，即他所谓的先验概率（a priori probability）。关于这一点，有大量的著述论述有关靠运气决定胜负的游戏和数学机率；而统计概率（statistical probability）则涉及到将与一组事件、案例、公司或任何可被归为一类的东西发生的概率有关的统计数据运用到具体事例中。前者是多数保险业务的基础，但是几乎从不发生在普通商业中；后者发生在普通商业中，但是统计概率是否有用取决于被归成一类的事件归类的准确性。而且，尽管一百万幢房子中有一所被烧毁的统计概率可以得知，但仍然无法确定究竟是一百万房子中的那一所。先验概率和统计概率必须和估计区别开来，估计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是所有商业决定的基础。

以任何典型的商业决定为例进行说明。一个生产商正在考虑做出增加自己工厂的生产能力的很大承诺的可行性。他大概“算计”一下这种建议，尽可能将多少能够量化的不同因素考虑进去，但是最终结果只是对建议的任何行动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出“估计”。判断错误的机率是多少？很明显，将计算这种机率说成先验概率或通过观察研究大量案例来决定机率，都没有任何意义（奈特，1921，第226页，in LSE 重印系列 No.16，1933）。

而且，不仅基于估计的商业决策并不具有真正的理性，而且它们易于高估而不是低估成功的前景，因为正如亚当·斯密很早以前观察到的一样，人们为不确定的报酬而工作获得的平均回报比为固定报酬工作更廉价。我认为奈特正确地观察到，生活的主要目标不是使利润最大化或“满足”许多理性野心（请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原谅我的不同看法）。“人对生活的兴趣终究是发现生活很有意思，它和纯粹消费大量的财富很不相同”（奈特，1933，第269页）。

但是，由于生产或贸易的任何经济程序不得不在对产品的需求和供应那种需求的全部费用可以确切计算出之前进行，因此它必然包含不确定性，如奈特所说，“理性行为努力将使方法适应目的时涉及的不确定性减少到最小……”（第238页）。因此，奈特在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检验应付不确定的结构和方法。

其中，他特别关注各种形式的保险，从其精算方面

到互助保险协会，如船运公司所属的利润与赔偿协会。他也将投机包括在保险业之中。投机听起来好像与保险非常不同，但考虑到它与不确定因素的关系时它实际上是保险业的补充。因为当一人将风险扩散到一些人，使他们可能遭受同样的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后者使不确定从企业家转向专业人士了。投机商业中的专业人士有两种优势允许他们或者降低不确定的代价或者从中渔利，或两者兼而为之。第一种优势是单个企业家只进入市场一次，而投机者将进入市场上百、上千次，因此“他出现的判断失误必定表明一种更强的相互抵消的相应趋势”（奈特 1933，第 256 页）。

这正是 在外汇市场或欧洲货币交易中发生的事。银行的外汇交易员能够使一个人针对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是否会亏损的不确定性，与另一个人针对美元相对德国马克升值是否会亏损的不确定性，相对应。另一种原因是他们熟悉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精于与该市场有关的决策，仅这两项通常致使投机者比他的客户得到更好、更快的信息。

奈特也预见到，在这些情形下不确定导致的一种可能的后果是对信息和统计的需求大量增加；针对这种需求，加工可能的信息和处理统计数字的咨询服务将会增多。实际上，在辩论过程中，奈特指出了针对体系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有 3 种主要反映，它们分别是多样化、保险和对信息需求日益增加以降低不确定性。在奈特写此书时，美国正值中立孤立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当时仍沐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稳定的温暖余辉中，他有一次

提到“像我们这样一种很少受进步和无常的变化影响的环境……”（奈特1933，第335页）。^①因此奈特并不直接关注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中来自进步和难以预测的变化对社会或体系的影响而产生的问题。然而，他对于企业家在应付不确定时的非理性以及他们特有的反应的观察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观点，可以用来纠正基于理性选择和理性期望观念的许多当今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在“慎密”和内在逻辑一致中获得的任何益处已经在它接近人类的真实行为——不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行为——的精确性中丧失了更多。

投 机

尽管投机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奈特将它视为自由经营的补充，并且是通过专业化分工社会可以获得经济进步的另一种方式。通过许可投机，社会可以允许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并允许由那些最愿意承担那种角色的人承担不确定性。甚至在工业中，不确定性导致工业中的功能分离的趋势。因此，一旦一个企业、一种产品或一种研制结果已变得安全并确立起来，“发起者”——我认为他们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产开发者和企业金融资本家——往往会离去。

奈特不得不说及的关于投机的只言片语跟40年前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在解释伦敦金融中心的运作

^① 奈特将预料中的变化、比如昼夜的交替和人口变化趋势，和无常的变化作了有用的区分。所谓无常的变化指的是更难作出反应的变化、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特征。

时的论点惊人的一致。白哲特在他的《伦巴第大街》(Lombard Street)里发现了世界贸易体系有效运行的3个必要条件,它们是:第一,可用于投资的货币贷款资金;第二,应有一种投机基金;第三,有急于利用最新机会发迹的年轻的人才资源。当然,另一个将利润和投机评价为一种现象的评论家H.冯·马戈尔特(H. von Margoldt)(1855)也发现,那些亏钱的人总是比赚钱的人多——但是要紧的是有发迹的希望,正如亚当·斯密深刻洞察到的,人们更愿意冒一点风险获得获大利的小机会,而不愿意冒失去大笔钱的机会来获得更大、更可能的赢利机会。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外汇市场的交易员,商品市场的经纪人和金融期货的操作员更有可能为他们的雇主赚钱,而不是直接为自己积累资本。但是他们干得相当不错,几年内可以积累足够的资本,因此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机会大大增加。^①今天,年轻人的乐观与进取心和可能的投机资金相结合,确保能迅速、有效地利用因变化莫测出现的投机机会。当然,那种利用必然涉及到市场的拓展和增长,而市场因自身的专业化的特性,注定从根本上是投机性的。

但是,关键是这种拓展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对下述不确定性的直接反应,即那些讨厌承担伴随难以预测的变化的风险的人具有不确定性,和那些想利用人们广泛要求比市场已有的更大的确定性的心理急于发迹的人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投机市场实际上需要不确定。它也需要

^① 例如,1983年美林公司每年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几百万美元作为分给中层管理人员的红利。

其他人对风险的厌恶，一种投机基金以及急于努力工作以获得高于正常回报的年轻人。^①

投机市场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市场：其中，价格根据对未来价格运动的观点而变化，因此它不同于根据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或供应的客观变化而致使价格发生变化的普通市场。在这一方面投机市场很像一个赛马（狗）场，其中有可以对马匹（或狗）将赢得比赛或赢得前几名进行下赌的市场。认为某一匹马将会赢，下赌注的人越多，这些人从赌注登记经纪人获得赔率的机会就越小。结果证明他们的观点可能（通常确实如此）是错误的；但是是这些观点而不是那匹马的才能使价格发生变化。

但是，那些去赛马（狗）场或对赛马（狗）下赌注的人实际上喜欢打赌，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投机金融市场里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是不自愿地被卷入其中的，因为他们厌恶风险，不想赌博。他们害怕不确定性，特别希望保护自己不被卷入其中。投机市场允许厌恶风险的操作员或其代理人叫一个相反的赌注以保护自己免遭担心的结果出现而受损害。因为如果不确定性损害了他从事的不动产业，他至少可以在相反的赌注上赢一把。但是，下那样的赌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价钱已支付给经纪人，如以前解释过的一样，他们因为具有使厌恶风险的顾客的不同担忧互相平衡的能力，并且具有能够左右市场的超凡知识，因而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为，想使自己免遭外汇市场的日益增加的

^① 1985年，华尔街的银行向刚从重要商学院毕业的合格学生支付的薪水普遍为6万美元，是工业行业中相同人员薪水的4倍。

不确定性影响的进口商，会尽力对冲这种以外币所开的发票大于以本币支付的数额的风险；同时，希望以外币被支付款项的出口商，将类似地（或相反地）对冲这种风险，即以外币计算的款项比以本币计价价值更少这种风险。

这样一种市场无可避免会吸引一些赌博者进入更谨慎的经纪入行列中，并不时吸引一些操作员，左右市场从中牟利。这些操作员通常这样操作以至于只有他们知道价格变化的方向。市场规则规定进入交易的保证金越小，赌客越多。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z）合著的、权威的、详细的美国货币史中，弗里德曼准确描述了20年代在华尔街股票交易所里允许的保证金交易是促使1929年大萧条之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弗里德曼与施瓦茨，1963）。后来，规定变了，取消了股票中的保证金交易。但是近年激增的期货市场具有同样的缺点，仍允许保证金交易。因此，正如H.C. 埃默里（H. C. Emery）在1896年观察到的那样，商品交易也易于被同样的滥用。

从价格波动中迅速获取大额利润的可能性使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投机市场，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市场状况，对价格的变化过程没有自己真正的观点。他们主要依靠机率获得成功。这种投机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赌博。保证金制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邪恶。投机者不必具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采购，他只需交给自己的经纪人5%至10%的资金即可（商品交易所，1896）。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直到19世纪末以前，美国加州、

德克萨斯和 10 个其他中西部和南部的州已经维持严格的法律禁令,禁止以不想交付的商品进行期货交易。但是纽约州在南北战争时期就打破了这一规定,当时棉花价格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对风险同样的厌恶,这种厌恶培育了今天的套购运营及其必要的副产品——投机期货交易。一旦存在投机市场,它们不可避免提供以不择手段的行为将商品囤积居奇的机会,因此那些在牛市上被保证金交易套住的人不得不在价格下跌时巨额亏本抛售,而那些控制供给的人则从中渔利。

近年,最有名的这类例子是亨特兄弟几乎成功地垄断了世界白银市场。迈克尔·莫菲特(Michael Moffitt)所著的关于全球货币体系的书籍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莫菲特,1984,第180~193页)。很明显,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中或高度不稳定的商品市场里,不确定程度越高,对于期货合同及对冲期权的需求越大,投机商以及像亨特兄弟那样的大型操作员利用市场获利的机会就越大。

美国的粮食、大豆、猪胸肉、冻橙汁和 90 种左右的其他商品的市场的某种不稳定无疑是农场主自身广泛参与期货交易的后果,尽管自 1974 年以来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Federal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对此实行了严格的监控。美国农场主和多数欧洲农场主大不一样,他们非常广泛地运用期货市场确保自己免遭价格不好造成的危害。欧洲人并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像美国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欧洲人缺乏复杂性头脑,而是因为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和国民市场管理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价格安全系数。那些攻击共同农业政策的人并不总是理解它给予的保护不仅在于抵御更高效的外

国生产者，而且在于抵御变化无常的世界价格的不稳定。共同农业政策特别保护的两种商品——粮食和糖，其世界价格的变化也最剧烈，并不完全是偶然的。

80年代，商品的期货交易完全被金融期货交易所取代，^①这是金融不确定性增加的直接后果。而且金融期货交易远没有商品期货交易的监控那样严格。60、70年代，发展了外币远期交易（即以协商好的价格在三四个月后进行买卖）和现场交易（即立刻进行的买卖）。但是顾客看来，这些期货市场没有太大的灵活性。买卖合同被捆绑在某一特定的日期并且在特定的出售者和购买者之间进行。1972年美国开始允许金融期货市场更广泛地从事期货交易，并可以对任何关于货币的汇率、政府有价证券和利率的期权或最新发展的在证券交易指数期权（即公司证券或股票普遍的上下浮动）进行交易。^②至于商品期货，合同是为了使很大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固定的交付日期完成，但同时，合同可以在市场上重新交易。伦敦后来遵循美国的榜样，于1982年建立了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这两地的商业增长十分迅速（见图4-1）。1983年，美国国库券期货有

① 伦敦、芝加哥和纽约的记录表明1984年金融期货的合同有5300多万宗，相比之下，能源期货合同为500万宗，而咖啡、可可和糖的期货合同为700万宗（J.爱德华，伦敦商品市场，1985）。

② 金融期货是一种买卖金融手段的承诺，如在某一特定的交付日期以固定的价格买卖债券、货币或一篮子股票。期货是在某一特定的交付日期以固定的价格买卖的一种合同权利——它不必被交割。美国的法规要求支付证券或股票价格的50%，而自1973年以来在芝加哥交易的证券期权可以只支付6%的首付款便可以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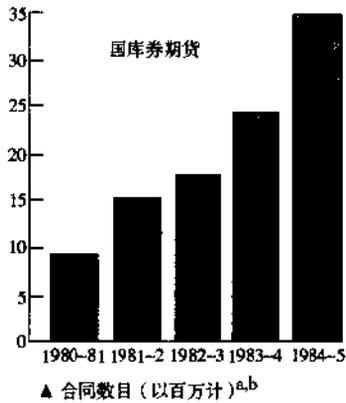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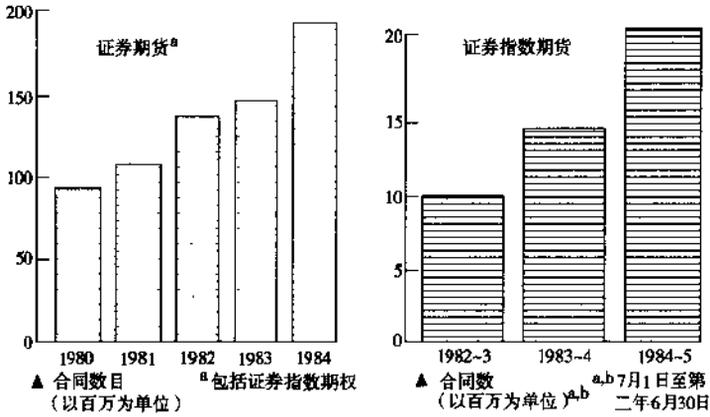


图 4-1 期权和期货交易的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5》

2千万宗合同是在芝加哥市场进行交易的，比上年增加了20%。同年，仅仅在芝加哥和纽约就证券交易期货（即对500强企业的标准股和不利股的价格指数的未来走向下赌注）所订立的合同不低于8亿宗，几乎是1982年的2倍。

对上一次爆炸性扩展做出解释很容易，但是声称金融市场的行为具有理性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一位基金经理或金融主管——无论是来自银行、公司、城市或工会养老基金会——现在很自然因害怕做出投放基金的错误决定而苦恼。他（或她）应投资购买国库券还是金边证券？或投资在企业证券上？以美元还是日元投资？他如何得知？当然错误的决定会使他（或她）遭到嘲笑、批评或甚至更坏的结局。以金融期货套购相对而言容易一些，而且也可以保护经理免遭不可预见的灾难，尽管它也排除了因为做出正确决定可能获得的意外之财。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写到：

所有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基金经理，甚至长期资产的基金经理变得越来越关注短期业绩。结果，在他们承兑汇票的任何时候，他们采纳了赚小利的战略而不是抓住继续成功的机会积累更大的利益。现在购买一持有的政策被明显视为过时了（金融时报）。

然而，造成的后果是证券交易、股票交易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如利率转换、期权和期货率合同（Futures Rate Agreements）的交易发展越来越迅速，甚至在萧条的70年

代中期和 80 年代也不例外。增长速度放慢，工业能力过剩和需求萎缩一直没有停止。如兰伯特所说，所有人都忙于交易或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以快速赚取小额利润。1974 年废除华尔街经纪人的固定佣金率导致商业竞争加剧。普遍的不稳定导致顾客心绪急切。纽约的股票交易 10 年内增加了 5 倍，技术也助了一臂之力。过去技术限制华尔街每日的股票交易最多为 2000 万宗。现在，它可以允许成交的合同量多达 2 亿宗。而且，今后所有金融交易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中心”，而是以金融期货、政府证券和股票形式存在的普遍的全球统一市场，这一个时刻正在迅速逼近。金融期货市场已经相互联接，因此通过卫星和电脑就可以使交易不分昼夜 24 小时进行。阿姆斯特丹期权交易所和蒙特利尔、温哥华和悉尼的交易所连在一起。芝加哥和新加坡、纽约和悉尼连系起来组成金融期货的统一市场。操作员将规章制度远远甩在后面以至于这种全球金融赌场可以永不停息地运转，只受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规则的制约，而几乎不受经营措施的限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近年的市场经济学家以隐晦的理论观点仓促为这些激增的期货市场辩护，他们提出期货市场的功能在于确保实行“市场清算”，作为使体系更高效运行的重大促进因素。隐含之意是在有如此多的期货市场以前，体系没有现在有效率。但是只有在谈及“效率”时根本不考虑生产和发行上的价格波动的风险或外来后果时，他们的观点才站住脚。因为历史已表明自从期货交易广泛普及后，价格实际上已变得更动荡，这种动荡导致了更多的浪费。不仅必须考虑维持市场及已有的经营者的间接费用，而且生产部门的劳

动和管理的调整费用由于被夸大，也存在着浪费。

市场经济学家也容易做出令人十分怀疑的声称，即期货市场对所有可能在商业行为中遭受不确定困扰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同的便利，因为需要信息的所有人都同样可能容易地获得信息。这种声称非常不现实。英国在向贫穷的上诉人提供国家法律帮助之前，关于英国法院也有相同的说法，这种说法当时遭到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反讽：“啊！确实，就像豪华旅馆一样，对富人和穷人同样开放。”因为很明显，在一个由观点而不是供需客观变化左右的市场上，任何可以很容易获得经营者观点的人将获得更好的信息——这些人肯定是其他经营者。流言、谣传和假信息左右这些市场，那些最先听到最新低语的人或当今盯电脑屏幕最紧的人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占有优势，而那些最后听到或最后看到信息的人则处于劣势。

这是 80 年以前弗兰克·奈特认可的另一观点。他预见到不确定性和对信息与忠告的需求之间的密切联系，但他没有预见到的是通讯技术的最新进步导致了兜售信息的机会剧增。这使信息供给的增长变得很容易与在金融持续不确定的情形下对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相适应。例如，商品市场中的金融不确定性和动荡的价格导致对期货和期权的需求大大增加，以作为套购的措施，因此商品的交易和经纪业务也相应增加。

为那些可以支付昂贵使用费的人服务的信息系统迅速增加，可以从这一点上明显看出膨胀的迹象。如最近出版的一个商品期货交易指南中列出了不少于 27 种电缆服务，数据库和在线电脑服务，几乎所有商品都比较新，而

且大多数服务利用电脑和卫星来储存、检索，并且将最新市场信息向全球范围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终端传送（尼古拉斯，1985）。同样的出版物以印刷品或在线形式（on-line）列出了不少于68种关于商品交易的业务通讯。订阅5种主要金属的市场服务报告季刊每年的平均费用高达7400美元，而订阅每季出版一次的有关40种商品的价格趋势表平均费用可低至5美元。

同样，信息系统竞争的激增也可以从银行借款和货币交易中看出来。政策风险分析在预测重大事件如发展中国家发生革命、军事接管和其他政变时记录不佳，但是这种状况恰好促使顾客要求更多更复杂的即时信息。

这种巨大信息体系不菲的花销必须由某人来支付。在第一个例子里，经纪人、银行和公司的财务部门会购买数据库和业务通讯。但是这反过来将增加他们的管理费用，因此最终支付账单的是股东、顾客和消费者。

讨论的也不仅仅是费用问题。正是商业和金融媒体中的一些有经验的观察者认为这些过度增长的期货市场本身增加了体系的不稳定。例如，尼古拉斯·科尔切斯特（Nicholas Colchester）评论道：

今天的即时信息市场和即时交易市场运转起来就像一个缺少摩擦和减幅的机械系统。在每一个市场中，重砝码（投机资本）由弱弹簧（供求的基本规律）来连接，整个颤动的牛奶冻容易遭受呈现的事件的影响（科尔切斯特，1983）。

我们只能猜测信息对实际经济、生产、贸易和就业的影响。很明显，尽管公司的财务经理在暗处工作，但是他们已经变得比工程师和人事经理重要多了。更多人乐于向银行家寻求建议而不是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寻求建议。那些可以经常运用这些金融套购措施的大型国际公司与小型国内企业相比占有更大优势。

最近的一些调查也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近年来这样一种研究是在英国北美委员会（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uncil）的赞助下进行的，具体研究浮动或弹性汇率对大公司的商业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布林等，1981）。依靠调查问卷以及采访，调查人员从英国、美国、加拿大公司广泛取样收集的数据中得出结论，认为较大的公司实际上可以使自身相对不易遭受汇兑风险的影响。但是只有通过分配更多的管理人力资源到金融管理上，通过特别努力使不同种类的外汇进出相匹配，并且当风险不能在企业内部得到控制时通过求助于期货市场，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不幸的是（也许无法避免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对企业经营增加的额外间接费用做出整体估计，更没有对大企业因此比小企业享有的优势做出量化评定。后者不太可能找到能够抽出时间仅仅专攻纯粹的金融决策的经理。它们也将发现更难使外汇收入和花费持平，或以主要贸易货币保持储备或求助于期货市场的套购措施。

国际事物皇家研究所在另一个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大型国际企业不易遭受金融不确定的影响（金，1982）。隐含的意思又是大企业可以（以一定的代价）管理不确定。但是日益增加的风险和/或费用使小企业在与大企

业竞争时，实际财富的生产者与金融经营者相比时，均处于不利地位。

结 论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中货币金融结构里的变量数目倍增，看来弗兰克·奈特所谓的不确定，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大规模增加。这通常是因为主要金融当局，尤其是美国当局，做出的某些具体的政治决策或非决策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后果。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对风险厌恶做出反应的恶性循环，反过来又增加了变量的进一步变化无常，结果增加了通常意义上的混乱并且动摇了对全球金融体系长期可行性的信心。随着人力和其他资源转向赌博和投机或者转向自我保护，对社会的信任和信心进一步遭到破坏。因此，像期货市场这些措施——为对付不确定而发展的——不仅远远没能通过降低体系的波动性从而稳定体系，反而实际上扩大了体系的不稳定性，并使不稳定性持续存在。

第5章 竞猜游戏

无知什么时候事关重大？当谈到组织一个有效率、稳定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时，上述问题非常重要。

因此，无知的整个观念值得我们思索片刻。无知不止一种。例如，有不可避免的无知，即所有我们无法知道（如我们离开人世的时日）并且因此无法采取行动的所有事情；也有无关紧要的无知，即所有我们不知晓、不需要知晓甚至没有兴趣知晓的诸多事情。我们目前关心的是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大片模糊的、没有明确界定的领域。在那里有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但却知道的所有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叫作重大无知的领域。

处于此领域中的事物完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事物。例如，如果你打算下班后开车回家，那么对你而言，有关汽车或火车的时刻表的信息不在此领域之中。但是如果你打算乘坐火车，却不知道时刻表上说你想乘坐的那列火车今天不运行，那么时刻表对你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对你来说，它处于重大无知的领域里。政府事务也一样。统治者和当局需要知晓的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取决于它们所处的自然、政治或经济环境，以及它们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不同的情形将承担不同的风险，为防御这些风险，需要不同的知识。以往没有人口普查，没有关于国民经济或与世

界其他地区的支付平衡的详细统计，政府照样运转得很好。而现在所有这些事情均被视为现代好政府的根本。然而，在混乱的货币体系中的问题是，是否具有过去不是而现在却处于国民政府重大无知领域中的其他事情。

假定这是事实的话，它可能是因为技术变化、市场性质发生变化、政府决策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家们对究竟是否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很有可能持完全不同的意见。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未来管理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欧洲货币市场是否有创造信用的独立能力，并因而可以通过影响全球货币供应影响通货膨胀；第二，资金周转率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银行转账技术进步的结果。

欧洲市场是否具有通货膨胀性？

欧洲货币市场里信用创造具有通货膨胀的性质是引起经济学家们普遍探究讨论的话题。多年以前，针对互相冲突的观点进行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综合调查表明，对这个问题至少有4个主要学派。所有学派都根据一些非常不稳定的假设和一个十分可疑的观念得出它们的结论。这个观念就是可以发现一个“乘数”，即为了找出货币供应总量，必须与货币基数相乘的一个数字。在所有论述中都可以发现乘数的观念非常突出。它假定惟一的变量是银行存款总额和货币基数；其他的因素包括汇率、利率、兑换控制、政府债务等都是固定不变的。然而，这种观念是将一个封闭、严格管制的体系里的国内信用创立的分析程序同等用于欧

洲银行业。

“多级银行业”（multi-stage banking）模式打了一个与上面不同但却同样不适宜的比方，它将欧洲银行或离岸分行和国内银行的关系比作美国银行系统中“城市”银行和“国家”银行之间的关系。因此它设想具有各种各样的固定比率（如存款与储备的比率），这些比率实际上根本不适用于欧洲货币业务。结果，它自满地得出欧洲市场不能增加美国经济中信用量的结论。（由于如此多的论述是关于美国的，下面确实是一个主要问题：与其说是欧洲银行业对整个世界的影晌，不如说是欧洲银行业对美国的影响！）这个结论令人吃惊。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和联邦储备委员会 1981 年的数字表明，美国居民当年从欧洲银行贷款增加的数额比他们的储蓄增加额多 236 亿美元。同年，美国企业在欧洲证券市场举债 200 亿美元——但是到底有多少在美国消费无法知晓。很明显，事实表明美国经济中可能的信用量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货币交易的影响。

“初始存款”（initial deposit）这种方式更不可思议。它假定欧洲市场存在于真空中，因此欧洲银行业一定始于一种来源不定的初始存款，并且继续存在于无法说明的孤立状态中，远离国民银行和信用系统。

斯沃博达（Swoboda）明显偏向于他所谓的“世界货币存量”（world money stock）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是在 70 年代早期发展起来（部分是由他自己发展的），很明显它仍然是根据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固定汇率和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及通货紧缩率作出的假设。尽管这种途径十分蹩脚，但是斯沃博达仍声称这个模式是 4 个中最实际的一个。

这种方式确实得出了一些实际上与现实世界的经历相符合的普遍结论。一个结论是，欧洲银行业在运用高能货币^①（high-powered money）方面很“节约”，并且因而促使世界货币供应量扩大到高于即便欧洲货币业务从未被创造出来的情况下的货币供应水平，原因是欧洲银行业贷款实践不必遵守对国民银行储备限制的要求。它也发现由于欧洲货币市场方便金融资产和债务在不同的货币之间转换，这也易于导致世界货币供应量增大，并且使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这种不平衡对美国管理货币的影响相对小一些，而欧洲国家则遭受到很大影响。^②

斯沃博达说，甚至这一个学派也会同意其他学派的说法，即“不受控制”的信用创造并没有发生在欧洲市场。这种令人安慰的结论可能会在大家一致认可的假设中找到支持，即世界货币存量受国家中央银行的国内资产、黄金储备、外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的总量的制约，因此推断它一定没有失去控制。然而，事实上特别提款权的世界储备从1970年的920亿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3100亿美元；这些储备中从欧洲银行系统借出的资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根据部分黄金储备和其他可转换资产增加配额与提款权（即信用

① 高能货币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创造出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决定货币供应的货币基础，不论如何计算，参看《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第55页）。

②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近年来，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美国当局容易遭受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及美国居民的借贷款或以欧洲货币进行的借贷的剧烈变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滞后，这种滞后致使货币管理只是一种臆测。

创造)。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资产”和储备——自然占全球总额绝大部分——与其他国家十分不同。美国不像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持有美元储备；70年代国内资产（即政府有价证券）增长总额中，大约有60%是由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购买的。而且，官方持有的美国政府有价证券的数量每年变化幅度很大，根据其他国家政府为了防止美元贬值和/或升值以保护自己货币的需要来决定。

而且，探讨这个问题的所有途径都有一个奇怪的疏漏，即银行间市场的程度和影响，在任何年度它们通常约占欧洲货币交易的40%，尽管（如国际清算银行自愿承认的那样）不太可能精确地从总贷款中区分出银行间存款得出对净交易额的估计。毫不奇怪，最近马尔切洛·德·切科（Marcello de Cecco）对事态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正确地持有更大怀疑态度——得出结论：没有人确切知道欧洲美元市场给任何国民货币供应量（更不用说全球货币供应量了）增加了多少；考虑到每个国家对乘数的假设有差异，因此针对任何断定欧洲市场不具通货膨胀性或由此对通货膨胀情形如何进行估计的断言应该培养一种“健康的不恭敬”，这是明智的（德·切科，1982）。总而言之，欧洲银行业的信用创造并不是简单地被误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实际上属于无知的领域，属于我们没有正确知晓事物的范围（斯佩罗，1980；康韦尔，1983）。

资金周转率

可以回忆一下，第二个不确定的问题是资金周转率是否恒定不变（这也与刚才讨论的欧洲市场的信用创造问题

有关，但是由于它也影响国民体系之间以及国民体系之中的货币管理，因此更为重要），如果它被误解了，那么部分原因是对于货币理论的关注一直是指向价格、货币基数和货币供应，而对经典方程式 $MV = PT$ 的其他因素关注很少；还有部分原因是它遭受到非常迅速的技术变化的影响。

银行业中的技术变化，尤其是电脑的广泛运用，造成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尽可能简单地说，一些相关的事实是：1981年美国每年通过开支票流通的货币额达15万亿美元，约75亿美元定单通过Fedwire体系流动（Fedwire体系于1973年首次引入银行业，后来得到很大改善）。这些资金被称做当日资金（Same Day Funds）。另有165万亿美元通过纽约清算银行行间支付系统（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s）转账（迈耶，1982）。其中包括欧洲货币交易，但没有人知道数额究竟有多大。这些转账过去被称作隔日资金（Next Day Funds）。但是1982年10月，当日资金和隔日资金被“合并”，现在两者均通过清算银行行间支付系统来清算。当它们流通时，没有人能够分清谁是谁。银行广泛运用公共或私有的电脑网络很快加速了货币交易周转率（即货币转手的速度）。它也更有可能影响更重要的收入转账率（即信用用于购物的速度）。萧条时，人们推迟消费或支付账单，收入周转率下降。但同时，如果信用日益取代现金用于购物，资金由银行通过清算银行行间支付系统，或企业和个人通过自动转账系统进行电子转账，这时收入周转率便有可能上升。

在我看来，我们就像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不得不计算将热水龙头打开，冷水龙头半开，并且拔掉塞子时灌满

浴缸需多长时间。然而在这种情形里，人们只能对任何特定时刻的交易周转率和收入周转率里发生的变化进行猜测。这是另一种真正扩大重大无知领域的误解。

上述技术变化对弗里德曼高能货币的观点明显有影响，尽管无法清楚知道是什么影响。马丁·迈耶（Martin Mayer）讥讽地将此定义为银行无法在每日停业前从债务中拿出的、联储要求银行业作为储备的“银行的那一部分”资金的要求（迈耶，1982）。1980年实施的《存款机构放宽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也具有类似的影响。大家指望美国这条法律允许美国银行储备从1981年的400亿美元（如果扣除放在银行金库中的120亿美元储备则为280亿美元）下降到1986年的150亿美元。但是没有人知道，储备下降速度有多快，那未知的数额对周转率和高能货币这一概念的影响，并因此对政府控制货币供应能力的影响。毫不奇怪，英国人已放弃了猜测，而美国人仍在回避这个问题。

欧洲货币市场创造信用的能力和货币流通周转率借助于技术进步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这意味着重大无知的领域的界限仍可以置疑和讨论。而且，目前的一些误解划定的这些界限也可能比应该划定的更窄。

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过多地花费精力，因为它与体系中认可的更大的无知领域相比，也许没有那么重要。而且必须指出，结果证明这样一些误解非常危险。一种误解是国际贷款比国内贷款的风险明显小得多，这种观点10多年前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很流行。1975年，一位名叫拉克德施尔（Ruckdeschel）的经济学家从一些大银行取样，将得出

的向国内放款丧失或延期未付的数额和向国外放款的数据进行比较，他发现进行国内放款风险更大。他也发现，美国银行使它们的业务多样化，结果证明当时只有3家进行国外放款的银行风险比国内放款大，并且它们可以将它们国外贷款的损失率减少20%。他由此得出结论，“主张国际或欧洲货币放款业务比国内放款风险更大收益更小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拉克德施尔，1975）。5年后，就在债务危机的前夕，银行数据所讲述的仍然是同样一个十分可疑的故事。但是所有历史经历展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

然而直到1977年，州长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仍然在向众议院证明，美国最大的7家银行在1971~1975年4年中在向国外放款中损失的数额与它们的有价证券总额的比例只有国内放款损失比例的1/3。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发现对国外放款采取这样一种短视的观点十分危险。讲述19世纪欠债的一个小复习课程，本应很快将纠正这种误解，不幸的是，美国体制中的法律条文使情形变得更糟。法律规定贷款合同应有一个交叉违约条款，规定拖欠一种债务的借款人被视为拖欠了所有债务。部分由于这种原因，美国银行的许多国外坏债长时间被重新归类为“没有履行的债务”。而且，银行不愿意向股票市场公布自己的错误，除非不得已。然而，多数美国主要银行1983年在显示对股东风险的穆迪指数上丧失了3A的评级，这引起了对美国银行日益恶化的债务资产比率状况不太受欢迎的关注。要不是巴西事件，美国银行1982年的记录毫无疑问将与以往的数据十分令人宽慰地表明的“趋势”相去甚远。

无知的领域

近年发生的快速变化打开了一些有关更重要问题的更广泛的无知领域，这些问题是关于市场运行状况以及政府实施的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杠杆是否真的有效。

有多大必要了解金融体系中的市场运行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制系统。保持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严格限制金融机构主动创造信用的行动自由。例如，在东欧，政府不必被告知银行的行动，因为是政府而不是银行做出有关投资以及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和费用的重大决定。市场的作用很小；获取信用的途径得到严格、直接的控制。个人服务行业的边缘市场，如理发或像蔬菜等易腐烂商品中发生的行为根本不会扰乱五年计划。只有当计划经济通过大规模举债深陷于市场体系中（如波兰从西方银行借了巨额债务，因而卷入市场经济中），这时政府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无常的信息才显得非常重要。接着，政府不得不扩展自己的控制网络，以确保其兑换控制不能被规避，而且只有那些获得政府许可的人才可以获得信息并因此在生产结构中扮演一种半独立的角色。

另外一种体制是对国民金融机构可以涉足外来业务的种类制定非常严格的规则，一旦发现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则实施非常严厉的个人性的惩罚。例如，瑞士规定国民银行可以吸收外币存款，但同时严格限制设立相应对外存款并将对等数额的瑞士法郎计入存款人账户的贷方。只要这条规定得到遵守，代表国家的国民中央银行不必要知道谁是存款人，他们如何获得的资金，或瑞士银行如何将存款

的对等基金进行投资。银行家很清楚违反瑞士银行法的任何行为将遭到迅速、严厉的惩罚，并且有责任的银行官员被视为负有个人责任，有可能被送进监狱拘禁。^①

英国体系

英国体系也强调个人责任，但是它是通过间接实施的，它首先迫使金融市场经营者的功能实行法定分离，然后依赖一种通过每一个团体自己选出的行会实施自制自律的间接控制系统。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委员会是执行权威，而经纪人买卖股票和股票交易人发行股票在功能上是分离的。在保险市场，劳埃德保险社是权威机构，它对风险的承保功能和保险经纪业功能是分离的。同样地，在非金融行业，外科医师和内科医师也是分开的，他们分别由资深开业医师组成的自己的“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来进行管理；在法律行业，诉状律师和出庭律师是分开的，分别受律师公会（Law Society）和律师委员会（Bar Council）的管理。每一个事例中，目的都是为了排除在市场上为自身利益而非顾客的利益采取行动的动机，因此市场会尽可能对行业服务的最终消费者的需要作出反应，而不是对专业人员的自身利益作出反应。如果没有这些分离，体系认为开业人员容易滥用他们的权力，这种假设不是没有道理的。与之相对应，美国律师在上诉中的自身利益导致了洪水般的针对制造商的“产品责任”案件。由于法官判定上

^① 《十亿美元的谋杀》（*The Billion Dollar Killing*）的作者保罗·厄尔德曼（Paul Erdman）和其他一些恐怖小说的作者实际上遭到了监禁。

诉人获得赔偿时，律师被允许可以收取赔偿额的一部分，因此毫不奇怪，现在的制造商（如医生）不得不大量投保以防止出现风险。

英国人也将功能分离的原则用于它们的金融机构中。合资银行、商业银行或“主要街道”的银行按以往的规定不允许将存款人的钱放款到国外；小公司的受托人或房地产的经理也不允许将存款人的钱放款到国外。海外银行属于另一个分支。处理短期信用市场各种票据和到期票据的承兑行也属于单独一类公司，它们由于更容易受市场突变的影响，因此英格兰银行对它们提供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帮助。然而，支持仅限于针对有效担保债务，并且是“有偿的”（即高利率）。

在这样一种体系下，英格兰银行没有必要经常监控不同机构的所有活动。它可以将执行纪律的行动交给自治的自律委员会，它们在果敢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权力与特权并被认为在惩罚那些违反行业规定的人时具有很强的集体利益。经常有医生被除名；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证券经纪人被宣布无力偿债，从此再也不能重操旧业。只要专业人员在国家部门就业受到限制，政府参与市场受到限制，体系就运转得相对通畅，经济和货币管理当局只需监控国内和纽约的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欧洲的主要金融中心的趋势即可。它不需要关于每一个银行每日操作的详细、及时到每分钟的信息，中央银行对经营者的最轻微的暗示或推动都导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反应。然而，要使这样一种体系安全可靠地运转，银行圈子必须很小，而且依靠各自的功能和社会关系与中央银行紧密联系在一起。

个人的责任必须清楚，毫不含糊。当局必须不偏不倚，并且对体系中的任何个体银行或银行家的命运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一旦伦敦商业城的大门向经营外币的外国银行敞开，并在地毯上写上“欢迎”二字后，这种货币监管和控制的体系也许便注定要衰亡。它的没落用了大约 20 多年的时间，现在已基本成定局。伦敦商业城中一些最有影响的经营者的宗主国不是英国，因而英格兰银行不能将这种体系运用到这些经营者身上；证券市场的经营者如果想与美国和日本的大型投资公司竞争，不可能继续保持功能分离。由此产生了古迪森 - 帕金森协定 (Goodison - Parkinson)，它于 1983 年由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所长和英国的商务大臣谈判签署。根据这个协定，政府同意不因证券交易所保持固定价格向垄断委员会 (Monopoly Commission) 提起诉讼，作为回报，证券交易所同意接受类似美国模式下的新法规。

美国体系

然而，麻烦在于对英国体系的侵蚀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体系自身也是另一个金融管制体系遭到侵蚀后的残骸。那个体系过去与英国体系有某些相同特征，50 年以前它看来更适应一个广阔的跨越大洲的一个大国，那里管制权力散布在联邦体系中，从中央政府到各个州。因此，小储户和存款者受到联邦法律保护，联邦法律对储蓄银行和贷款协会或储蓄和贷款协会给予特别支持（以规定具体的限制为代价），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一个联邦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operation) 保证在银

行失败时对高达1万美元（现已提至10万美元）的存款进行担保。同时依据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不允许商业银行跨越州界营业，因此，设在旧金山的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可以在加州营业，但不能在纽约经营。相反，大通曼哈顿银行不能在加州营业，而大陆伊利诺斯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则被限制在州内。这样做的意图是防止金融权力过分集中，同时将监控和约束的责任留给地方当局，因为地方当局比遥远的联邦机构更有可能知道事情何时出现了差错。自1913年来，主要银行由于参加联邦储蓄体系而安全得到保障，参加联储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自愿的，但是联储体系使那些参加的成员在需要时能获得及时、大量的流动资金。

至于何种因素在导致体系变化时最重要，观点有些不一致，但是多数人同意有几种促进因素，它们的共同作用不仅损害了控制的有效性而且在需要支持时损害了其适宜性。一种因素是：尽管银行被限制在州内营业，但是养活主要金融中心的顾客或存款者却不受此限制。那些作为投资行发迹的企业如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一类的非银行也不受限制，并且旅游代理商如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或甚至像西尔斯公司这样的邮购零售商也不受限制。近年与这些公司的竞争促使银行施加压力，支持放宽管制，这样它们才可以同新来者在更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而且，美国当局随意许可企业和银行在海外的经营不受限制，看来不让后者在美国国内跨州界经营，这种做法已经落伍了。技术的发展也迅速打破这种体系。当法庭裁定电脑跨州自动计入借方账户是合法的，禁止以老式

的支票进行同样的业务就不再符合逻辑。甚至和战后一样，最近，尽管地方证券市场和交易所十分重要，但是现在4个也许5个主要中心比其他金融中心更重要；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达拉斯和亚特兰大相比，其他任何金融中心的投资基金或投机资金都显得微不足道。依赖联邦控制体系不再符合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

因此这里的论点是：第一，正是美国体系在过去的25年里主导了国际银行业的发展；第二，美国当局不了解的重大无知领域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经济控制体系通过各种解除管制措施越来越放松其规定。它也允许银行必要时依赖当局来削弱管制，但至少对一些最大银行的依赖，破坏了体系充当看家狗角色时，应对任何个体机构的命运持有的必要的公正和冷漠。

哈耶克、凯恩斯和西梅尔

另一种由哈耶克教授提出的主张是：体系已变得如此难以控制，因此我们应该放弃这种努力。他认为，相信政府仍控制着货币供应或甚至政府希望控制货币供应的这种幻觉十分危险。它培育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同时使政府仍经不住诱惑，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政府总是经不住诱惑欺骗人民，因此导致了“在私人的命运里引起了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变革，比巨大的公共灾难可能导致的变革还要大还要普及”。哈耶克的解决方法是货币应受到市场的约束，和市场上的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任何人应该可以自由地买卖货币。但是哈耶克的办法在政治上太幼稚。实际上，考虑到某些假设，不论这种办法从逻辑上说多么有说服力，

结果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怎么处理已存在的以特定货币执行的合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以任何货币支付税收吗？我们不得不在每次买卖商品或服务时谈判以何种货币支付吗？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国家甚至会享用这样一种非政治的体系，或者商业可以在这样一种金融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运行，这样一种观点完全是荒唐的。它基于两种根本错误的假设：第一，货币与政治和政府无关；第二，对货币的信心不需要通过时间来建立。然而，历史的经验教训确实表明政府经常滥用因控制货币而被授予的权力，同时，只有通过政府的作用经济体系才享有所有健全的货币和管制良好的体系能赋予的所有利益。

这种论点促使我阐述为什么在目前无知领域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原因。具有健全的货币和管制良好的金融机构的经济体系无疑创造财富，但是也可能创造两种东西对社会具有毁灭作用，即在经济周期低谷期的萧条，以及在分配由一种更有效的经济交换体系创造的新财富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差异。正是在英国这两个方面变得非常明显的时期，凯恩斯意识到这些趋势并导致了他对体系以这种周期方式运行的原因提出一种非常智慧的解释，并且提出一种纠正体系缺陷的办法。凯恩斯对《通论》（*General Theory*）进行非常严苛的解释，他辩论说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既不均衡也没有效率；即是说，它可能经历衰退和萧条，并且也不总是在生产中保持足够的实际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通过纯粹的货币政策将资本主义体系从自身内在的缺点中拯救出来。尽管政府有权力控制利率，并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起到减速或加速的作用，但是

终究不能起实质性作用。因为政治上可行的任何变化绝不可能大到足以抵消在一种情况下乐观的投资者的热情，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悲观的投资者的徘徊和犹豫。因为当处于萧条时，投资不足（因此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就业不足）不能以储蓄不足来解释，相反，资本家和靠股息生活的人实际上储蓄太多以至不能使水泵起动，因而不能启动著名的乘数以恢复体系的经济活力。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中的其他人更少用于消费、更多用于投资。

医治困扰现代世界经济生活中的危机的惟一激进药方是不允许个人享有选择消费自己的收入或订购特定的资本资产的生产的自由，尽管他根据不确定的依据认为这种生产是向他开放的最有希望的投资（凯恩斯，1936，第160页）。

在一种专制制度下，可以通过发布命令非常容易、全面地做到这一点，而工人却无法反抗。而在一个工资必须议定的自由社会里，不能通过发布命令，但国家却可以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欺骗工人并利用他们的“货币幻觉”使这种欺骗不会被及时揭穿而实现目标。

凯恩斯思想的逻辑从一开始便产生了巨大、广泛的共鸣。这可以理解，尤其对那些一直试图从逻辑上思考弄明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或学经济学的学生。因此可以用来反对这个论点的两种反对意见不是针对其逻辑而是针对逻辑所依存的基本假设，一个是道德假设，另一个是实践性假设。

S. H. 弗兰克尔 (S. H. Frankel) 在其著作《金钱：两种哲学》(*Money: Two Philosophies*) 中详细阐述了基于道德层面的反对观点。在此书中，他把凯恩斯将货币视为政治工具（即为了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政府可以操纵货币）的观点和前面提到的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进行了一番对比。弗兰克尔提出西梅尔正确地看到了管理货币并不是政府的技术方面的特性，即与其他政治在某种程度互相分离的方面，相反，他认为管理货币是整个社会哲学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在西梅尔冗长而芜杂的作品中找出的隐含意思是，如果你损害或削弱了人们对货币最基本的信任，此货币可能仍将作为交换工具和价值存量起作用。但是你将同时冒着削弱或损害对权威、对社会机构以及对将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基本关系的信任的风险。

弗兰克尔说，西梅尔甚至对当时十分稳定的货币体系感到悲观有两个深刻的原因。第一，他不相信人们会无限地接受日益增加的抽象思维方式，而这些抽象思维方式是复杂性日益增加的货币体系所要求的。第二，他担心有关货币无限制权力的严重误解会日益累积，这些误解将最终毁灭一个自由的货币秩序。弗兰克尔作为一名十分保守的保守主义者，和哈耶克一样，他对人类事务中的理性力量极端不信任，当时一些人坚信可以通过使用更多货币使问题得以解决，他认为这种观点与认为通过更多研究和学习可以解决其他问题的看法类似。相反，凯恩斯从根本上来讲是乐观的，作为一名保守型学者，他相信知识可以战胜资本家的谨慎和对风险的厌恶。这就是他鼓吹实施欺骗的原因：“经济舞台上的演员的动机和行为将因简单地偏转金钱

之镜而受影响，并因而可能引导这些演员只认识到被扭曲的现实的幻象”（弗兰克尔 1977，第 72 页；他加的黑体）。

根据弗兰克尔的观点，尽管凯恩斯并没有使用“道德”这个字眼，尽管他以作为一名进取的、思想自由并且彻底的现代人而自豪，但是弗兰克尔提出，凯恩斯的论点可以依据凯恩斯对爱好金钱以及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颂扬的物质价值明确的、根本上的卫道士般的否定中预测出来。无论是因为心照不宣的道德原因或仅仅因为知识分子对那些有钱消费的人的一种清高，凯恩斯随心所欲地使用轻蔑的语言描写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家。凯恩斯的一些同代人（最有名的如：西德尼·比阿特丽斯·韦布和萧伯纳）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成就和诱惑力抱有天真的幻想，但是凯恩斯从来就与他们不同，他认为惟一的严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补救现存制度的缺陷。也许凯恩斯在运用欺骗纠正一种制度的缺点这一点上发现了一种粗糙的具有讥讽意味的公正，这种制度本身宣扬关于市场公正、机会公开、利益和谐等许多半真理（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话）。无论如何，弗兰克尔辩论说，凯恩斯确切知道他鼓吹的是什么，但他却愤世嫉俗地相信只要目标是正义的，任何手段都合乎道义。

凯恩斯也相信：他理解体系的运行；并且政府有足够的信息，可以用扳手和螺丝刀来管理这台复杂的机器的各个运转零件的需求，以达到使整个引擎和谐地运转。我认为，正是这一点假设在 80 年代看来甚至比 30 年代更令人怀疑。我们不必全程追随西梅尔便可以看到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不大可能起作用，如果那些使体系运行的人实际上不

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信息，而且不能确信他们的干预将产生预期结果的话。因此，如果我们要对管理体系的可能性保持乐观态度，不论是信奉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我们必须确信，规定足够严厉并且对破坏规定时涉及的所有人的惩罚足够严厉以保持体系顺利运行并维护对体系的社会信任；或者管制和根据情况进行的干预共同作用能达到这一点。正如每个人现在意识到的那样，由于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际银行和信用结构，所需的信息将是关于它们自己国家内部以及自己国家以外的信用创造机构的操作——至少需要最重要的国家里有关这些机构的信息。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我们收集到的国际统计数据足够好吗？关于不同国民体系之间货币流量的信息中存在严重差距吗？这些流量对国内货币供应有何影响？不同国家的货币管理当局之间的界限分得足够清晰吗？在对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实施权威的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了任何日益扩大的鸿沟或漏洞以至于可以规避管理吗？

我们知道什么？

至于信息的适宜性，第一步可以看看由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出版的统计手册，它集合了由国际组织编纂的关于国家外债的信息。这给出了所有的主要统计丛书的基本来源的一幅整体图画，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及研究院）在追踪国际信用的创造和国际信用的流动中的变化时依赖这些统计数据。

对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地区和某些国外金融中心运

营的银行的外在债权（贷款）和债务（借款），国际清算银行自身负责做出最佳猜测。“报告地区”包括14个工业国家。它们由最初的十国集团^①加上瑞士、奥地利、丹麦和爱尔兰组成。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挪威、芬兰、南韩、台湾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更不用提整个拉丁美洲、非洲的其余地区、以及中东和东亚了。手册还包括在香港地区、新加坡、巴拿马、巴哈马和开曼群岛的美国银行的外在债权和债务。结果证明数据一点都不完全，尽管它们可能涵盖面很广，足以在里面显示任何总体趋势。它们每季度出版一次，因此它们确实显示了变化率的大体趋势（如《国际银行法案》颁布后不久，银行交易从加勒比的避税地转回到纽约）。

国际清算银行的其他一些统计出版物从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收集的数据，涉及面就更宽泛一些。例如，依据国别显示未偿付的或已承担的银行贷款的期限表包括由外国银行在黎巴嫩、利比亚、巴林、巴巴多斯以及加勒比的一些小型中心订立合约进行的贷款。

国际清算银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类信息的来源地，它们是来自报告地区关于欧洲货币贷款、存款来源以及贷款的货币面值的信息。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关于国外银行借款、发行外国债券、国际银行贷款的期限和利差等绝大多数统计数字来自国际清算银行。另外，

^① 十国集团是给予《借款总安排》（1962）条约签字国的名称。它们是美国、加拿大、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典。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一直出版一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流量的图表，被广泛运用和引用。然而，这容易夸大北—南的金融流量，因为它没有将南—北的利润、红利和各种形式的金融费用的回流计算在内。而且，它给出的关于投资的信息通常来说太概括。事实上，由国际机构搜集的统计数据而那些由它们的成员国搜集和出版的数据差不多，除了美国（在像投资这类事务上还包括英国在内）以外，多数国家认为没有必要要求银行和其他私人公司公布关于它们的国外金融交易的必要信息。

因此毫不奇怪国际清算银行的手册遗憾地得出结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有关未偿付的外债量的全部信息”（第 96 页）。

具体地说，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表明：尽管世界银行的债务报告系统搜集关于政府借款以及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企业进行主要国外借款的数据，但是这种数据并没有包括由个人或公司向国外的借款人出借的长期欠债，**如果这种债务政府没有提供担保**。个人借款也许在统计上并不重要，但是公司借款当然很重要。然而，没有综合的数字显示公司借款是上升还是下降了。

而且，已经指出不可能对国外直接投资进行全面监控，即使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不知道日益增加的合资生产安排的数目，外国合伙人在合资生产中提供诸如技术、资本配制和管理市场的核心技术，作为回报最终（5 年或 10 年以后）对生产进行分成。资本货物在国家贸易收支平衡的进口方面显示，最终的出口在出口方面显示，但是涉及到的财务方面不必在任何地方显示。这种安排在欧洲东

一西部交易中变得十分普遍，现在在第三世界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不断重新迁置生产地，想从廉价劳动力或低税收中获利，或获得永久进入欠发达国家的市场的途径。而且并不仅仅是重新安置生产部门。正如公司间贸易在所有国际贸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不同国家从25%到约35%不等，因此公司间货币转账同样日益增长，但是只有它们通过银行体系或至少通过银行体系的某些可见部门时统计上才显示这些转账。

在监控欠发达国家的长期债务中，一个非常大的盲点与外国人持有破产公司的股份有关，就像1983年发生在智利的弗门托（Fomento）银行中的情形一样。几家外国银行受到政体改变以及据称与美元挂钩的货币的鼓励，购买了智利银行和其他企业中一定的股份。但是所有发展中国家80年代的情形普遍恶化，使许多这样的银行和企业处于危险之中，国外股东，尤其是银行，容易利用它们的政治优势要求收回投资（如智利的情形）。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可知，被排除在官方数据以外的还包括大量短期债务。统计数字显示了国内银行从国外银行的借款情况。但是它们并没有显示从非银行获得的信贷；例如，短期贸易信贷，无论提供者是外国政府或国有企业还是外国供应者。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看起来可能会陷入金融困境时，银行往往对进口商提出的金融保险的请求不予理睬，因此，只能推测它们的第一反应是到别处去寻求信贷，但是究竟它们是否成功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它们的外国债权人（包括它们的银行）并不知道这些进口商陷入其他人的债务有多深，因此，到期他们能被支付

款项的机率有多大（斯图尔特，1995）。

更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每一个主要工业国已做出自己的安排，为自己的出口商提供被保险信贷（Insured Credit），通常以受补贴的利率被保险，但是全国出口信贷机构并没有将每一个出口商向某个国家增加的贷款额以及以什么期限的最新信息集中在一起。目前已有的这类数据最完全的信息是由一家伦敦的私人咨询机构 Caploan 提供的。

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图简便这种历史原因，银行统计数据习惯上是根据“所处位置”而不是“特许状”（即国籍）来统计。结果导致美国银行在伦敦的支行向一家澳大利亚银行的香港支行的贷款在统计数字上显示为英国资产和香港债务，而由报告地区之外的美国或英国银行实施的贷款在银行统计数字上根本不显示。这种传统做法显然忽视了赫尔施达特事件后的《1976年协定》强调的政治现实，此协定将规范（必要时挽救）银行的最终责任留给向银行颁发特许状的政府而不是留给银行所在地的政府。

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还存在着其他缺陷。即使在报告地区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报告所有信息。对贷款期限问题，加拿大不计算投资银行；意大利忽略一些只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大型机构；瑞士忽略由受托人以外币提供的通常数额很大的投资；意大利和卢森堡都没有费心统计由它们的银行的国外分行提供的贷款，这一点紧接安布罗希阿诺（Ambrosiano）事件后变得尤其明显（康韦尔，1983）。人们无法从银行从国外借款的统计数据中知道有多少是“实际”借款，有多少是银行间借款。实际上，也许整个信息图中最大的缺点在于缺少有关银行间贷款的信息。

国际清算银行做出的最佳猜测是银行间贷款占欧洲市场总贷款的40%左右，尽管整个银行间借贷款项被认为大得多（即毛交易额而不是净额）。但是某一个银行在某一特定时刻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银行间市场——无论是存款市场还是从贷款中获利的市场，是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甚至确实存在的数据出版的前5个多月的信息）。当任何银行开始陷入困境时，如琼·斯佩罗描述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或最近一些时期的彭-斯奎尔银行（Penn Square）和大陆伊利诺斯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很容易看出这一点的重要性。由于它对全球货币供应这个复杂问题的重大意义，在这一点上的无知的影晌非同小可，马尔切洛·德·切科（1982年）指出了这一点。

事实上，一些信息被搜集起来加以集中，更多的其他信息本可以集中却没有。国际清算银行不仅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早在70年代早期就开始为利用由电脑/远距离传送技术敞开的集中金融信息的可能性做准备。它建立了一个由经济统计师和电脑专家组成的工作组，现在已经设计出一套由卫星和电话将所有中央银行的电脑与巴塞尔联系在一起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中央银行可以马上获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的所有数据以及国际清算银行自身关于欧洲市场交易的统计专辑。但是从来没有被搜集的数据明显不可能被分享。而且，考虑到在谈判中获得的帮助，十分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尽管国际清算银行是一个中央银行俱乐部而不是一个常规国际组织，但是财政部长和商业银行均无法进入其中央电脑系统。

另一种缺点在于银行本身并不公开它们对任何一个国

家贷款规定的限制。自 1974 年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三四年中，这些限制变得越来越严，越来越详细。有时是因为美国银行受到来自美国货币监理官的压力；有时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谨慎。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管理者坚持：银行对任何一名借款人的贷款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盈余加上回收的收入的 10%。但是从规则的存在推导此规则被普遍遵守是错误的。从字面上看也许是，但从实质上看绝对不是，因为并没有对某个国家的全部借款人的贷款额进行合计，尽管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最终可能会要求重新安排支付计划。

在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中，不仅仅债权人而且他们的政府都被蒙上了双眼。借款的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也不知道体系对它们的全部外国债务设定的限额。银行随时出入欧洲货币市场难以预测。直到 70 年代中期，市场受美国银行控制，每一个这样的大鱼后面拖着一群小鱼；越来越多的欧洲银行和日本银行加入其中，后来阿拉伯银行也加入进来。^①但是在 1978~1979 年间，日本大藏大臣对日本银行参与市场设定限制，在 1982~1983 年，几乎所有银行都大规模减少了它们的欧洲市场业务。^②不仅可供使用的信贷以这种方式萎缩而得不到任何收益，而且中期信贷市场或

① 这些交易现在占有全部欧洲货币交易的 10%（T. 韦勒·沙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1984）。

② 1980 年和 1981 年国际银行信贷的年度增长率为 21%，但是在 1983 年和 1984 年仅仅分别为 8.5% 和 7%。工业国家的银行没有像 1981 年那样，给世界其他地方提供 675 亿美元的净信贷，而是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了高达 185 亿美元的净资金量（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1985，第 111 页）。

债券市场（或两者）可能迅速被工业大国（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或一大批企业借款抢先占领。任何一种情况或两种情况都可以很容易将不幸的欠发达国家的借款人“挤出去”，或银行突然随意提高与伦敦市场同业拆放率的差价，以收取更多的费用而不考虑实际情形。

结 论

将从这一大堆数据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作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说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出版这些国家提供的数据的国际机构确实知道一些信息（官方拨款和贷款，以及来自多边机构的贷款）。它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其他猜测，如国际银行从国际债券市场上借款和筹资的数额及方向，但对于国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和特征，只能做一个粗略的猜测。^①对于两三个有关国际金融流量的特别重要的因素——来自非银行的贸易信贷、超短期信贷及大型企业中跨国界的财务转账——绝对没有任何可靠的信息。

这张十分片面的信息图在有效管理我所称做的信用危机，即通常被称做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时，明显很重要（斯特兰奇，1983）。它对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内货币管理也很重要，如果这意味着它们不确切知道何种货币通过银行流入或流出该国。这些在收支平衡账目上他们所谓的“错误和省略”一点都不小，并且规模日益增大。

^① 这样一种半官方的猜测是：这种资金从1977年的330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370亿美元、1979年的400亿美元和1980年的430亿美元。但是其中有多少是由在该国投资的外国公司所筹集的当地资金根本不清楚，而且也不可能搞清楚。

198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宣布它计算出其所有成员国的被计为“错误和省略”的总额增加到每年200多亿美元。在金融圈内，大家都明白这些未知的数量来自出入银行的短期货币和大型企业从一国到另一国的账户。

如我以前提及的一样，就准确的信息而言，银行间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灰色领域。表5-1表明英格兰银行对1973、1976和1981年以外币交易的全部银行间债权和由伦敦银行借出、借入的贷款债务所占比例做出的估计——另一些银行甚至没有试图进行任何估计。

表5-1 伦敦市场以非英镑进行的银行间交易所占的比例

单位：%

	1973	1976	1981
英国银行	81	59	81
美国银行	85	85	75
日本银行	98	95	94
其他海外银行	88	85	78
银行团	95	94	86
总计	85	86	81

包括1975年后被计入其他海外银行的美联邦银行的债权和债务。

一家银行对其他银行的依赖程度一点都不清楚，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也如此。例如在美国，1982年夏天，一家无名的俄克拉荷马银行彭-斯奎尔银行被发现不仅向当地的石油公司滥放贷款，而且还从其他主要货币中心的银行借款来放款，特别是向两家最大的芝加哥银行之一的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借款。当一个像彭-斯奎尔那样的银行可以由

一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戴上米老鼠面具的人控制下运营时，禁止州际或国民银行业务的美国银行规章的整个意图遭受到了挫折，而美国财政部或货币监理办公室的官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怪现象”。

将体系的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我们已看到日益增加的不稳定已导致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明显的肿胀，多数本质上是投机性的。它也增加了大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并改变了当局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任何稳定的市场体系非常重要，导致的结果是管理当局被削弱，市场变得更加动荡。

然而，这些后果被一些重要的误解遮盖得太久，而这些误解主要是由学术界散布的有关当时的情形及其后果的。这类误解有一些被揭露出来，另一些仍继续存在。但是，普遍的影响是重大无知的领域逐渐扩大——说重大是因为从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政治控制和监控这种观点来看。那种控制和监控需要相应的知识，随着变化加速，市场和国家货币体系日益融入全球体系，所需知识增加，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正是依据这些宽泛的结论我们不得不审视和权衡提出的各种补救措施和改革计划以使体系得到更好的控制。

第6章 一些医治处方

针对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缺点，有人认为能做的事几乎没有。那些被我称作技术决定论的人认为，通过改变政策的本质以补偿这种情形所能做的事不多，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此情形是致命的或不可救药的。他们像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一样，想象上帝或上天或在此情形下康德拉季耶夫长波迟早会来挽救这一情形，与此同时可做的事并不多，只有耐心等待。

另一类悲观主义者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如此不可救药注定要灭亡，患有如此严重的内在的与生俱来的疾病以至于只有通过革命使之死而后生，造就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医治体系的疾病。当然，也有很多人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结论，但是拒绝接受其逻辑推理推导至如此宿命论的、悲观的、充满暴力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寻找某种过渡战略来限制或调节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损害。只要他们能提出必须被视为解决方法的观点，我们就应该对这些观点进行一番考虑。

另一些人由于误诊了体系中存在的缺陷或弱点，所以开出了错误的药方。这些人中主要是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对自由贸易热烈的近乎狂热的忠诚使他们将全球

政治经济中的病灶归因于错误的贸易政策，将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冲突、失业及其他问题归因于实施反对国外竞争的保护主义措施。因此，他们认为更好的补救措施将是更自由的贸易政策。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说联合的改革行动并使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政策自由化，尽管使世界恢复经济健康很有必要，但不足以使之恢复健康，因此也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来对付货币和金融混乱（康和迪伯尔德，1983；图姆里尔，1983；科登，1984）。从前面章节中阐述的主张可得出一种不太相同的结论：即使政治上和技术上有可能使贸易自由化，并使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真正处于竞争中，但这仍然未触及世界经济混乱更严重、更具破坏性的方面（如前一章中所阐述的），即世界金融体系长期的不稳定；这种不确定对投机者的诱惑以及在风险和获利机会的社会分配上存在的悬殊日益增大，越来越不平等。

我想到的另一个惟一重要的误诊在一些政治学家圈子里比在经济学家圈子里更受欢迎。它是由那些我在第3章中称作的“政治决定论者”提出的。那些人相信世界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丧失了霸权地位，失去了领导、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统治世界经济的能力。他们怀旧地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其视为稳定和增长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们将美国权力的丧失视为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在第3章中，我试图概略叙述美国作出的、导致货币和金融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的政策选择并不是预先决定或难以避免的。如果导致更人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之路并不存在无法避免的因素，当然回到更有序更稳定的道路同样也不是

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它并不像一些政治决定论者所辩驳的那样，这需要美国制造工业的重大复兴或美国在有形贸易收支平衡上出现顺差，或以更大的防务预算或对其出口国设置限制使体系中的西德、日本或其他任何参与国实际上处于瘸腿状态（克莱因，1983；基奥恩1984）。

不可能的疗法

由于病情诊断错误而开出错误药方是一个真正可以被理解的错误，它远比开出病人无法（被普遍认为无法）实行的疗法更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医生一直在犯前面这种错误。结果证明，有多少病人被施以根本没有必要的外科手术？有多少患神经性食欲缺乏的病人被送去看精神病医生？据一些专家说，他们本来只需纠正食物中缺锌的问题便可以了。多少电击疗法后来发现不合适？但是至少医疗行业并不像学术行业那样经常肆意犯下“发现”经验已证明无法实施的解决办法这种错误。

我认为，这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全部论著在解决当前问题时所犯的最普遍的错误。主要原因是长期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对国际组织的历史不重视。

这十分明确、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对国际合作以及解决冲突的办法所设的限制。根据过去的经验，关于明显可行的事情和可能无法达到的事情之间的确切分界线究竟在哪里可能存在一些分歧，但在这个界限之外存在大量的不可能的事物却毫无疑问。只要政治权威由国家拥有，而国家只能在已确定的疆域中运转；只要权威得到居民自愿（或被迫却很有效的）忠诚的拥护，这些

疗法就绝对行不通。

因此，那些针对货币和金融体系提出具有美丽光环却无法实行的疗法的专家就像寓言中那位据称很明智的老鹰，其他动物去向它询问如何才能阻止狮子杀害并吃掉自己，“啊，”老鹰说，“如果你知道狮子什么时候来袭击你，你就可以跑开或藏起来，因此你必须在每一个狮子的脖子上挂一个能发出警报声的铃铛。”这些动物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啊，”老鹰说：“我已经告诉你答案背后的原则，该你自己想办法怎么去运用这一原则。”

在这里寓言适用于那些提出协调国民经济政策建议的人。它也适用于那些提出任何“改革”国际组织建议的人，这些人提出的改革措施明显超越主要国家的中央政府可接受的界限如此之远以至于无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他们提出的建议将是另一回事，如果他们愿意承认自己的建议是完美无缺的，是通过长期教育应该达到的理想目标，是逐步通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措施；如果他们同时能够告诉我们长期如何做，直到理想的补救措施终于可以实施的幸福日子终究来临。

协调国民政策

更好地协调国民政策一直是许多国际会议（不论是私人国际会议还是官方国际会议）不断提及的主题。这种观点在1977年得到了很大的推动，当时美国提出了所谓的“动力理论”（locomotive theory）作为解决美元疲软和随之而来的汇率不稳定的措施。当时华盛顿呼吁德国和日本也以自身的力量来推动以促成世界经济更高的增长率，现在

看来华盛顿当时真正需要的是德日两国使自己的经济与美国同步通货膨胀，以此来阻止美元在外汇市场上令人沮丧的下跌。在美国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德日两国同意这样做，“协调政策”对1979年的汇率稳定和美元坚挺可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这种巧合部分属于偶然，通常说来，认为德日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总符合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是很草率的。由于美国的政策从这一个月到下一个月很难保持一种稳定的步伐，因此更不能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从追求低通货膨胀率到低失业率后来又回到追求低通货膨胀率，其间，美国经历了享有一种非常疲软的美元带来的贸易利益到享受非常坚挺的美元带来的金融利益，但是在突然改变政策时美国从来没有与其他政府商量或通知它们。

认为如果世界货币体系经由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货币管理当局实施三方协调管理，世界货币体系的运行会顺利得多，这种论点的一种主要观点我在前面已提到了。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教授10年前在关于国际金融问题的普林斯顿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这种用于医治的观点（麦金农，1974）。

当时仍有很多人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渡委员会的行动实施国际货币改革的可能性抱有可笑的希望。麦金农的观点是，体系健康的关键不在于由20或者100个不同国家的政府签署多边协定，而在于主要货币大国之间的紧密合作。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但没有什么结果。因此当时重提这一观点很有道理也很及时。此后，他从技术方面详细阐发了

他原来的观点，他解释了像联邦储备银行那样一个中央货币权威，在设定其货币目标时，如何可以对纯粹的国内指标少强调一些，而更多强调同其主要合作伙伴之间汇率的稳定，因此强调每一种货币与其他货币相比相对购买力的稳定。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只要自己的货币供应量比其伙伴国的货币增长超出太多，便应采取措施降低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麦金农，1974，1984）。

针对这种规划，有些人从技术和经济方面提出反对，但主要还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异议。他们的基本假设是政府承认稳定是最重要的价值，比任何其他政策目标如国家安全、低失业率、在对外关系中自由行动等更重要。而且，稳定包括货币长期价值的稳定（一种普遍的长期货币增长目标）和三种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现在这看来很有吸引力，但一点都不切合实际——对于我们大家从历史记录中看到利用此体系而不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管理的美国尤其如此。其次，协调国民政策的方案将此三国安排中的任何主要政策可能与两个小一些的伙伴国造成冲突的可能性打了折扣，甚至到了无知的地步。

对于德国来说，它对欧洲货币体系负有义务，对在欧洲创立一个“更稳定的货币区”的目标负有责任。1978~1979年联邦银行和德国政府之间出现的分歧表明了后者往往对政治目标给予优先考虑，尽管波恩（德国现政府已迁都柏林——译者注）的历届政府内阁更迭，但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而且，德国在与东欧和平共处及贸易上存在的利害关系对华盛顿而言无关紧要，这很容易导致对货币政策观念的分歧。对于日本来讲，它一直努力使自身尽可能

少遭受美国政策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与周边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建立密切的双边关系。这两种长期的国家利益很容易破坏这种三方计划。

为了与这样的一些政治目标相协调，麦金农提出全面协调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分阶段逐步实现，这样才不至于使政客太感到意外，受惊吓，并留出时间使合作的习惯和技术形成得到发展。但是这恰好是欧洲在70年代早期听信的韦尔纳计划和欧洲货币联合的早期观点代表的新功能主义者的谬误。确实，欧共体的全部经历表明玩“奶奶走路游戏”^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旦国家的自治权和行动自由遭到严重威胁，“超越国家”的决策步伐便会放慢。反抗非但没有变弱，而是开始变得更有力了。因此，在麦金农的方案中，采纳第一阶段的措施便可能提醒政客和官员关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因此更加反对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

然而欧洲人会注意到在主要工业国之间采取宏观政策决策时进行三方或国际合作，这种观点在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中非常流行。例如，著名的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修补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而且也是恢复世界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托宾，1984，12页）。但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主张是根据一个十分令人怀疑的假设，

① 一种儿童游戏，玩时一人背对众人，其余人从起点线开始偷偷移步上前触摸其背，背对众人者可不时回头，当发觉某人正在移步时即令其退回到起点线。——译者注

即将国家利益置于共同利益之下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同等利益，因为任何扩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使自己的货币贬值。但实践中美国可以轻慢对待普通的经济逻辑，美国可以通过提高利率获取足够的国外资本以补偿自己大量的贸易逆差。这指出了体系中的经济自治权存在的内在不平衡——因此表明美国任何政党的政客不太可能比过去更关注欧洲或日本对美国经济单极主义的抱怨。收集在同一本论文集中的马利纳·惠特曼 (Marina Whitman) 的文章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他指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种新的“折价谈判” (implicit bargain) 是在货币协调政策上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前提。

在这样的谈判中，美国可能会更多考虑其经济政策对大西洋对岸国家的影响，可能会控制自己的经济政策向“全球单极化”发展的趋势——所谓“全球单极化”指的是在领土外坚持具有管辖权并强行实施全球行为规则的行动，长期以来盟国一直表示对这些行动不满——反过来在欧洲国家（包括日本）方面，它们更愿意为维持西方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以及全球经济的健康分担责任（惠特曼 1984，第 51 页）。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 20 多年的资深国际官员、研究主任、后来成为执行主任的雅克·波拉克 (Jacques Polak) 对可能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设置的限制表现出更大的怀疑。他在 1981 年就同一主题为三十国集团所

写的著述中，以于巴巴的克制语气提出：“认为国内需求水平可以在峰会上进行谈判议定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根据国家首脑具有将公共效用进行国际对比的能力的一种假设得出的。然而，即使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对比，弱势一方也不具备这种能力”（波拉克，1983，第13页）。他让人注意到那些需要由一国或另一国进行调整的情形，为此进行的协调“并没有涉及到振奋人心的对共同目标的追求，而是毫不例外地在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中凌乱地寻求一种妥协”。他得出结论：在总需求中协调政策的困难如此巨大以至于通过忽略这些困难或假装它们不存在则什么也收获不到。确实，波拉克在文章结尾时提出的相反主张是，既然一体化导致了如此大的不稳定，企盼“分散决策”或以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所说的“受控制的解体”作为解决办法可能会更好（赫希和多瓦勒1977）。这看来是下述说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最好将一些控制权力放回国民经济手中，使金融市场不受国际影响以及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波拉克，1981）。但是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仍需讨论。

坦白地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美国人中受到欢迎这一事实看来反映了一种潜在的美国帝国主义，而不是美国人真正希望改变态度。它是一种允许美国人为所欲为而其他人只能听命于他人的疗法。它不是一种医治我们的经济困境可行的处方（切科，1983）。

勃兰特解决方案（Brandt Solution）

经济改革的许多处方，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试图

增加国际组织的权力和资源以及扩大其活动。那些广泛赞同北南关系的《勃兰特报告》(勃兰特, 1979)的诊断和结论的人尤其如此。他们同意其基本的论点,即富有的北方国家和贫穷的南方国家在一些根本利益上是相同的。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经济符合富有国家的长远利益,此主张也表明贫穷的国家维持而不破坏其中用于投资的资本和技术,用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使它们相对自由出入各国国界的世界市场经济也会符合自身的长远利益。为达到这个目的,《勃兰特报告》建议迅速大规模增加通过世界发展基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比世界银行规模更大、更雄心勃勃。武器销售和防务政策由于浪费资源必须被砍掉,相应的资源必须用于民用发展。跨国界营业的大公司权力太大,因此应该加以控制。应该授权国际组织收取税收,使它们不依赖国家的捐赠。考虑到这类提议对社会民主观念,即需要对抗的政治权力来纠正、革除市场体系中的失败和不公正,负有广泛的责任,可发现它们中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尽管在欧洲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很多,但是在英国这些观点却未得到如此普遍的认同(斯特兰奇, 1981)。在美国,《勃兰特报告》获得的关注很少,几乎没有得到共鸣。在其他大洲,政府满足于抱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但是极端令人怀疑的是:许多国家的政府——西方和苏联——实际上是否会乐意放弃它们购买武器的自由或将对经济有深远意义的权力让给一个国际发展机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事的经历几乎没有使巴西人、阿根廷人、尼日利亚人和其他许多人喜欢这种观点。确实,当谈到这一

点时，不仅仅是富裕强大的国家不愿意让国际机构做出塑造国家未来的决策。一个重大的原因是这些机构并不对某一个特别的国家负责。为许多主人服务的仆人不会关注任何一位主人。对不冒犯别人的行为有一种奖励。虽然挑衅的言论可以容忍，但是挑衅的行动或有意妨碍的行为却难以容忍（阿切尔，1984）。结果是：许多著名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本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共体——不但没有成为领导的先驱，反而日益被任何与之打交道的人视为低效率的回水地、愿过安静生活的人和任何愿意捣腾文件而不是推动政策实施的人的隐蔽地。那些有特定的技术功能的组织——如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国际电信联盟（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和国际航海卫星系统——不太一样，如果国家希望享用由技术和金融联系到一起的世界经济的利益，它们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处理交通和通信的组织被认真对待，多数时候被允许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会有什么麻烦。至于其他处理有关安全和货币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事务的国际组织，看来仿佛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将它们召来承担新任务，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召来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以恢复债权人对贫困的近乎赖债的债务人的信心。

但是《勃兰特报告》和其他许多改革计划中隐含的这种从民族国家向国际机构永久转移权力和资本的观点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实现。今后有可能出现新一代选举人和政客，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不同，并且他们比现在的选举人、政客及官员更乐意接受废除国家而赞同某种国际

机构。一旦那一天真的来临，也许现在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可能的改革方案能有效地促进必要的教育以及观念的转变。

即使那一天真会到来，也不太可能出现在本世纪。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经济中，这种经济被置于货币管理的两难处境中并随后被经济萧条所尾随。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必须以很大的政治怀疑态度来看待改革建议。我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是：

①改革建议对现在这里的问题有何帮助？

②有任何方式可以被用来迎合那些有权作出决策的人的自身利益吗？

③他们提出了一种可以被用来谈判的基础吗？

④尽管他们提出了对问题的正确分析却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吗？

⑤改革建议无法实施，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府将反对这种建议，还是因为拥有最大的否决权并反对改革的美国不能确信它符合美国的国民利益？

改革建议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考虑3种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至少是从国际层面而不是狭隘地从国家层面来看待问题。每一种建议都指向货币金融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例如，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了针对特别提款权这一重大议题的计划；迈克尔·利普顿和斯蒂凡妮·格里菲斯-琼斯（Stephanie Griffith - Jones）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最终贷款人（格里菲斯-琼斯与利普顿，1984）；赫伯特·格鲁贝

尔 (Herbert Grubel) 建议成立国际储蓄保险公司作为国际银行的救生衣 (格鲁贝尔, 1983)。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费利克斯·罗哈廷和其他人提出的利率补助 (rate-capping) 的建议, 即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直接或间接利率补贴。我们也可考虑这一主张, 即逃离目前的两难境地的惟一途径在于以长期贷款或投资取代短期银行信贷 (罗哈廷, 1983)。

威廉森主张到 1986 年发行高达 43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巨额数字 (1985 年发行的提款权为 40 亿美元), 比已发行的全部提款权增加了一倍多。他的主张是根据债务问题最终是非流动性而不是无偿债能力这一理论形成的。拖欠并不是因为债务国如此穷困以至于不能找到资源支付债务的利息, 而是它们缺乏支付款项所必需的外汇。他辩论说, 原因是贸易和其他交易远远超前于支付能力, 因此不能存放货币储备。因此解决办法不在于减少它们的进口——拉丁美洲的进口从 1981 年到 1983 年减少了 30%, 相当于 300 亿美元的价值——而在于建立令人信服的自身储备, 以此来恢复对它们的信用的信任, 这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尽管他承认经过数年的争论, 经济学家对如何计算一个国家所需的储备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包括进口应付款总额, 还包括其他因素。但是他提出主张储备和进口的比率为 1:20 的传统指数规则是自找麻烦。他认为 1:30 的比率是一种不错的标准, 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遭到严峻挑战。根据他的主张可得出结论: 欠发达非石油生产国的储备短缺到 1983 年高达 210 亿美元, 并以每年 90 亿美元的速度增加, 还没有将任何工业国或石油生产国可能需要比现有的储备更大的数额计算在内。他对问题的分

析表明 70 年代从银行大规模贷款应付了这一问题，但是一旦银行贷款开始出现萎缩，问题可能会重新出现。威廉森提出的建议不同于 77 国集团长期偏爱的“联合”观点，即第三世界联盟。在他的观点里，创造储备被作为一种谨慎地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的方式，但创造储备不会使主要债务国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例如，巴西 1984 年同意有条件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under conditional IMF facilities）中提取 15 亿美元，从银行申请借款 65 亿美元，而根据其储备巴西只能获得 5 亿美元贷款。在 60 年代晚期对整个特别提款权方案进行谈判时曾提出重建条款，但由于存在许多争议在 1981 年被放弃了，威廉森建议应重新引入原先的重建条款。这会促使欠发达国家不愿使用自己新的特别提款权，而愿意保留特别提款权在紧急状态下使用。支持这个建议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分析争辩说：1970 年签署的关于特别提款权的原始合同的墨迹未干，创立的“纸黄金”国际货币储备就变得过剩了，这是因为信用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世界经济接着进入了一个高度通货膨胀的时期。然而到了 80 年代后期，需要用特别提款权来纠正 80 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很难对这种逻辑进行辩驳，但是这里纯粹是政治意义上的问题。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投票人——同意，不可能对特别提款进行分配。1984 年，里根政府首先反对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配额时，美国公众舆论很少有人提出抗议。尽管他后来使这个必要的提案在国会艰难地获得通过，但是他仅仅是由于担心如果不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能阻

止拉丁美洲的集体赖债，从而引发美国自身无法控制的银行危机。如威廉森和其他人（最有名的是法国人）提出的，分配特别提款权带有这样一种意味：对第三世界应受经济援助的国家和对贫穷腐败的国家一样是一种施舍。在美国人可能同意分配的特别提款权大得足以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政府以后的行为有影响之前，美国的经济萧条会变得更加严重，“眼前的”经济复苏会遭到严重挫折。

过去 10 多年里，银行侥幸逃脱破产的痛苦经历引起了更多研究，关注银行体系的国际特性与中央银行对管辖、获取信息以及监控影响的有限性之间的差异。中央银行更难充当最终贷款人。除了一些很小的分歧，所有这些研究都同意目前的安排不合适，并且市场所依存的整个信用结构存在危险（卡莱茨基，1985，1984；克莱因，1984；莫菲特，1983；德拉梅德，1984）。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对问题本质的分析无可辩驳。在目前的安排中与中央银行方面信息不足相关的一些弱点已经在第 5 章中谈到了。中央银行没有被正确告知关于自己的银行对其他银行借款的全貌（即由注册总部设在该国内的那些银行向那些注册总部设在国外的银行的借款）；它们没有被正确告知有关短期出口信用以及它们的银行对合资企业和辛迪加业务的承诺。由于分析主要债权人的债务承受能力的金融和道德限制也不全面，因此它们对主要债务人的信息也不全面。其他弱点与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其权力中的漏洞以及在中央银行分别的管辖范围之间出现的疏漏地带有关。例如，中央银行不总是完全控制自己银行的分行的业务——比如，意大利银行 1983 年拒绝履行对安布罗希阿诺银行的卢森堡

控股公司履行义务。除了美国的货币当局有无限制的权力制造美元以外，其他中央银行以外币支付自己银行债务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那些属于国际清算银行和那些签署了巴塞尔协定的银行，其管辖范围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从事银行业务的实体有很大的差距。

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将安全网中出现的漏洞简单归结于暂时的技术疏忽。在一个安全的银行体系中最终贷款人功能的本质是：最终贷款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谈判依据商业银行和其客户的谈判情况而定。最终贷款人将在某些情况下提供支持，即只有在商业银行继续向有偿债能力的借款人贷款的严格谅解下，最终贷款人才提供支援。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对国民经济负有社会责任，而这些顾客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国际银行中，某些顾客可以以自己的货币具有偿债能力，但是如果以美元或马克支付便不具有偿债能力。即使他仍具有偿债能力，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央银行会乐意去支持向自己贷款的外国银行。是否提供支持有可能因对外政策的考虑受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一些认真对待这个重大议题的学者已得出结论：在这些情形下十分需要有效的最终贷款人基金，但是不幸的是却无法获得这种基金（莫菲特，1984；利弗和胡纳，1985）。因此，体系仍然容易受主要银行无力偿债的信用恐慌的影响。因此最有可能的是退而求其次，公开承认次好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中央银行将询问更多信息，并且对在何处止步知道得更明确，而不是回避自己的责任。中央银行也应该更努力地促进银行不要在巴塞尔网络之外运

营，只要有可能，应该鼓励建立主要银行之间依据合同提供相互支持的私有体系。

国际援助体系

其他一些学者认为，即便创立国际最终贷款人，体系仍然十分脆弱，但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很有必要创立最终贷款人。这种观点是由迈克尔·利普顿和斯蒂凡妮·格里菲斯-琼斯提出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正式、透明、快速的国际最终贷款人。”他们的论点是复苏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以以往同样的模式借出更多的资金只能意味着后来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而少贷款则要么破坏复苏要么促使赖债不还”，这种论点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很奇怪他们都没有对如何来做到这一点或谁应该充当国际最终贷款人提出建议。就像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一位工程师、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只有一大罐没有开启的菜豆，经济学家说：“假设我们有一个可以开罐头的起子……。”这些经济学家和传说的那位经济学家犯了同样的错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都没有资源，因此没有权威来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可能需要提供比1984年向大陆伊利诺斯银行提供的110亿美元更多的款项。

另一种观点是求助于保险原则，这主要是考虑到银行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为银行本身的利益服务。30年代，罗斯福刚刚就职时，美国政府就遭到了金融恐慌的威胁，起先是存款人涌进银行提取现金，一连串银行开始纷纷倒闭。政府首先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发布银行临时禁令，关闭

所有银行。新政政府实施的一个更长期的措施是所有银行强制参加保险体系，确保这些银行所有的小储户在某一银行倒闭时得到赔偿，当时确实有很多银行倒闭了。1935年成立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并没有阻止一些银行倒闭的命运，但是它确实将一些稳定因数引入了体系中。因此避免了当时潜在的危险，即许多小储户同时对某种私下的谣言做出反应可能导致一个十分健全且有偿还能力的银行跨台，甚至有可能在其他银行之间引发一场蔓延的破产的大火的危险。

格鲁贝尔教授和其他人也对国际银行体系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格鲁贝尔，1983）。但是将现在的体系与30年代的美国体系进行类比仍值得探讨。现在不存在一个对整个全球信用体系像罗斯福政府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同样关注的世界政府。没有能够将保险原则强加到世界上所有大银行、并有能力使它们支付保险金的国际权威。而且对体系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可能将自己的钱从某个银行提取出的小储户，而是当谣言开始漫天飞时，其他银行不愿意以银行间信贷支援该银行。通过对一个将要破产的银行过度贷款来保证所有其他银行免遭损失比保证美国的储户免遭低于1万美元的损失代价要昂贵得多。但确切的是，签署国际协议达到这样的一些目的几乎没有可能。体系的主要威胁过去来自现在仍然来自美国银行，它们向欠发达国家贷款规模最大；但是被要求制定的防止坏债造成损失的规定却最少。其他国家如瑞士或西德，由于银行很容易遭到统治风险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当局要求银行注销它们的坏账，或者坚持银行存放一大笔储备金来支付这些

坏债，并且给银行甜头作为补偿，允许它们上缴更低的税。精明谨慎的政府如精明谨慎的公司一样，不会愿意支付大笔保险金来保护那些不精明不谨慎的政府。回顾过去，可以发现 70 年代中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来对付油船运载率突然灾难性地下跌。一个代表银行、轮船制造者、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组织提议：所有这些机构均应为大量买进报废旧船而努力，以此减少世界船舶吨位供应过剩，而提高油船和货运的价格。这种方案在意图上令人佩服，在理论上行得通，但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精明节俭的人认为没有理由将那些挥霍、浪费的人从他们自己无论在制造、购买或对大油轮发放许可证时过于自信造成的结果中拯救出来。而且，最大的经营者——主要的石油公司——足以以自己的资金应付这些困难。在今天的金融体系里，美国完全处于同样的地位。美国政府知道自己在紧急关头，如在对付墨西哥、巴西，甚至大陆伊利诺斯银行时，可以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美国政府也认为应该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

一段时间内另外一种比较受欢迎的观点是利率补贴，即找出当前最高实际利率和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利差。这种观点辩论道，找出必要的补贴来缩短这个差距比注销全部贷款引起的惊慌要好一些，因为债务人往往无力支付注销债务的服务费。这种观点由纽约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中的费利克斯·罗哈廷所提倡。它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类比。罗哈廷作为一名 70 年代使破产的纽约市恢复金融名声的奇才，在华尔街之外声名远扬。这样做对地方金融界和政界的许多人有着强大的利益。但是国

际体系却很不一样，美国在防止墨西哥和巴西长期的信誉丧失时，有很强大的利益。日本防止南朝鲜信誉丧失（甚至金融窘境）时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联邦德国对东德有相同的关注。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动机为自己特定的客户或受保护国找到某种隐蔽的“利率补贴”。例如，和墨西哥最终达成的重新支付债务的安排允许延长贷款期限，而且更容易支付，所谓“容易”指的是增加了宽限期，在宽限期内，根本不必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对贷款支付的平均利率实际上减少了，同时风险也随着期限延长得到分散。

将这样一个体系扩大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完全是另外一件事。第一，它会剥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迫使欠发达国家债务国政府采取必要的通货紧缩行为的强制手段。另外，它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谁将为提议中固有的补贴提供资金。尽管198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美国政策有了实质性改变，但考虑到美国人对外国援助的普遍态度，很少有迹象表明美国会在一个足够大的规模上提供资金。至于银行，也可以提出像针对保险建议那样的反对意见，即审慎的人不应为不审慎的人所做的傻事付出代价。而且，甚至伴随援助出现的发展中国家本身也许也不能接受，因为如果对所有国家给予同等的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将看到自身在金融市场和外援竞赛中的竞争地位遭到了损害。最后还有一个所有援助都面临的问题，即面对所有畸变和困难时，如何阻止临时援助成为体系永久性的一部分。

债务的危险

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为经济发展筹措长期资金不困难，而且在借短期资金时相对容易一些的话，许多“债务问题”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结论在逻辑上无疑是正确的。正如国家由于不得不以越来越短的期限为清偿借款再筹措资金，它们的债务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与此相同，只要发展中国家可以找到不必立即偿还的款项用于投资，债务问题至少部分得到了解决。这就是1983年在进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研究时，英联邦秘书处（Commonwealth Secretariat）和很多经济学教授得出的结论（英联邦秘书处，1985）。

但是同样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实现目标的手段。目前出现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倍增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有丰富的短期或活期存储的资金，因为来自一种或另一种不确定的变量的风险被最小化了。政府、企业和商人有对短期信用的相应需求。过去政府从股东和长期证券持有人手中借款，现在它们更多以金融债券或其他短期证券形式借款，或从银行借款。过去公司常常靠发行股票筹资，现在它们也更多地从银行借款。过去个人常常自己担负（如果他们可以支付的话）自己的生老病死费用，现在更大程度上则由政府或大型慈善养老基金组织、建屋互助会或投资信托公司提供。但是一旦受到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的刺激，所有这些机构在资金上不得不变得高度游移。它们自我保护的策略不得不变成尽可能分散自己的风险，尽可能减少长期承诺，并且尽可能

利用短期借款的相对高回报率这一优势获益。对证券市场的审查表明，它们被工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公司和其他企业所统治。欠发达国家没有多少机构可以成功地发行债券。

惟一切实可行的选择措施是外国投资，或者公司直接融资或者通过外资在合资企业或地方企业中购买股份间接融资。70年代晚期，这种前景令人沮丧，尤其在石油开发方面，大公司因欧佩克的国家化以及接下来的集体维持石油价格的例子受到严重惊吓。因此，只要它们有选择机会，它们会削减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在像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稳定、富有的工业国家扩大它们的投资。发达国家这种直觉的反应逐步导致了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地位的重大改变。为了说服外国公司以自己的时间、技能和金钱去冒险，许多东道国政府变得更乐意分担风险，分担新企业的部分费用，不论是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开发商还是巴西的钢铁和工程公司。从长远看来，毫无疑问，国家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维系着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的最佳希望。但是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国家不同，吸引外资的机会差别很大，因此对国际债务问题只有局部的远期解决方法。

方案选择

尽管也许对这个问题（就像对国际体系的其他问题一样）所有可以被合理希望的是局部远期解决方法——正如没有快速、简便的方法解决核武器、人口爆炸或海洋和大气污染问题一样——因此很难想象有一个快速、简便的方

案来解决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当政治权威散布在这么多国家，当竞争精神在那些自认为是一个民族的人类群体中如此普遍地战胜他们合作的愿望时，公认的解决方法行不通。

和国际体系中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样，审视对未来的方案可能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最好的方案是最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最不令人满意的。

不论这些方案的意图有多好，多么有洞见，但是国际关系史以及过去所有试图扩大国际机构权力的重大尝试告诉我们：所有政府总是都不愿意将国家的任何根本权力交给国际组织。国家不会让它们独立决定是否参战；国家不会让它们收取赋税因而财务上变得独立；国家不会允许它们制定有约束力的规则，并通过法庭对有罪的人实施惩罚；国家甚至不会允许国际机构要求那些掌管国际机构并为机构工作的人对机构表示独一无二的忠诚。因此，国际权威的惟一选择办法只可能是一个国家权威，在任何时候可以影响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行为、制定管理主要信用市场规则的惟一国家权威是美国政府。

美国占据了那种足以令人羡慕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商人和银行家有难以抑制的偏好以美元而不是以其他任何货币或者甚至以各种可能的混合记账单位，如特别提款权和欧洲货币单位进行支付（参看第1章的注释2）。这些货币或记账单位缓慢渗入美元的统治地位中的历程，标志着美元是以任何货币媒介交易的便利工具。用美元的人越多，更多的其他人也不得不使用美元，对美元的偏好并没有因为极不稳定的外汇市场出现

的极端情况而改变，即当美元客观上（即以国民经济中的相对购买力计算）太疲软和当美元客观上太强劲时，情形并没有改变。

说只有美国具有管理体系的政治潜力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具有最大、最具有革新精神、最活跃的金融市场。任何银行，不论其国籍如何，如果渴望具有真正的国际地位，必须准备到美国市场去营业，否则就达不到这一目标。这一点近年来变得很清楚。同样地，美国支配着世界粮食市场和世界艺术市场。任何粮食经纪人无论来自哪一个国家，不可能远离芝加哥，正如任何像克里斯蒂拍卖行或索斯比的经营商不可能远离纽约一样。

这里应抓住的要点是：没有必要由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来为世界上以欧洲美元借款或贷款的每一个银行制定规则。跟1931年引入的联邦储备体系一样，它只需要对主要经营商制定规则，实施监控，并要求它们提供信息；反过来，它必须给它们提供可能的援助预防清偿时出现美元短缺——只有美国可以令人信服地提供这种援助。为以美元或欧洲美元进行银行交易服务的纽约结算中心（New York Clearing House）是一扇大门，在那里美国政府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充当收费员。

可以提出的异议是如果美国充当收费员，它可能会偏向其政治盟友，歧视其政治对手。事实上美国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点：依靠英国或法国银行帮助墨西哥摆脱困境，故意刁难贷款给波兰的德国银行。惟一的不同是银行至少知道最终的责任在哪里；在以被视为适当稳定不变的美元进行交易的银行之间可以建立规定和准则。

可提出的进一步反对意见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体制，由于受每隔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和政治倾向等某些剧烈变化的影响，不能够提供稳定的管理环境，而这种管理环境对于一个健康的全球金融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这种反对意见中有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也要看到，历史已表明必要时美国政府有能力建立卓绝的不受白宫或者国会山影响的机构和权威部门。除了美国最高法院以外，还有如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国际贸易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机构——更不用提中央情报局了。只要美国能认识到保持一个稳定可靠的国际金融体系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找出实现此目标的方式和机制就不会太困难。

麻烦在于，如惠特曼、卡里奥和其他人已经指出的，美国在目前更多地意识到的是承担这种责任的费用和困难，而不是这样做得到的回报和利益，以及不这样做带来的风险。第二种方案因此需要欧洲人对美国人施加一些压力来缓和美国在金融战略和在军事战略上一样的单极主义倾向。它需要一种新的“折价谈判”，其中美国代替欧洲中央银行承担更大的责任，向以美元进行交易的非美国银行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欧洲人要为美国军队保卫西欧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协调一致的欧洲防务政策的要求肯定包括采取一些步骤建立一种共同体系。为此筹措资金，无论是通过课税还是通过借款筹资。不可避免，这将有必要广泛使用一种共同货币单位，即欧洲货币单位埃居，并且促进建立共同货币政策的进程。

在写下思索欧共体内部关于预算讨论的痛苦时，很难

想象欧洲人会采取主动对美国政府在金融领域内施加压力，这跟想像美国人会自愿、单边采取这种行动一样困难。然而，宽泛地说，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种方案追求雅克·波拉克指出的道路——从金融领域中的国际主义后撤，以便国家的权威部门可以再次重新对它们自己的银行和自己的经济进行控制，尤其对美国这样一种战略的含义尤其深远。它肯定要求非常彻底地改变银行政策——如果不是完全关闭欧洲市场的话，至少也会限制美国银行和它们的外国支行之间相互转账，并因此限制进出欧洲美元市场的权力。否则，美国银行将不得不选择在国内外营业或在国际金融业中的风险大得多、更不受保护的环境中营业。为实现“受控制的解体”这一目标，无论选取的手段如何，砍掉银行业务中主要分行的经营活动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费用会使信用结构在规模和能力上大大减少和降低。确实，很难设想如何能达到“受控制的解体”，是否在80年代实际上有可能将时钟拨回到30年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这种限制风险的战略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将更大地破坏人们的信心，对企业造成更多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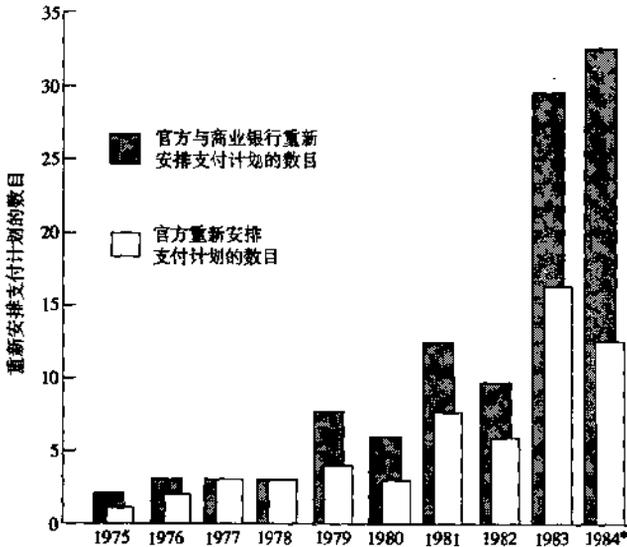
剩下的惟一方案是我们一直在其中胡乱应付的方案。任何情形最有可能的结果十有八九也跟这差不多，这件事情也不例外。然而，尽管现在看来不可能引起完全崩溃和金融灾难，但将目前的状态继续下去（像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的费用一点都不能小觑。作为最后一招，它们确实几乎更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在国内，美国政府采取的挽救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的行动证实了许多有经验的银行家的判断，即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负担不起让任何

主要美国银行关门、停止营业的损失，这对整个经济的损失太大了。但是（如第三个方案所讲的“受控制的解体”）拥有一个你可以控制的系统，或者扩大到控制整个系统，并且对其中的银行以规章制度加以约束，任何一种方式将朝着主要金融机构的国家化方面发展，美国现在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形。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的经理们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指定的人员，也许这个事例会警示其他人更加谨慎，不要像以前那样急不可耐地在国内外忙于从事有利可图但是风险却很大的业务。

但是，这反过来也表明恢复世界经济的前景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体系几乎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但是主要由政治上弱小、经济上不独立的国家，无论在工业化国家内还是在国际体系中，承担为适应更小的逐渐萎缩的信用结构进行调整的费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只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担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自己的任务。越来越多的人将意识到重新获得外国银行家的信任所需付出的高昂代价。那种觉醒将带来什么政治后果，没有人知道，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和70年代的债务情况表明：只有两种令人难受的选择摆在面前。第一选择是政府变得更加强大，因此更加压制反对意见，更加专制，实行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形下，和平、民主或自由经济的前景会越来越黯淡。另一种选择是政府仍然保持弱小、不稳定；外国企业对国家的信心下降，使国家在一种持续的债务萧条和混乱状态中挣扎。这种选择对西方仍然盛行的自由观念没有多少吸引力。

从短期来看，美国作为军事保护国（或干预国）和贸

易伙伴国，确实可以享用自己所拥有的巨大谈判力量，继续享用某些豁免特权。但是这样做会冒着疏远世界经济大部分区域的危险。从长远来看，这对自己的经济前景的损害，丝毫不比对其他体系的损害小。（本章内容请参阅图6-1）



*数据包括截止1984年原则上已同意、但仍未签署的商业银行重新安排支付计划

图6-1 多边债务重新安排支付，1975~1984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5。

第7章 冷却赌场

管理一个根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失去控制的金融体系并使其恢复稳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国家。绝对不可能指望国际组织挥舞一根神奇的魔杖，以恢复金融秩序并随之恢复世界繁荣。审视近年提出的解决方案（如前一章中提出的方案）可得出结论：改革必须从华盛顿转变观念开始。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一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多次凭空想像出建立强有力的新机构的一些非常美丽的方案，有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国环境机构和综合稳定方案。IMF甚至梦想建立一种替代账户，或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都以特别拨款作为其储备的世界。世界食品委员会是一个随时准备应付非洲饥荒的常务机构，很久以前，约翰·博伊德-奥尔爵士(Sir John Boyd - Orr)就为它勾画了一幅激动人心的蓝图，如果美国在40年前没有拒绝这个建议就好了。

总之，国际组织并不是自由的机构。它们由国家政府创设，永远依赖于国民政府。在所有国民政府中，美国在货币和金融的机构中拥有最大的否决权。并不仅仅是美国与众不同，反对国际官僚机构扩大权力。整个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政府总是十分谨慎，避免采取可能让一个国际组织篡夺国家的任何基本特权的任何最小的步骤。联合国

维持和平的历史记录表明，所有政府都紧紧抓住决定是否参战或卷入战争的决策权，使之不落入联合国手中。它们也不会允许联合国进行课税从而在经济上依赖其成员国（从逻辑上说应该是“不依赖”，可能是作者的笔误——译者注）。它们也不会允许联合国制定有约束力的法律，并通过被赋予特权的法庭运用这些法律来惩罚那些有罪的人，或允许它的工作人员向它表示独一无二的忠诚。

因此，为新的国际权威勾画蓝图纯粹是浪费时间。任何新政策的授意只能来自国家。通过国际组织采取行动的权力只能来自国家的权威及合法性。在能够使国际组织运转的所有国家中，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在货币金融事务上尤其如此。这里美国是惟一一个能对所有不同国籍、几乎所有国家的银行的行为施加影响的国家，不论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任何其他国家实施的货币、外交以及商业政策都不可能在其疆域之外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因此，无论是解除（冒着使之不稳定的风险）国际金融体系的管制还是制定管理主要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金融交易的规则，美国是惟一具有决定权的国家。

美国必须认识到对世界市场经济实施明智的霸权符合自己真正的、长期的国家利益。必须说服美国人，尤其是年轻的美国人，再次拿起经济力量的缰绳——并不是出于无私，或者因为他们应该以任何方式给予世界其他国家无私的帮助，而是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只要美国受诱惑将世界事务置于其疆界之外，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漠不关心，遭受灾难的就不仅仅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从长远来看，年轻的美国人也会为其冷漠付出代价。他们在大萧条中失去了工作，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了性命。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单边行动，继续奉行一位美国学者所谓的“国内主义”决策（即决策时只考虑内政方面），受难的将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的人民或欧洲人或日本人（诺，1984）。如果不终止在我们周围以及世界上的每一个大城市中发展运转的赌场资本主义，美国社会也将遭到影响。部分美国社会已经遭到危害——年轻的黑人失业，农民家庭变得一无所有，蓝领工人在中年时成为冗员。未来有更多人将遭受痛苦。他们将遭受苦难，因为如果事情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世界性的萧条将轰隆向前，持续十几年，从长远看来，美国人不可能与此隔绝。那些仅仅应付国家症状的解决办法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美国 1984 年的复苏，掩盖了萧条的严重性和顽固性，如几个有远见的观察家所说，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黎明。这次复苏是由于在疲软的建筑工业上巧妙地改变的税收政策，以及国外的资金涌入可以支持沉重的国防开销，因而促进了商业的短暂复苏。但是这种对手臂上的枪伤的快速修补效果持续的时间不长。如果继续以税收政策获取投资，你无法不面对两种处境：公共部门资金如此匮乏以至于得不偿失；或者回到美国在 70 年代中期实施的通货膨胀政策上来。经验已经证明这都不是解决办法。一旦对美元的信心像 1978 年那样严重下降，再一次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使经济回到一种令人不快的通货紧缩状况，美国将处于危险之中。

这一点也必须认识到：在债务和萧条的海洋中，美国

不可能作为一个繁荣的岛屿存在，不论美国多么希望如此。太多美国公司，更不用说银行，将它的长期复苏依赖于自己在美国境外而不是境内营业的盈利和增长。如果汇率、利率以及总体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持续下去，赌博和投机以及通过公平或不公平的手段快速攫取美元的趋势也将持续下去，这将严重损害长远投资，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这种情形。只有少数高科技部门状况会不错，但是总体经济将处于停滞状态。跟以前一样，政客将承诺说：经济繁荣马上就会到来，但结果证明他们往往错了。

体系从一种危机快速转向另一种危机，只采取短暂的修补措施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时间越长，情形也可能会变得越糟。确实，使用“危机”这个词本身就有误导作用，它暗示：如果你能克服危机，情形就会逐渐得到好转。正如狄更斯笔下的卧病在床的镜头一样，总能顺利度过危险。

实际上，在最近的国际货币史中，出现的危机正是中央银行尤其精于对付的问题。它是一直被回避、避免的长期问题。你回避问题、拖延的时间越长，这些问题越容易变得更糟糕。拿债务问题为例，在墨西哥1982年的债务危机中，由于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实施重新安排支付计划和重新再筹措资金，因而避免了银行体系的崩溃。

但是因为已度过危机就得出“问题已得到解决”的结论，显然忽略了危机涉及的政治方面。对于债务人而言，人们不得不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紧缩银根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不容易忍受，痛苦只有持续时间不长时才能忍受。当看不到尽头时痛苦变得更难忍受。对于债务人来说，如果在数月甚至数年的低工资、资金短缺以及失业

后，仍无法获得新的银行贷款，下面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即一些政客可能会认为无法支付过去债务利息的风险根本没有原来认为的那么大。很可能出现债务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间越长，债务人和其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就越坏。而且这些债权人多数是美国银行。

这一点也可能适用于与债务问题紧密相关的其他3个问题，即银行的不稳定、世界需求的低迷状态以及西方盟国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后者在近年来明显变得大不如前。以往有一个时候当西方国家的元首在峰会上为掩盖他们之间的分歧时，那些出席的人都朝镜头微笑，现在却发生了争吵和冲突。每年提交国会的草案表明，美国人不仅对欧洲人而且对日本人也越来越感到不满。这种感觉肯定是双向的。像所有家庭中的争吵一样，和解宜早不宜迟。至于银行体系的不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变得更难纠正而不是变得更容易。不仅新信用工具每月被设计出来，新资产也被“安全化”——这意味着银行找出了新方法将它们向房主或企业发放的贷款转移到投机市场。使一组经营者保持在一定控制范围内而另一组经营者在另一种范围内的界限越来越遭到削弱与毁坏。这不仅仅是电脑化的信息系统破坏了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再存在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许多管制体系依赖的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古老区别也日益被打破了。为了不影响人们的信任，放任自流的时间越长，问题被隐藏在地毯下面的时间越长，进行变革的难度就越大。

可以认为：要逆转世界萧条本身不是变得更容易而是更

困难。毕竟,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只是一种猜测。其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当权者拖延实施大胆激进改革措施的时间越长,有一些问题实际上就变得越糟糕、越难对付。在重组老式工业、复兴萧条的经济领域方面也同样如此。在政治方面,阿以和谈也一样,与30年代反对纳粹威胁及其扩张主义时的绥靖主义如出一辙。债务问题也可能如此。

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么美国必须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国人必须使自己国内的经济管理恢复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世界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无法预测,直接与美国国内日益增加的不稳定相关。假设我们想像美国的利率保持与60年代早期一样平稳;假设美国政府的消费水平每年大体持平;如果出入美国的潜伏的资金流被制止,许多问题将会自动消失。总之,没有人要求美国为了全世界的利益牺牲自身的利益,我们只是要求美国将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整理得井井有条。因为根据美元在国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价值计算,如果美元现在的价值和60年代一样稳定,如果美元的价值不受导致外汇市场巨大变化的货币变化的影响,那么,许多经济问题——即美元过度疲软或强劲的负面影响——会自动消失。

但是很明显,使美国的经济管理恢复秩序说来容易做来难。它首先要求具有“必须这样做”的政治信念,然后它要求某些机构做某些调整,以便更容易实现这一点。

银行问题

机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管理美国自身的“实际”经济——工业、农业、储蓄、投资、税收等——有关；另一方面与以美元进行交易的管理有关，无论这些交易发生在纽约、卡拉马祖、开曼群岛还是香港地区。

第一种调整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但是美国国会的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对金融政策和货币管理权威的划分给白宫和政府太多权力，至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受具有政治斧头进行压迫的总统的摆布。在写这本书时，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正掌管着联邦储备体系，这还不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宪法对政府进行赤字筹资和货币管理的突然变化的权力所加的限制必须得到充分周详的阐述和加强。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是美国人的事情。也许不能匆忙行事，它需要适当考虑所有的可能性。美国可能需要在宪法上具有独立性的一种中央货币权威，和西德的联邦银行差不多；或者美国可能需要一种与《英国银行特许经营法案》（British Bank Charter Act）相似的宪法修正案，要求参议院或两院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才能突破某种信用创造和消费的限制。

同时，更迫切的问题是使以美元进行交易的银行得到控制，因为这些银行也创造信用。由于监理货币的权力属于美国财政部的货币监理办公室，而干预资本和外汇市场的事务的权力属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这种权力分散强烈表明是进行重大重组的时候了。但是这一种重组必须触

及到比将总部设在纽约、芝加哥、达拉斯或旧金山的主要银行更远的地方。

美国是惟一能够管制国际银行的运作的国家，无论这些银行是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这主要是因为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商人和银行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偏好，愿意以美元而不是以其他货币进行交易。美元比日元、德国马克、甚至瑞士法郎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尽管以上3种货币以实际购买力计算比美元稳定得多。甚至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或欧共体的埃居这样的货币混合体或“一篮子”货币相比，美元也更受到青睐。没有一种货币像美元一样如此便利或如此普遍地被接受。如前面指出的，对美元的偏好，经历了波动的外汇市场的两种极端情形，即在美元客观上太疲软或美元客观上太强劲（即在国民经济内以相对购买力来计算）的年代，对美元的偏好仍没有得到改变（表7-1、表7-2）。

表7-1 1984年末国际银行业中银行间市场

单位：亿美元

交 易	资 产	债 务	净余额
与非银行机构	7030	4220	2810
与相关部门	5050	5040	8
与非附属银行	9400	9350	44
与中央银行	210	1250	-1040
发放的存款单	140	1010	-870
总 计	21830	20870	950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1985年5月。注意：这是3-6个月以前的数据。没有人知道在任何特定时刻的确切数据。

表 7-2 在 1984 年末主要国家中银行间交易的比例与净额

单位:亿美元

	资 产	占总额的比例	净余额
美国银行	6143	280	555
日本银行	5137	235	205
法国银行	1971	90	205
英国银行	1614	70	- 33
德国银行	1421	65	138
意大利银行	882	40	6
加拿大银行	889	40	91
瑞士银行	753	34	70
全部属于国际清算银行的银行	20226		936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1985年5月。注意:这是3-6个月以前的数据。没有人知道在任何特定时刻的确切数据。

美元不仅是体系中无可争辩的国际货币,而且也只有在美国才可以找到最大、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正是在那里所有主要革新被发明出来,后来传播到伦敦或东京。正如美国统治着世界粮食市场或世界美术市场一样,美国也统治着银行和金融市场。正如任何小麦经纪人(无论最初的企业设在瑞士或阿根廷)无法远离芝加哥一样;或正如克里斯蒂拍卖行和索斯比拍卖行如果要在艺术世界的领先地位就不得不在纽约经营一样,全世界的主要银行不得不在美国国内以及美国国外经营——在美国国内通常意味着在纽约经营。

当银行在纽约从事交易时,无论这些交易只是简单地和其他银行、公司企业或富有的个人之间转账,或者涉及到将美元转换成另一种货币或将另一种货币转换成美元这样的资金转换,这些交易均由现在十分机械化的美国结算中心体系来结算。引入这种及时的体系赋予美国一种独特

的地位可以发展成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专家同意部门管理必须得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支持。他们开始怀疑中央银行之间在巴塞尔协定中承担支持自己的国民银行的责任是否真正足够了（格里菲斯-琼和利普顿，1984；卡莱茨基，1975；利弗和胡纳，1985）。巴塞尔协定涵盖面不太广泛、不太有效也不够快捷，以至于不能替代单一最终贷款人。

没有任何律师怀疑美国有权形成这样一种角色——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做的话。将经济史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诸侯国时期，统治者保留了在其辖地内的任何市场对其经营者课税、控制和管制经营者的权利。权利有时是被授予的，通常遭到滥用，但从未被放弃。今天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一个新权威要求任何在纽约（或美国任何主要城市）从事大宗交易的银行在美国注册，并得到从事交易的许可。此许可的附加条件可以非常广泛，可以是美国机构希望加上的任何条款。实际上，对国际最终贷款人的所有要求也可以非常简单地以这种方式实施。纽约结算行体系可以被视作某种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收费门。用它作为对本地银行以外的其他经营者发放许可证的机构并不是一个新奇的举措。因为到时候它对待国内美元交易（如出售股票）和国际欧洲美元交易（比如日内瓦银行以美元向巴西公司进行的银行贷款）完全一样，不偏不倚。

银行专家同意在一个得到良好管制的体系中，应要求银行表明自身具有完备、比较成熟的体系来评估自己在贷款时的风险——无论向政府、或者公司，地方政府或国外的国有企业贷款。它们应该被要求以与其世界范围内的资

产和债务的确定比率持有资本资产作为储备。它们应该接受自己对任何一个借款人——或者对任何同类借款人，无论是船舶制造商或同一国家的所有企业——借款的数额限制。任何一类人都有可能遭到同一种偶然的厄运的打击，使所有同类人同时陷入财务困境。银行也应该根据尽可能多的有关其他银行的行动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决策。否则，如果自己只是在黑暗中射箭，容易因为别的银行在同样无知的情况下所冒的风险使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倍增。

作为一种权利，美国的货币权威一次性提出所有这些要求，而对所有外国银行提出这些要求可能会立即遇到来自外国银行及其政府的抵制。但是美国的货币权威可以对大型国际银行提出比较容易实施的谈判条件。一旦这些银行出现美元资金流动困难，可以向它们提供获得联邦储备体系支持的途径——当然以一定的价格，根据十分严格的条件提供。获得这种享用权的代价可以是要求它们遵守美国货币权威关于风险评估、公开负债表和财务往来状况、储备比率以及使不仅在纽约而且在全世界的投资多样化的要求。

美国采取这样一种措施不啻于效仿自己的货币史。1913年当美国首次建立联邦储备体系时，法律并没有规定所有银行必须加入这一体系。协议基本上是一样的：“加入这一体系，当你需要流动资金时，我们将提供流动资金。但是你必须遵守我们规定的储备比率，并且向我们提供有关你的运营的全部信息。”这一次，一些银行也完全可以拒绝这个提议。比如日本银行完全可以决定由于自己主要的风险在于日元，因此不需要美元的安全网。然而，仍然可

以提出关于公开信息的一些要求，作为它们的交易通过纽约体系进行结算的代价。美国可以以这种方式对国际银行体系实施某种双重监控。正如与原先的联邦储备体系一样，没有必要监控或支持体系中的所有小银行。这些小银行的破产，只有在得到大银行的大规模支持或担保以承担责任时，如彭斯奎尔一大陆伊利诺斯的案件，才会对体系造成威胁。但是如果当时对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的承诺实施更好的控制，首先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彭斯奎尔可能会破产，但是其影响可能只限于当地。

向银行提出它们可能接受或拒绝的提议也可能会涉及国家的尊严这一棘手问题以及和其他国家之间关于管辖冲突的问题。因此无论何时美国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宣布有权任意传唤它选定的任何外国证人或者要求外国公司公开信息时，美国总会遇到了积郁的不满，如果不是公开冲突或实施法律上的报复的话。然而，当它允许外国人使用美国法庭（如果他们想这样做时）来控告如飞机生产商、一些航空公司或化学公司时，将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在这里，国家主权甚至没有被提及。在这件事中也是一样，因为任何银行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提议，或者根据1976年的巴塞尔协定，依赖自己的中央银行承担的正式责任，在必要时向中央银行寻求支援。

而且，在首次提出提议时，美国可以很容易邀请其他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对在其金融中心以自己的货币进行交易的银行提出同样的提议。英格兰银行可以以一定的价格提出支持以英镑或欧洲英镑进行交易的外国银行。德国联邦银行可以对以德国马克交易的银行提出同样要求。建立这

种网络安排，不是基于经营者的总部大楼碰巧设立的地点或者其支行碰巧进行经营的地域原则，而是根据用于交易的货币。目前的不稳定的巴塞尔协定承诺每一个中央银行照管其国民银行，不论它们在何地营业或以任何货币经营。与巴塞尔协定相比，这种网络在当今世界要合理、明智得多。因为事实上只有美国拥有无限的美元供应来支持因短期缺少美元陷入困境的机构——市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债务问题

本书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穷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国际金融体系不尽人意的状态。然而本书一再强调这一问题不能总是和更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分开来看。银行的不稳定，持续的经济萧条，债务问题^①以及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全部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金融体系不尽人意的状态无疑使穷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反过来，深陷债务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困难一旦持续下去，也将使银行体系的不稳定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两个最直接的问题是：①“如何处理欠发达国家的所谓债务问题才能使世界金融体系的前景得到好转？”②“以何种方式改善或改变金融体系以至于至少可以部分减轻对经济发展进行管理的困难？”

找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要求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所

① 我这样称谓仅仅是为了方便。正确地说，应该被称作信用问题，因为信用的枯竭导致了对债务人是否有偿还能力的担忧。好的债务人并不需要返还款项。他们越富有，债权人越乐意持有他们的借款条。日本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国家，在80年以前，他们还深陷债务中。

有问题。否则要求太高。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世纪，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一直是一个很困难的进程，对某时代的人和某些社会阶层甚至是非常痛苦的进程。生活中这种无情的事实不大可能会得到改变。《勃兰特报告》中（勃兰特，1980，1983）概述的宏伟解决方案，涉及到巨额的世界发展基金以及将武器花销大规模转到福利消费。这些方案仍旧是一种空想。政治现实也不会允许大量发行以巨额特别提款权表现出的新官方信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组织将无所作为；只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仍然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这一点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尽管1985年9月在汉城召开的年会上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表示，针对这两个组织美国的政策有令人欣喜的变化。甚至在这之后，上述事实也未得到改变。贝克接着提出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美国银行对拉丁美洲——这个地区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贷款增加2~3%。这将会增加约250亿~300亿的银行新贷款。而对非洲的救济款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托基金和来自世界银行同样数额的款项加在一起也不过27亿美元。

在写本书时仍无法知晓美国官方态度的改变是否会有结果。和银行进行的谈判将使这种蓝图走下绘画版，变成现实吗？因为必须记住两点。第一，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对国际机构的地位的任何扩展的抵制仍没有消失。贝克仍然不敢提出应该允许世界银行通过发行更多债券将其资本增加一倍。第二，尽管通过这些多边金融机构和它们当地的相应机构实施官方政策和采取行动是必要的，可能

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种行动不可能提出充分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即使一些建议被采纳，体系对通过银行的私人借款的最终依赖不可能逃避。即使公司对第三世界的投资与目前最乐观的预测相等或超过这种预测，体系的这种依赖性仍未得到改变。

特别是，这些改革措施中最具建设性的一些措施是建立在“利率补贴”这一观点上的（这一点在第6章讨论过）。一种想法是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经营一种补偿性基金以减轻债务国至少一部分利息款项的负担。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设立的用以补偿商品的出口收益无法预测的、难以避免的减少或者进口石油的费用突然增加的基金类似。这可以通过拨款或者将额外利率的费用加在可返还的资本总额中做到这一点。这种策略可以使债务问题对银行体系不具有原来那么大的直接威胁，但是它和1984年以来和许多欠发达国家谈判的《多年重新付款协议》（Multi-Year Rescheduling Agreements）一样，代替短期风险的是一种长期风险。随着银行破产的金融风险降低，招致赖债的政治风险将增加。针对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贷款的策略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反对意见，使这一观点的效用大打折扣。尽管这可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给予债务人更多时间，但是给予的支持通常很少以至于不能恢复银行对发放长期贷款的信心。在目前不稳定、有些危险性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一大环境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是任何国际组织目前的能力所不能及的。

到目前为止，实施改革最有希望的建议建立在我们熟悉的观念上，即认为保险可以为解决问题作出最大贡

献。对向发展中国家的贷款进行保险不能排除内在的风险，但是将会最大程度地分散这些风险，并且如保险一直奉行的一样，会将风险转变成一种费用。而且，对于政府而言，这些费用比政府自身提供足够的官方“援助”以代替银行借款所花费的费用小得多，并可以从由此创造的额外出口订单（随之而来的就业机会）中得到高回报。

我们必须将集体保险的提议与其他几种建议背后的观点区分开来。这几种提议背后的观点是应该贴现大量买进银行坏账，以便可以排除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所造成的“威胁”，作为回报，银行必须持有长期的“世界发展”债券或其他类似的证券。但是此观点的障碍在于交易时向公众公开银行持有的坏账额以及伴随的风险。目前，这些风险通过以某种紧急储备形式存在的防止坏账的银行条款（未公开的）而处于公众视线之外。最好让它们保持这种状态。

然而，集体保险在原则上和用来促进国家出口由此维持就业的出口信用保险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出口信用保险在所有工业国十分普遍。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指导性政策及一系列君子协定对国家出口信用机构的管理不太奏效，形成了混乱的竞争局面，这种提议将改变这种局面，它将建立为出口机构而不是出口本身的多边保险担保。（利弗和胡纳，1985，第138~139页）。但是为任何一种债务借款获得担保的额度不能超过此债务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定的最高额。根据凯恩斯依据美元价值和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增长率的需求管理原理，担保的贷款总

额每年不一样。

这种提议坚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担任担保人的能力，同时为自己的担保索取一定的费用。基于相同观点的、类似的有益的提议是：使主要债权国的国民政府对持有发展中国家发行的长期债券的债权人提供担保——如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日本对亚洲国家、欧共同体对其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associates）的半独立国家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但是担保数额并不是无限的。如果经济管理很差致使债券的交易价值降低到某种限度以下，并且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保持在限度以下，债务人将遭受担保价值减少的损失。

其他形式的担保也值得探究。在古老的大英帝国，某些殖民地债券（Colonial bonds）可以放在可被受托人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持有的安全证券（Safe Securities）的名单中。

这样一种分配将有助于向十分成功、有冒险精神的机构，如泛美开发银行，提供更多资金用于生产性长期投资。确实，对持有欠发达国家的债券的债权人，对与泛美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一起从事共同融资的银行，甚至对在债务国建立合资企业在拉丁美洲和国内均创造了就业机会的企业来说，需要我们更加仔细地思考更好的赋税激励措施。也可以再一次看一看像马歇尔计划中的关于对应基金的观点是否可以用在社会计划中，如教育和学校伙食，它们是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但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目前尚不可能对其进行投资。

防务问题

西方盟国的防务和防务战略也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但是有两个足够的理由表明它们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第一，军事上缺乏合作、相互怨恨的盟国之间很难建立合作性的货币关系。第二，正是防务预算费用使美国不可能实施上面勾画出的有见地的想法，而实施这种想法可能使美国改变自己在拉丁美洲遭到败坏的形象，如罗斯福时代一样，再一次扮演好邻居的角色。

人们普遍同意：防务预算大大嘲弄了里根总统对货币主义的热情。防务预算正是美国预算赤字节节升高的主要原因。美元的普遍使用使美国很容易使美国银行和公司、外国政府、公司和个人手中的美元流入美国，足以为平衡赤字筹措资金。然而，这样做会使实际利率保持很高水平，因此再一次有利于投机和短期获利，而不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

欧洲人对超级大国关于军备控制谈判的缓慢进展感到沮丧，他们希望苏联和美国放慢以新式导弹取代旧式导弹的脚步。欧洲人如愿意支付更多用于欧洲防务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账单，包括美国在德国驻军的费用以减轻美国的负担，这种乐意分担费用的表示将赋予欧洲人在军备控制问题上更大的发言权。与欧洲纳税人的费用相对照的是创造部分就业机会所带来的好处。比如，如果今后关闭美国的军人服务社，美国军队在欧洲的花销部分将以埃居或德国马克支付，美军也可能被提供本地的食品和饮料，取代以更高的价格从美国运来的东西。

然而，这里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点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就这些安全问题达成一致会减轻金融困境。如达不成一致，将使金融困境变得更加困难。金融和经济专家与战略家和军事专家应该达成共识。

来自欧洲的推动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精明地观察到，美国人总是更愿意在美元以某种方式受到挑战时，思考改变国际货币安排。^① 他是对的。例如，在60年代早期，罗伯特·特里芬教授已经指出与持续美元支付赤字一道运行的美元—黄金体系存在着内在弱点，当时，他建议以综合储备单位（即CRU）来取代美元作为政府支付赤字的储备资产，这个观点得到广泛讨论。甚至有人指出：如CRU与黄金挂钩，美国也必须以自己的CRU进行结算。当时，对美元的挑战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不是实际存在马上会到来的。然而，它致使Fowler国务卿坐到谈判桌边，并且在3年以后最终于1968年签署斯德哥尔摩协议。该协议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对其所有成员国发行特别提款权，并且这些特别提款权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国际储备资产。这并不完全是特里芬所希望的，但是它确实代表了美国政策的一种转变。

第二个挑战是在70年代早期，起因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变得越来越坚挺，美国的反应非常强烈，有损他国感情，

^① 参看他1985年的迪奇里演说（Ditchley Lecture）。其要点发表在1985年8月24日的《经济学家》第56页上。

甚至也许太草率。但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使美元贬值，1973年决定使美元汇率下浮的措施，当然很激进。通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美国废除了自己于1943年一手创办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控的固定汇率制度。

对美国人的思想影响更大的是1978年在不来梅签署的关于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施密特-吉斯卡尔协定(Schmidt-Giscard)。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协定在欧洲建立一个货币稳定、不受疲软的美元影响的区域。美国财政部不太喜欢这个想法，但是美国及时作出反应，首先是卡特内阁采取的措施，接着保罗·沃尔克引进了通过实施货币目标和高利率的更严格的信用限制措施。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其他欧洲人现在的提议是：欧洲应该再一次努力推动美国人采取步骤，管理好自己的经济事务，使之更稳定，更负责任，并且使美国人更加关注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波动。德斯坦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这一点，但他提议目的是将埃居建成与美元抗衡的货币单位。目前，埃居是一种虚拟货币，即它没有在欧洲的市面上被使用，但是可以以埃居设立一个银行账户。埃居是欧洲货币根据每一种货币的重要性进行加权的一篮子货币。如果你将许多法郎存入你的埃居账户中，它们未来的价值将取决于篮子中的组成货币的加权总和。埃居也日益被银行家和客户作为债券发行时的面值。

到目前为止，欧洲人并没像原先计划的那样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埃居开始取代国民货币的阶段，而是犹豫不决，行动缺乏目的性。英国人不愿加入。德国人据说只同意以

德国马克报价。法国人紧紧抓住1982年收回的控制资金外流的兑换控制，限制资金自由出入法郎区。意大利人坚持他们有权使里拉有更大的浮动范围，只有超出这个范围才进行干预。

然而，欧共体政府决心使本国货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处于控制之下，总的来说，市场明显得到了这种印象，尽管仍不时需要重新调整汇率。美元长期下跌或猛然下跌仍然可能再次使市场变得不稳定，因为这时资金从美元中抽出来进入欧洲货币中强劲一些而不是弱一些的货币中。欧洲货币体系中越来越频繁的重新调整汇率会损害体系的稳定性。

1976和1977年的欧洲货币以这种方式被疲软美元极化了。因此，如不想回到过去糟糕的日子里，惟一的方法是，如吉斯卡尔·德斯坦建议的那样，往前走。这将意味着将国民储备部分集中起来，因此德国人将为法国或意大利的逆差承担部分责任。它也意味着每一个成员国将接受货币政策和信用创造制定共同管理规则。欧洲中央银行持有每一个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的比例将越来越大。欧洲中央银行将向国民中央银行发行埃居。中央银行持有的埃居将构成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基础。正如一个金字塔一样，货币基础的大小决定了可以建构其上的信用额。这样，所有成员国都将被锁入一种共同的通货再膨胀的政策趋势中。

这听起来很容易。尽管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需待解决——例如对与欧共体以外的地方的汇兑控制问题——但基本的障碍全部是政治方面的。它确实涉及到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损失了部分国家自治权。然而，它对欧洲人

经济外交——不仅与美国的外交——开放的机会十分巨大。

采取下一步政策措施无疑会加速私人使用埃居的步伐。埃居债券和埃居国库券将资金从美国债券和美国国库券中吸引过来。如果美元变疲软而埃居几乎保持稳定，这种资金流动会加速。这将赋予欧共体与第三方谈判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也可以邀请沙特阿拉伯人以埃居对出口到欧洲的石油开发票，或者以埃居而不是以美元保持部分储备。埃居支持的出口信贷方案也可以被设计出来用于拉丁美洲，还可以和日本展开谈判。如果过去的经验可作为参照物的话，美国立刻会意识到对美元的挑战。他们的第一（负面）反应可能是如以前所做的一样，威胁将美军撤出欧洲。这就是为什么展开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线的一些谈判如此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有力推动，尽管美国政策近期出现的一些改变，倾向于对发达债务国提供更多帮助或更多干预来恢复混乱的外汇市场，但没有人可以自信地相信这种不是以公共关系为目的的短期行为。1985年9月，美国在五国集团会议上同意采取共同干预以使美元贬值，将主要汇率保持在“目标范围”内。同月，美国抛出贝克计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额更大、期限更长的资金。到此为止当然很好——可又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没有选择方案了吗？

除了这里提出的激进改革的方案以外，只有两条可能的路。一是继续糊里糊涂地度日，一是努力将时钟倒转。

第二种方案我相信只有在大得可怕的范围发生了经济或金融灾难以后，才可以想象。将时钟倒转涉及到的是：

不啻于退回到相互隔离的状态中，国家通过各种政府控制措施对本国的国民金融体系和国民资本市场负责。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走得更远，以至于以令人消除戒心的拐弯抹角的方式鼓吹他们所谓的“受控制的解体”，即再次分离。最早开始宣扬这一观点的人是已去世的弗雷德·赫希，他在1977年写道：“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受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合法目标，也许是调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现实的目标”（赫希，1977，第55页）。我已经提到（参看第6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著名的官员之一雅克·波拉克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这种观点。在为三十人集团——由经济学家和前中央银行的行长组成的民间智囊团——所写的文章中，波拉克得出的结论是：将太多希望系于国民政府来调整自己的国内经济管理，使外汇市场能得以稳定，利率保持稳定在合理水平上，维持经济增长，这种太高的希望是无用的而且具有误导性：“一旦意识到作出国际决策确实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人能辩驳下面这一点，即应该使任何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经济政策处于和谐的状态中。相反，我们将寻找分权决策所起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作用”（波拉克，1981，第19页）。

波拉克是一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具有长期工作经历的务实决策者。可以理解，波拉克比任何学院派经济学家，如宣扬主要国家中三方政策合作的主要鼓动者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教授，更持有一种不轻信他人的态度。麦金农的方案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但是在政治上太幼稚。只有当德国人和日本人随时准备紧随美国货币政策的每一种变化时，他的方案才能起作用——但历史事实已清

楚表明，他们从来都不会乐意这样做。

然而，“受控制的解体”只是描述退回到 50 年代的一种隐讳的方式。它或者意味着欧洲市场不得不全部被关闭——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欧洲市场现在可以通过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来运营，几乎不受地域限制，因此，即使新加坡、巴哈马和澳门都表示合作，这可能仍然行不通。或者它意味着美国银行将被迫关掉它们在国内的分行——即除非它们愿意让这些分行与总行分开，因此这些分行可以作为独立的银行来运营。要使国民金融体系独立运转，任何将国民货币转换成美元或将美元转换成国民货币的业务不得不被迫停止。大型国际企业将不得不与在它们运营的每个国家的不同银行进行账目往来。可以理解来自工业、商业及银行体系的压力和反对将是巨大的。这些强有力的利益将指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受控制的解体”将使得国际信用和金融结构在规模和能力上大大降低。一步一步做到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但是采取突然行动对世界经济将造成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损害人们对经济体系的信心和企业进取精神，这将是为降低目前体系的风险和不稳定支付的一种非常高昂的代价。

但如果我们继续糊里糊涂地度日又会如何呢？

概括地说，答案是：尽管造成的后果从经济上讲可以忍受，但是对一个自由社会而言从政治上讲是不能接受的。

在对具体细节上，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未来的大轮廓却十分清晰。对欠发达国家的债务人默默赖债的风险将日益增加。欠发达国家不会直接拒绝付款以免与债权人发生冲突。它们会发誓总有一天它们将全部付清债务。

将会有很多人对债务人表示同情，而对债权人同情的却不多。因为许多人认为银行已经从高利率中赚取了很大利润，也运转得十分良好。因为银行依靠收得的管理费用和咨询费用从重新安排支付的债务中甚至可以赚取额外的钱。但是后果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银行将不会恢复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信心。如果官方援助，无论是双边援助还是来自国际组织的援助不能立即填补这个空缺，债务国将仍然缺乏购买力。疲软美元将意味着债务国通过出口，包括以美元开具发票的原料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实际上被削弱了。而且如果美元变弱，低利率的前景将会慢慢落空。因为只要美国在为其巨额预算赤字筹资时不会陷入困境中，美国将不得不努力诱使资金待在美元中。

美国向外国人出售资产（即向外国人借款）越多，迟早采用通货膨胀使美元贬值的诱惑力就越大。美国农民和美国产业工人能有理由辩驳，对他们而言，这种行动比不适当的美元强劲导致的低产品价格和高失业率要好一些。

然而，对未来持续的不确定无助于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增长。经济周期将再次回到 70 年的滞胀状态。政治车轮将再次回转，另外一个罗纳德·里根和保罗·沃尔克将对货币问题采取急刹车，导致经济再次陷入忽好忽坏的状况中，再次使我们大家都陷入更深的衰退之中，这个时候将会来到。

这种时候，防止不确定性的必要性将变得更引人注目。每一个部门的大经营者理所当然地将风险转嫁到顾客手上以预防不确定性。小经营者将发现自己控制的财富和将资本投放到轮盘上一样少得可怜。只有经纪人和投机商将变

得肥胖富有。每一个有抱负、刚出校门的人和大学生将希望成为某种金融交易商。除了极少数快速增长的高新技术部门以外，工业将仍然处于萧条状态中，因为长期投资的风险对所有人都太大，只有国有企业（它们的亏损将会算在纳税人的账单上）和大企业除外，在这一点上它们将越来越相似。

由于信息问题（参看第5章）以及管理者和管制者对银行家和投机商最近的行动的无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没有看到最近的金融丑闻或最大的银行业崩溃。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结果将是一样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接受这些责任和债务，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将太大了。而下一步采取的措施是银行国有化。

对这种萧条的经济事件，其政治反应十分严重。当整个一代人对经济体系的幻想破灭，看不到从通货紧缩和滞胀忽好忽坏的状况交替出现的出路时，肯定会有政治反应。欧洲30年代的经历表明普遍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对各种政治完全的厌恶——一种不理不睬的思维进程，也许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达到顶峰。另一种是追随某种政治骗子，如阿道夫·希特勒一样的煽动家，将社会不公正的大杂烩卷入一个伪历史、伪科学中的包裹中，从而煽起强烈、巨大的民族主义情感。第一种情形会使政府变得弱小不稳定。在第二种情形下，政府将变得凶残、腐败，往往具有侵略性。

这些政治后果迟早会波及到国际关系中。弱小一些的国家肯定会招致强大一些的国家侵略。用普遍价值将一

个自由民主的联盟捆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困难。缺乏对未来走向的眼光损害了目前的士气。美国也许可以暂时享受（比如现在）其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带来的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特权。它还可以运用自己的作为军事保护国或干预别国事务的好事者，或作为主要贸易伙伴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使其他国家经历痛苦的调整。但最终美国不可能保持繁荣或以这种方式维持联盟关系。糊里糊涂地度日明显行不通。

到1999年12月31日，我们将到达本世纪末。如果到那时，我们仍然未死于核屠杀，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除非采取积极、务实的步骤来冷却并控制金融赌场，可庆贺的其他事就不多了。对多数人而言，和人民的生命玩蛇梯棋游戏，影响太明显了。只有那些金融赌客将仍然在俯临资本主义城市中心的办公大楼里得以幸存，他们将举杯庆贺。对其余的人来说，美国世纪将会悲哀、痛苦地结束。

译名索引

aid 援助

Amin, Samir 阿明, 萨米尔

Anderson, Perry 安德森, 佩里

Argentina 阿根廷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亚细亚生产模式

Atlantic Alliance 大西洋联盟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within 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恶化

authority – market relationship 当局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Bagehot, Walter 白哲特, 沃尔特

Baker, James 贝克, 詹姆斯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as supervisor of U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作为英国金融机构的监管人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国际清算银行

banking system 银行体系

instability of 银行体系不稳定

insurance for 银行体系保险

lack of information on interbank lending 缺乏有关银行间

借款的信息

- limits of central bank supervision 中央银行监控的有限性
- Basle Concordat 巴塞尔协定
- Belgium 比利时
- Blair, John 布莱尔, 约翰
- Brandt Report 勃兰特报告
- Brazil 巴西
- Bretton Woods 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
- breakdown 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
- Britain 英国
- system of financial control in 英国的金融控制体系
- Brunhoff, Suzanne 布吕诺夫, 苏珊
- Bruno, Michael 布鲁诺, 迈克
- Burns, Arthur 伯恩斯, 阿瑟
- Callaghan, James 卡拉汉, 詹姆斯
- Calleo, David 卡里奥, 大卫
- Canada 加拿大
- capital accumulation 资本积累
- as problem in world economy 作为世界经济的问题
-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The* (Wallerstein)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华勒斯坦)
- Cecco, Marcello de 切科, 马尔切洛·德
- Class and Nation* (Amin) 《阶级与民族》(阿明)
- Colchester, Nicholas 科尔切斯特, 尼古拉斯
- commodity markets 商品市场

- reopening of London markets 重新开放伦敦市场
- use by US farmers for hedging 美国农场主用于套购保值
买卖
- commodity prices 商品价格
-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共同农业政策
-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IEC)
国际经济合作会议
- Connally, John 康纳利, 约翰
-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Anderson) 《关于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安德森)
- Control of Oil, The* (Blair) 《控制石油》(布莱尔)
- Coombs, Charles 库姆斯, 查尔斯
-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financial policies 协调国民金融政策
- McKinnon proposals for 麦金农关于协调国民金融政策
提议
- currency speculation 货币投机
- Debt problem 债务问题
- see international debt 参看国际债务
- Desai, Meghnad 德塞, 梅戈纳
- determinist explanations for world economic depression
世界经济萧条的决定论解释
- political determinism 政治决定论
- technical determinism 技术决定论
-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
- and capping of interest rates 利率补贴

effect on of shrunken credit structure 萎缩的信用结构对
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

oil im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NOPECs) 发展中的
石油进口国, 非欧佩克成员国

and world economic depression 世界经济萧条

Dobb, Maurice 多布, 莫里斯

dollar 美元

devaluation 美元贬值

preference for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place 国际市场对美
元的青睐

Emery, H. C. 埃默里, H. C.

Emmanuel, Arghiri 伊曼纽尔, 阿尔吉利

Emminger, Otmar 埃明格尔, 奥特玛尔

Eurocurrency markets 欧洲货币市场

as creator of credit 作为信用创造者

impact of on 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 对利息平衡税的
影响

and shift of risk 风险转移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共同体, 简称欧共体

linking security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将安全与金融
管理联系起来

European currency snake 欧洲货币蛇形图

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 欧洲货币单位, 埃居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欧洲货币体系

- exchange rates 汇率
floating 浮动汇率
fluctuations 汇率波动
export credits 出口信用
-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联邦存款保
险公司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financial futures 金融期货
financial systems, control of 控制金融体系
France 法国
Frankel, S.H. 弗兰克尔, S.H.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Friedman, Milton 弗里德曼, 米尔顿
- Galbraith, J.K. 加尔布雷思, J.K.
Galtung, Johann 加尔通, 约翰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rrangements to Borrow (GAB) 借款总安排
General Theory (Keynes) 《通论》(凯恩斯)
Gilbert, Milton 吉尔伯特, 米尔顿
Gilpin, Robert 吉尔平, 罗伯特
Glyn, Andrew 格林, 安德鲁
gold exchange system 黄金兑换体系
Gold Pool 黄金总库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conomic disorder 政府消费与经
济混乱

Griffith-Jones, Stephanie 格里菲斯-琼斯, 斯特凡妮

Group of Ten 十国集团

Group of Thirty 三十人集团

growth 增长

slowing of 缓慢增长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技术革新

Grubel, Herbert 格鲁贝尔, 赫伯特

Hayek, Friedrich 哈耶克, 弗里德里希

hegemonic stability 霸权稳定

Hirsch, Fred 赫希, 弗雷德

Hungary 匈牙利

inflation 通货膨胀

and Eurocurrency transaction 欧洲货币交易

marxist analysis of 马克思主义分析

and the "oil shock" 石油危机

interest rates 利率

"rate-capping" for LDCs 对欠发达国家的利率补贴

volatility of 利率的波动性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

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

see World Bank 参看世界银行

international debt 国际债务

- BIS statistics on 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
handling bad debt 处理坏账
as political weapon 作为政治武器
and proposed creation of SDRs 建议创造特别提款权
resolution of problem through international support system
通过国际支持体系解决债务问题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国际劳动分工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国际能源机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国际金融体系
controlled disintegration of 受控制的解体
crises and chronic problems in 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危机和
长期问题
ignorance and control of system 无知与对体系的控制
implication of current trends in 国际金融体系中目前趋势
的内涵
and need for wise US hegemony 需要美国实施明智的霸
权
problems of monitoring activity in the system 监控体系中的
行动问题
respective risk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ending 国内和国
外借款各自的风险
and short-term credit 短期信用
unworkability of Brandt proposals 勃兰特建议不可行
international lender of last resort 最终国际贷款人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Committee of Twenty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二十国集团与国际货币改革

Oil Facility 石油贷款基金

1968 Stockholm agreement on SDRs 1968年关于特别提款权的斯德哥尔摩协定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国际组织

reluctance of states to transfer power to 国家不情愿将权力转移到国际组织

role in Brandt Report prescriptions 勃兰特报告中国际组织的地位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xplaining economic disorder 国际政治与对经济混乱的解释

and limits on financial policy coordination 协调金融政策的限制

international trade as explanation of world economic depression 以国际贸易来解释世界经济萧条

Italy 意大利

Japan 日本

Kalecki, Michael 卡莱茨基, 迈克尔

Kaufman, Henry 考夫曼, 亨利

Keohane, Robert 基奥恩, 罗伯特

Keynes, J. M. 凯恩斯, J. M.

Keynesianism 凯恩斯主义

marxist critique of 马克思主义批评

moral objection to 从道德方面提出的异议

view of economic disorder 凯恩斯主义者对经济混乱的看法

Kindleberger, Charles 金德尔伯格, 查尔斯

Kissinger, Henry 基辛格, 亨利

Knight, Frank 奈特, 弗兰克

Kondratiev, Nikolai 康德拉季耶夫, 尼古拉

see also long waves 也请参看长波

Kuhn, Thomas 库恩, 托马斯

Labour Party 工党

Lambert, Richard 兰伯特, 理查德

Late Capitalism (Mandel) 《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

Lenep, Emile van 伦内普, 埃米尔·范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欠发达国家

see developing countries 参看发达国家

Lewis, Arthur 刘易斯, 阿瑟

Lipton, Michael 利普顿, 迈克尔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Olson) 《集体行为的逻辑》(奥尔森)

Lombard Street (Bagehot) 《伦巴第大街》(白哲特)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 (LIFFE)

伦敦国际期货交易所

long waves 长波

Magdoff, Harry 麦格道夫, 哈里

Mandel Ernest 曼德尔, 欧内斯特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weakness of *Das Kapital* 《资本论》的缺点

Marxist analysis of economic depression 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萧条的分析

critique of Keynesian approach 马克思主义者对凯恩斯观点的批评

Matthews, R. C. 马修斯, R. C.

Mayer, Martin 迈耶, 马丁

McKinnon, Ronald 麦金农, 罗纳德

Mexico 墨西哥

Mikdashi, Zuhayr 米克达施, 祖海尔

Minsky, Hyman 明斯基, 海曼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The (Berle and Means) 《现代企业与私人财产》(伯利和米恩斯)

monetarism 货币主义

and global approach to depression 从全球角度看待萧条
and US budget deficit 美国预算赤字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

proposed US, West German and Japanese coordination of
提议协调美国、西德和日本的货币政策

money 货币

increased velocity of 加速资金周转率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behind 背后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trust in as neutral medium 对货币作为中性媒介的信任

Money: Two Philosophies (Frankel) 《货币：两种哲学》
(弗兰克尔)

Morse, Jeremy 莫尔斯, 杰里米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

se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参看跨国公司

neo-mercantilism 新重商主义

reaction to world depression 对世界萧条的反应

Netherlands, The 荷兰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s) 新兴工业国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 莱因霍尔德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 简称北约

burden sharing and US deficit 分担北约费用与美国赤字

Nye, Joseph 奈, 约瑟夫

oil prices 石油价格

and disruption of economic system 破坏经济体系

Olson, Mancur 奥尔森, 曼库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石油出
口国组织, 简称欧佩克

Parboni, Riccardo 帕尔博尼, 里卡尔多

Penrose, Edith 彭罗斯, 埃迪斯

Polak, Jacques 波拉克, 雅克

Poland 波兰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政治风险分析

political system 政治体制

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损害对政治体制的信心

Portugal 葡萄牙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regime change 政体改变

revolution 革命

as response to economic crisis 作为对经济危机的反应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The (Olson) 《民族的兴衰》
(奥尔森)

Risk, Certainty and Profit (Knight) 《风险、确定性和利益》(奈特)

Rohatyn, Felix 罗哈廷, 费利克斯

Rostow, Walt 罗斯托, 瓦尔特

Rowthorn, Robert 罗桑, 罗伯特

Ruckdeschel, F. 拉克德施尔, F.

Rueff, Jacques 吕夫, 雅克

Schultz, George 舒尔茨, 乔治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特, 约瑟夫

Schweizer, Pierre Paul 施魏策尔, 皮埃尔-保罗

Second Slump, The (Mandel) 《第二次萧条》(曼德尔)

Simmel, Georg 西梅尔, 格奥尔格

Slower Growth in the Western World (Matthews) 《西方世界的缓慢增长》(马修斯)

-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 Smithsonian Agreement 史密森协定
-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 特别提款权
- proposed creation to overcome illiquidity 建议创造特别提款权克服流动资金不足
- Special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联合国发展经济特别基金
- implications of failure to agree on 未达成一致的隐含意义
- speculation 投机
- and erosion of trust in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侵蚀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信任
- and price volatility 价格波动性
- role in adding to instability 增加了不稳定
- and uncertainty 不确定
- Spero, Joan 斯佩罗, 琼
- State, Capital and Economic Policy* (de Brunhoff) 国家、资本与经济政策 (德·布吕诺夫)
- state intervention in markets 国家干预市场
- Stoffaes, Christian 斯托菲, 克里斯蒂安
-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Kuhn) 《科学革命的结构》(库恩)
- Sweezy, Paul 斯威齐, 保罗
- Switzerland 瑞士
- Swoboda, A. 斯沃博达 A.
- technology 技术

in banking and finance 银行业和金融中的技术
and cyclical swings 周期性波动
impact on money markets 对货币市场的影响
and information supply 信息供给
and increased speculative trading 增加了投机交易
and increased velocity of money 增加了资金周转率
and power of states in world economy 世界经济中的国力
role in undermining US financial regulation 起到损害金融
管制的作用

Tobin, James 托宾, 詹姆斯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跨国公司

UN Code of Conduct for 联合国的行为准则

Triffin, Robert 特里芬, 罗伯特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attempts to manage by big companies 尝试通过大公司管
理不确定性

and demand for information 对信息的要求

difficulty of calculating in business 难以计算商业中的不
确定性

importance for speculative markets 对投机市场的重要性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苏维埃社会主
义联盟, 简称苏联

United Kingdom 大英帝国

see Britain 参看英国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Code of Conduct f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跨国公司的行为准则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海洋法会议

United States 美国

balance of payments deficit 支付平衡赤字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存款机构

Deregulations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 (1980) 《放宽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

Federal Reserve System 联邦储备体系

impact of domestic policy on world economy 美国的国内决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International Banking Act 国际银行法

as key national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作为关键的国家权威

role as hegemonic power 作为霸权的角色

role of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
货币监理官办公室

system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金融管制体系

tax on foreign lending 对外国借款课税

Vernon, Raymond 弗农, 雷蒙德

Volker, Paul 沃尔克, 保罗

Wallich, Henry 沃利克, 亨利

West Germany 西德

wheat markets 小麦市场

Whitman, Marina 惠特曼, 马里纳

Williamson, John 威廉森, 约翰

Wilson, Harold 威尔逊, 哈罗德

Witteveen, Johannes 维特芬, 约翰尼斯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The (Rostow)

《世界经济: 历史与前景》(罗斯托)

World System, The (Wallerstein) 《世界体系》(华勒斯坦)

参考书目

- Aglietta, M. ,1983, *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 ,Paris, PUF.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min, S. , 1980, *Class and Nation :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current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nderson, P. , 1976,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rcher, C. , 1983,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 London, Allen & Unwin.
- Attali, J. , 1977, *La Parole et l'Outil* ,Paris.
- Bagehot, W. , 1873, *Lombard Street :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 , London.
- Berle, A. and Meaus, 1933,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 Blair, J. , 1977, *The Control of Oil* ,London, Macmillan.
- Block, F. , 1977,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ndt Commission, 1980, *North-South :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 London and Sydney, Pan.
- Brandt Commission, 1983, *Common Crisis : North-South coop-*

- eration for world recovery*, London and Sydney, Pan.
- Brett, E. A. , 1983,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the Capitalist Crisis*, London, Gower.
- Brunhoff, S. de, 1976, *La Crise de l'Etat* , Paris, Maspero.
- Brunhoff, S. de, 1978, *State, Capital and Economic Policy* , London, Pluto.
- Calleo, D. , 1982, *The Imperious Economy*, Cambridge, Mass. and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s, M. and Diebold Jr. , W. , 1983, "The New Multilateralism; ca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be saved?",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Cardoso, F. H. and Faletto, E. ,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ecco, M. de, 1982, "Credit creation in the Eurocurrency market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23.
- Cline, W. , 1983, *International Debt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Cline, W. , ed. , 1983, *Trade Policy in the 1980s*, Washington.
- Cline, W. , 1984, *International Debt : systemic risk and policy respons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pril.
- Commonwealth Group of Experts, 1984, *Debt Crisis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1985, "Development Prospects, Policy Options and Negotiations", London.
- Collier, D. , ed. , 1979,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ombs, C. , 1976, *The Aren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 New York.
- Corden, W. , 1984, *The Revival of Protectionism* , New York, Group of Thirty Occasional Paper No. 14.
- Cornwell, R. , 1983, *God's Banker: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Roberto Calvi* , London, Gollancz.
- Dale, R. , 1982, *Bank Supervision Around the World* , New York, Group of Thirty.
- Dale, R. and Mattione, R. , 1984, *Managing Global Debt* ,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Dale, R. , 1985,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 Cambridge, Woodhead-Faulkner.
- Davis, S. , 1984, "Markets, State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power in the world grain trading system", University of London PhD Thesis.
- Davis, J. S. , 1975, *The World Between the Wars, 1919 ~ 1939*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lamaide, D. , 1984, *Debt Shock* , London, Weidenfeld.
- Desai, M. , 1981, *Testing Monetarism* , London, Frances Pinter.
- Duchene, F. , 1984, *Industrial Adjustment Policies of Western Europe* , London, Macmillan.

- Dufey, G. and Giddy, I. H. , 1979,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
- Duijn, J. J. van, 1983, *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 London, Allen & Unwin.
- Emery, H. C. , 1896, *Commodity Exchanges* , New York.
- Emmanuel, A. , 1969, *The Economics of Unequal Exchange :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 Paris, Maspero; 1971, Lond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ublished as *Le Profit et les Crises* , Paris, Maspero.
- Fabra, P. , 1978, *Les flux monétaires dans un monde écartelé entre l'inflation et la déflation* , Madrid 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
- Fitoussi, J. P. , 1982, "Politique monétaire passive ou politique économique?", in *Observatoire Français des Conjonctures Economiques* , Paris, June.
- Frankel, S. H. , 1977, *Money: Two Philosophies; the conflict of trust and authority* , Oxford, Blackwell.
- Freeman, C. , Clark, J. and Soete, L. , 1982, *Unemploy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Freeman, C. , 1984, *Long Wave in the World Economy* , London, Frances Pinter.
- Friedman, M. and Schwarz, A. ,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6 ~ 1945*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M. , 1977,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new dimension of politics", Nobel Lecture, London, Institute of

- Fiscal Affairs.
- Galtung, J. , 1975, *Social Imperialism and Subimperialism* ,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 Gilbert, M. (with posthumous editing by Peter Oppenheimer and Michael Dealtry) , 1980, *The Quest for World Monetary Order: the gold-dollar system and its aftermath* , New York, Chichester, Wiley.
- Gilpin, R. , 1968, *France in the Age of the Scientific Stat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 , 1975,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lpin, R. , 1975, *The US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iffith-Jones, S. and Lipton, M. , 1984, “International Lenders of Last Resort: and changes required?” , London Midland Bank.
- Group of Thirty, 1985,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on the 1980s* , New York, Group of Thirty.
- Grubel, H. , 1979, *A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 Princeton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133.
- Gunder Frank, A. ,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 Boston, Free Press.
- Guttenberg, J. and Herring, R. , 1983,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func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 Princeton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151.

- Hirsch, F. and Doyle, M. , 1977, *Alternatives to Monetary Disorder*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Hirschmann, A. O. , 1983,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 Hopkins, T. and Puchala, D. , 1979,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Madison, University Press of Wisconsin.
- Hopkins, T. and Wallerstein, I. , eds, 1982, *World Systems Analysis* ,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 Hu, Y. S. , 1984, *Industrial Banking and Special Credit Institutions ; a comparative study* ,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Kaletsy, A. , 1985, *The Costs of Default* , New York Priority Press for 20th Century Fond.
- Kaufman, H. , 1985, "Dangers in the rapid growth of debt" , address to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January 16.
- Keohane, R. and Nye, J. ,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Boston, Little, Brown.
- Keohane, R. , 1984, *After Hegemony*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ynes, J. M. , 1971, *Collected Writings* , 15 vols. , London, Macmillan.
- Kindleberger, C. , ed. ,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
- Kindleberger, C. ,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 1929 ~ 1933*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ndon, Allen Lane.

- Knight, F. , 1921, *Risk , Uncertainty and Profit*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33, reprinted in LSE reprint series, London.
- Knorr, K. , 1975, *The Power of Nations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Basic Books.
- Krasner, S. , 1978,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 , ed. ,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 S. ,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ever, H. and Huhne, C. , 1985, *Debt and Danger :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 London, Penguin.
- Lewis, W. A. , 1949, *Economic Survey 1919 ~ 1939* , London, Allen & Unwin, reprinted 1970.
- Llewellyn, D. , 1982, "Avoiding an International Banking Crisis" , in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Quarterly Review* , August.
- Lomax, D. , 1982, "The Oil-Finance Cycle Revisited" , in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Quarterly Review* , November.
- Lombra, R. and Witte, W. , eds, 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Maddison, A. , 1982,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gdoff, H. , and Sweezy, P. , 1969, *The Deepening Crisis of*

-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andel, E. , 1977, *The Second Slump*, London, New Left Books.
- Mangoldt, H. von, 1855, *Die Lehre vom Unternehmergewinn*, Leipzig.
- Matthews, R. C. O. , ed. , 1982, *Slower Growth i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Heinemann.
- Mayer, M. , 1980, *The Fate of the Dollar*, New York, Times, Books.
- Mayer, M. , 1982, "The settlements revolutio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April.
- McKinnon, R. , 1974, "A New Tripartite Monetary Standard or a Limping Dollar Standard?", *Princeton Essay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106.
- McKinnon, R. , 1982, "Inflationary and deflationary world mone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 McKinnon, R. , 1984,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Monetary Sta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 8,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 Mendelsohn, S. , 1980, *Money on the Move*, New York, McGraw Hill.
- Mendelsohn, S. , 1984, *The Debt of Nations*, New York, Priority Press.
- Mikdashy, Z. , "Oil-exporting countries and oil-importing countries: what kind of interdependence", *Millennium*, Vol. 9, No. 1.

- Mikdashi, Z. , 1976,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ikdashi, Z. , 1986, *World Oil :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challenges* , London, Frances Pinter.
- Minsky, H. , 1979,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 capitalist processes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economy* , paper, for a colloquium on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Bad Homburg, published Rome, Confederazione Generale dell'industria Italiana.
- Minsky, H. , 1982, *Can it 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 , Armonk, NY, M. E. Sharpe.
- Moffitt, M. , 1984, *The World's Money : international banking from Bretton Woods to the brink of insolvency* , London, Michael Joseph.
- Morgan, D. , 1979, *Merchants of Grain* , New York, Viking; 1980, London, Penguin.
- Nader, R. , 1976, *The Taming of the Giant Corporation* , New York, Norton.
- Naisbitt, R. , 1984, *Megatrends* , London, Futura.
- Nau, H. , 1984, *International Reagonomics : a domestic approach to the world economy* ,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monograph, December.
- Nicholas, D. , 1985, *Commodities Futures Trading* , London, Mansell.
- O'Donnell, G. ,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in Southern American Politics* , Berkeley, U-

-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lson, M. , 197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Good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 ,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 economic growth ,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boni, R. , 1980, *The Dollar and its Rivals ; recession , inf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 Milan, Etais Libri.
- Penrose, E. , 1971, *Growth of Firms , Middle East Oil and Other Essays* , London, Cass.
- Polak, J. , 1981,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 Group of Thirty Occasional Paper No. 7, New York.
- Poulantzas, N. , 1973,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 London, New Left Books.
- Rohatyn, F. , 1982, "The state of the banks"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November.
- Rostow, W. , 1976,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Rostow, W. , 1978, *Getting from Here to There* , New York, McGraw Hill.
- Rostow, W. , 1980, *Why the Poor Get Richer and the Rich Slow Down* , London, Macmillan.
- Rowthorn, R. , 1980, *Capitalism , Conflict and Inflation* ,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Ruckdeschel, F. , 1975, "Risk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lending of US banks" ,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 Win-

- ter.
- Rueff, J. , 1971, *La Pêche Monétaire de l'Occident* , Paris, Plon.
- Rustow, D. , 1983, *Oil and Turmoil* , New York, Norton.
- Rustow, D. and Mugno, J. , 1977, *OPEC - Success and Prospects* ,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Sampson, A. , 1981, *The Money Lenders* ,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 Schumpeter, J. , 1939, *Business Cycles* , 2 vols. , New York and London, McGraw Hill.
- Scitovsky, T. , 1977, *The Joyless Economy* , London, Galaxy.
- Shonfield, A. , ed. , 1976,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Western World 1957~1971* , Introduction to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mel, G. , 1907, *Die Philosophie des Geldes* , Leipzig; 1978, translated as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 by T. Bottomore and D. Frisby.
- Spero, J. , 1980, *The Fall of the Franklin National Bank*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ewart, E. , 1985, "Banks, governments and risk medium-term syndicate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loans to Nigeria, 1977~1983" , unpublished London University PhD thesis.
- Stewart, F. , ed. , 198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 London, Frances Pinter.
- Stoffaes, C. , 1979, *La grande menace industrielle* , Paris, Calmann-Levy.

- Strange, S. , 1971, *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 , 197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Vol. 2 of A. Shonfield, ed.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59~197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range, S. , 1981, "Reactions to Brand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2.
- Strange, S. and Tooze R. , eds, 1982,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of Surplus Capacity*, London, Allen & Unwin.
- Strange, S. , 1983, "The Credit Crisis", *SAIS Review*, Washington, Summer.
- Swoboda, A. , 1980, *Credit Creation in the Euromarket : alternative theo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trol*, New York, Group of Thirty Occasional Paper No. 2.
- Tobin, J. , 1984, "Unemployment in the 1980s: macroeconomic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in A. Pierre, ed. , *Un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the Western Economi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Triffin, R. , 1964,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riffin, R. , 1966, *The World Money Maz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riffin, R. , 1969,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appeared in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Quarterly Review*, June 1959.

- Tsoukalis, L. , ed. , 1985,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 London, Sage.
- Tumlrir, J. , 1983, "The World Economy Today: crisis or new beginning?" ,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Quarterly Review* , August, pp. 26~44.
- Vaubel, R. , 1978, *Strategies for Currency Unification* , Tübingen, Mohr.
- Vernon, R. , 1971, *Sovereignty at Bay* , New York, Basic Books.
- Versluysen, E. , 198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 Farnborough, Gower.
- Wallerstein, I. ,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 London,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 ,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 Cambridge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hitman, M. von N. , 1984, "Persistent Unemployment: economic policy perspectives in US and Europe" , in A. Pierre, *Un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the Western Economies* ,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Williamson, J. , 1977,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1971~1974* , New York, Von Nostrand Reinhold.
- Wohlens Scharf, T. , 1984 *Arab Banking* , OECD Development Centre.